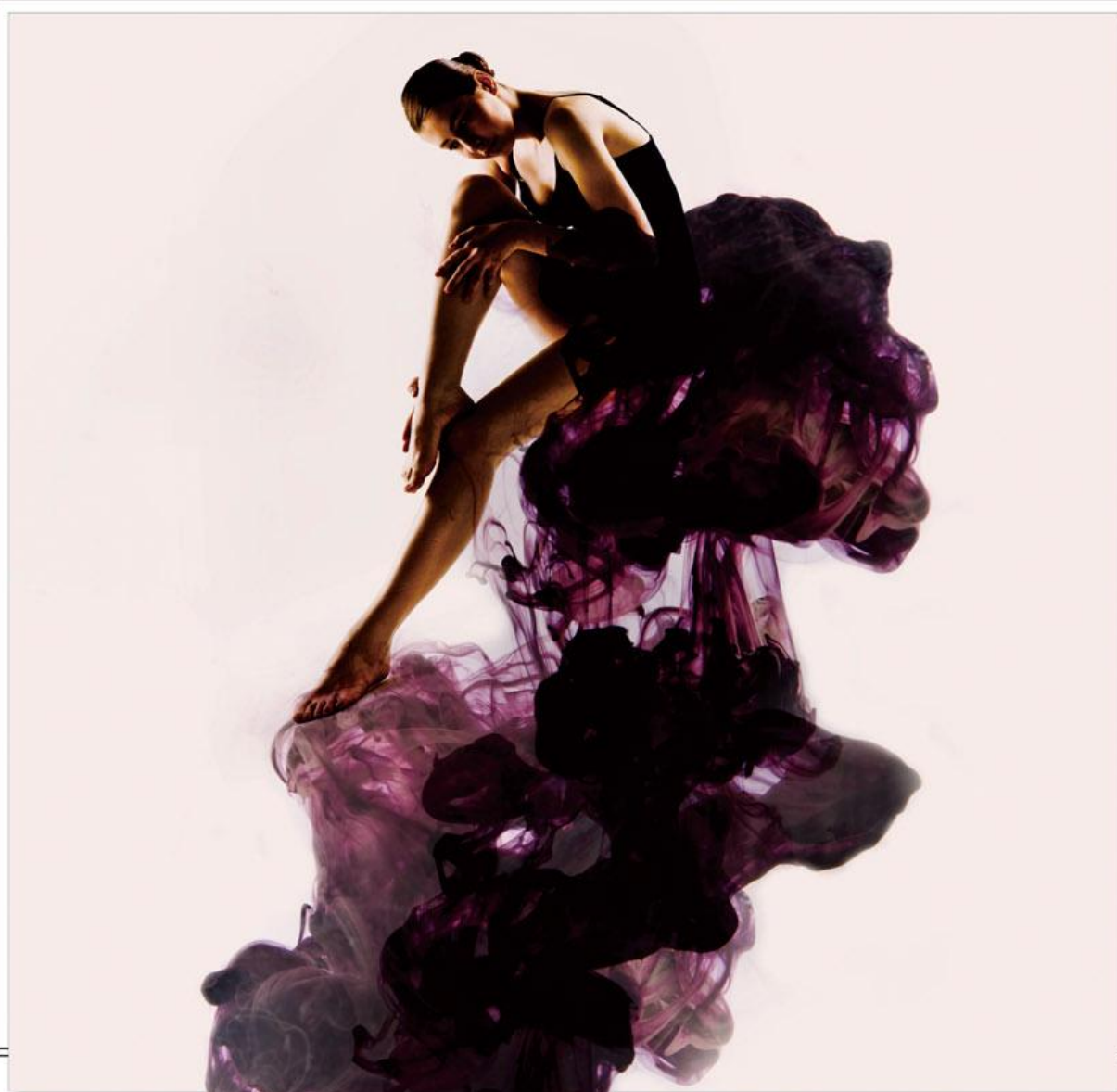




READERS

读者®

张上将自忠 ■ 为鸡蛋而暴走 ■ 这一代人的恐惧与焦虑 ■ 孤鸿林风眠



2012-1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20期
六月上



写给幸福

●席慕容

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

今天，阳光仍在，我已走到中途。在曲折颠沛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歇息，只敢偶尔停顿一下，想你，寻你，等你。

雾从身后轻轻涌来，目光淡去，想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我开始害怕了。

也开始对一切美丽的事物怜爱珍惜。不管是对一只小小的翠鸟，还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

日子在盼望与等待中过去，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过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总有一天，我也会跟所有的人一样老去的吧？总有一天，我此刻还柔软光洁的发丝也会全部转成银白，总有一天，我会面对一种无法转圜的绝境与尽头；而在那个时候，能让我含着泪微笑着想起的，大概也就只有你，只是你了吧？

还有那一艘我从来不曾真正靠近过的，那小小的张着白帆的船。

（棋 枰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写给幸福》一书）

卷首语





陈志明 (0931)8773241

【校园内外】 32 有什么比得了青春 乔晓华

<http://ebook.360revit.com/>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 录 六月上

生活		
【生活之友】	26 美元洪水淹没你的退休梦	宋鸿兵
	31 在国外可能给你惹麻烦的七种手势	黄义务
文明		
【在海外】	58 德国箭头	千 坚
【趣味科学】	57 一只肉鸡的“科学”一生	孙道荣
【家 园】	40 水泥的辩证史	钟永丰
【知 识】	44 如果从地球诞生至今只有24小时	刘奎峰
【文化茶座】	52 海峡两岸的“世说新语”	李寒芳
【史海拾贝】	56 明朝的两只蝴蝶	姜钦峰
【人与自然】	50 资源远未枯竭	Charles Kenny
悦 读		
【幽默小品】	45 镜子与情人	班 超
【言 论】	11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4 漫画与幽默	
点 滴		
【意 林】	47 靠不住	刘 原
	47 方法问题	安布鲁斯·比尔斯
	47 知己、朋友和熟人	荆 辉
	47 人性讨厌风险	佚名
	47 妈妈的咒语最灵验	寇士奇
【点 滴】	9 历史上那些不正经的真事儿	张发财
	15 小人物与孙中山	裴毅然
	21 易中天妙解“教师”之职	张斗和
	23 懂得	孟祥海
	28 改变 Google 的厨师长	郭 龙
	28 世界正在起变化	
	32 该怎样生活	郑也夫
	41 一句话照亮世界	麦 家
	43 去趟民国	刘仰东
	49 女儿经	陈丹燕
	49 那些微瞬间	
	61 朱维铮说	朱维铮
互 动		
【互 动】	64 微博互动	
艺 术		
【封 面】	美姿 (摄影作品)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官方网站

http://www.duzhe.com
 官方微博
 http://t.qq.com/duzhe
 http://weibo.com/duzhezazhishe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手机杂志 每期《读者》纸本杂志的内容拆分为6本《读者》手机杂志，同步上市。请先将手机网络设为cmwap，可免流量费。两种订阅方式：1.发送 读者 到10658080，获得《读者》手机杂志页面链接。2.在手机浏览器中输入 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手机杂志暂仅限于移动用户)

《读者》苹果客户端 打开iTunes软件，在iTunes Store里直接搜索“读者”即可找到，下载时请认准该图标：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定期出版

[[读者·2012·11]]



张上将自忠

● 阿 忆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中将殒于湖北，算起来已有72年。

在漫长的72年里，很少有人探究，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

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年代的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了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殒命前线吗？

张自忠贵为中将，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职，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军长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却只带着两个团，孤军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赴死。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军阶太高，职位太显赫，他完全

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

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反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之士，在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头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介石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

那个时候，蒋介石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作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的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郁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在全军高级将领中，唯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1.80米，相貌酷似周恩来，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人员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又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来说，这种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但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都横眉立目，只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受到欢迎和敬重。

这个时候，人们忘记了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在喜峰口战役中亲临前线指挥杀敌，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才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当年脍炙人口的歌。后来，这首歌被修改了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抗日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二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时，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的全面误解，发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存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

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属，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与敌周旋，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他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想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被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试图转道至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拘押，韩复榘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作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他急忙令张自忠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了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

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介石，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介石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他放宽心，好好休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蒋介石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汉奸。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介石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背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这个被疑为华北头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板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率部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名联队长，歼敌13000人，最终挫敌，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污名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虽已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很多人认为，这些胜仗不过是在弥

补他过去做过汉奸的罪过。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一场胜仗，撤回西岸，与敌对峙。此时，他的第33集团军只有3个团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不能抽调。但不知为什么，张将军非要再渡襄河，去攻打敌人的重兵。即便如此，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两个团渡河作战。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他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14日，张自忠率部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切断，日军兵力是自己的数倍，但张自忠毫不畏惧，屡次下令冲锋。

日军屡屡受挫，奇怪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顽强。当他们获悉是张自忠亲自带队，便于15日大举增兵，以1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夹击包围张自忠部，以期铲除心头之患。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中方阵地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又穿着显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更是从三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那里射击。

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两回事

● 邓清波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只上过他家一次，而这次来是为了辞退蒙文通的事。钱穆劝他不要辞退蒙文通，表示蒙文通教的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断代史，如果辞退了他，至少三年内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但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主意已定，二人遂不欢而散。后来蒙文通被解聘，果如钱穆所言，北大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老师，历史系主任便来请钱穆讲魏晋南北朝史，但钱穆以北大给自己的聘约言明只讲上古两汉史，不愿意再接此课。此后，蒙文通原来的课程便由多位老师分担。有学生就质疑：这么多老师来授此课，为什么单单不见钱穆来上课呢？历史系主任没有办法，再次来请钱穆，钱穆乃答允上课。与胡适赌气和满足学生要

求，这是两回事。

钱穆到北大第二年，不顾系主任反对，坚持要增开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因为尽管当时共和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被视为专制而遭到鄙弃，但钱穆坚持认为学生要了解专制、要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有必要开此一课。结果，前来选课的学生很多。后来，有人想要组织一政党，特来邀请钱穆加入，说：“你何必跟胡适一样天天搞考据，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参加政治活动，



钱穆

可能对当前时局的贡献更大。”但钱穆明确拒绝，表示政治活动不是自己的天性所长，恕难从命。研究政治史和投入官场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两回事。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办《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食货》，都风行一时。学生就来劝钱穆也办一本“通典”，可以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并说钱穆只需挂名即可，办杂志的一切具体事务可由学生代劳。但钱穆以这将耽误学生学业为由而坚决不允。教书育人与争名逐利，这是两回事。

检读钱穆晚年所撰之师友杂忆，其在北大时，诸如此类的“两回事”还有不少。生活之中，难得的是能够随时分辨清楚种种“两回事”，不将之混为一谈；但许多两回事其实又是“一回事”，因为，它们不过是做人、做学问风格的一以贯之。

（海波摘自《中国青年》2012年第6期）

此时，日军包围圈东北角尚有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唯张将军是没有权利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和右腿被炮弹弹片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三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用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日军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大为震惊，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张自忠”灵牌。不知道日

军这么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不久，张将军的遗体被从日军修建的坟墓中起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至，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而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柩沿长江逆行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去了将军身上所有的荣誉阴霾，

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在共产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介石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大众也完全忘记了张自忠曾是他们唾弃的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东山月摘自《纪实》2012年第3期，谌宏微图）

陈忠实



不急，我可以慢慢等

●彭真平

1992年早春的一个下午，陈忠实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个字。之后，他对妻子说：“我得给老何写封信，告诉他小说的事，我让他等得太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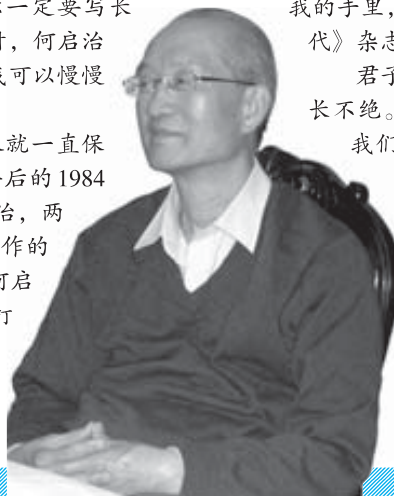
陈忠实说的老何叫何启治，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两人交往已经有20年了。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一天，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区委开会。散会后，在街道的拐角处，他被一个陌生人拦住。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何启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西安组稿。我读过你发表在《陕西文艺》上的短篇小说，觉得很有潜力，这个短篇完全可以进行再加工。所以，我想约你写一部长篇小说。”

寒风中，陈忠实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脸惊讶和茫然。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没有任何名气，而且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于是何启治耐心地鼓励他，激励他要树立信心。“你一定要写长篇，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临分手时，何启治言辞恳切地说：“别急，你慢慢写，我可以慢慢等！”

自从这次“街头约稿”后，两人就一直保持联系，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1年后的1984年，陈忠实接待前来陕西组稿的何启治，两人闲聊时，何启治问他：“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看到陈忠实面有难色，何启治轻松地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打算写长篇，记住给我就是了。还是当年那句话，不急，我可以慢慢等！”

何启治



再后来的一次两人见面，又说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这一次，面对何启治的真诚，陈忠实告诉他，自己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初步计划在3年内完成，在此期间请老何不要催问。何启治用力地握着陈忠实的手，说：“你放心，我充分尊重你的创作，保证不给你带来任何压力和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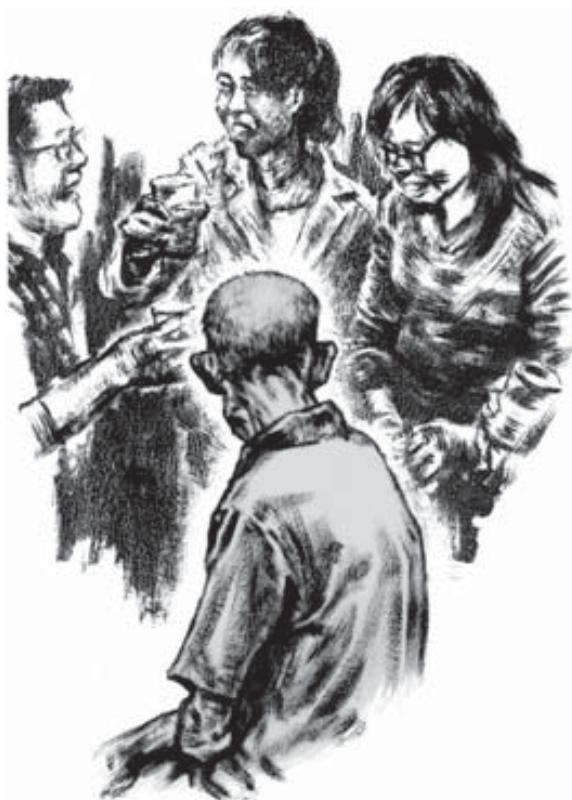
此后的几年里，何启治紧闭口舌，守约如禁。每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到西安组稿，他都要委托这些编辑给陈忠实带去问候，但再三叮嘱，只是问个好，不要催稿。1991年的初春，何启治带领一班人马到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见面时，他对陈忠实说：“我没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

在何启治“关心”而不“催促”的无压力状态下，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创作十分顺畅，只用了8个月就完成了。之后，和何启治料想的一样，《白鹿原》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并在1997年12月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多年以后，陈忠实在一篇回忆艰难创作历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出他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几近20年，这对于他来说太长了点。而对于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而作为组稿人、责任编辑和终审人，何启治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为什么对陈忠实履约践行充满信心时，他这样说：“事实证明，正是我和陈忠实始于1973年的真挚友谊以及彼此间的信任，使他在近20年后必然会把惊世之作《白鹿原》交到我的手里，并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

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历久弥坚，绵长不绝。从陈忠实和何启治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20年的约请和履约的君子之谊创造出了一部恢弘的文学巨著，同时，也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邓奔奔摘自《做人与处世》2012年第5期）



我送父亲进 养老院

●邵衡宁

那天晚上养老院打来电话说父亲病重时，我正在参加同学聚会。当时气氛很热烈，我喝了不少酒，微醺中，我一边恋恋不舍地穿上大衣，一边和同学说：“我父亲没事，我接到这样的电话不是一次两次了。”

当我带着酒气赶到医院时，父亲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养老院的人说父亲是撑着最后一口气在等我。看见我，父亲虚弱地张张嘴，但纵有千言万语，已说不出一个字来，大滴大滴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滚落，之后他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我那种锥心的痛和自责，无人能够理解。

五年前，父亲因病生活不能自理。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了，照顾父亲就成了我沉重的负担。可能是因为有病吧，父亲的脾气变得很怪。进养老院前的三年，我先后给父亲找过八个保姆。有时我晚上下班到家，正要给孩子做饭，保姆就来电话了，说父亲又发火

了，不肯吃饭。我要是有一天不去看父亲，他就和保姆闹腾，他说，还是丫头做的饭好吃，还是丫头贴心。

先生在北京工作，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我每天晚上安顿好父亲，回到家孩子已经睡了。日复一日，一年下来，我累得半死，人瘦了好多。我的大家庭进入一种无序状态，那种苦是外人不能体会的。先生也开始抱怨，他说，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家里过上正常生活呀。

2006年年底，我心中的烦累达到了顶峰，我和在国外的大哥商量，推说我身体不好，想把父亲送进养老院。大哥同意了，事实上，因为不能在父亲身边尽孝，大哥一直对我满怀愧疚。

父亲去世后我才听大哥说，那天他打电话劝父亲去养老院时，父亲一直沉默。后来大哥说，妹妹身体不好，时间长了会把妹妹累垮的，再说也会影响她的家庭和睦。父亲哭了，他说，我糊涂呀，我拖累丫头了。

就这样，因为我们经济条件尚好，也为了花钱买心安，弥补感情上的“欠债”，我给父亲选择了一家很好的养老院。

父亲的房间很整洁，从窗口望出去，芳草如茵，几名护士推着坐在轮椅上的老者在散步，四周寂静得令人心酸。同一个房间的大爷对父亲说：“完了，这辈子完了，孩子不要咱们了。”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当然也是怕我难过，他说：“没什么，老哥，既然孩子们小的时候要送到幼儿园，为什么咱们年纪大了就不能送到养老院呢？孩子们也不易，让咱们住这么好的养老院就是孝顺呢。”

我想起当年父亲送我上幼儿园的情形，第一次去我特别不适应，父亲便一直把我抱在怀里，直到进了教室，他才依依不舍地把我交给老师。初去的那几天我总是哭闹，父亲每次都要站在幼儿园的栅栏门外头，看我玩一会儿才离开。

那天，初到养老院，曾经在家里顶天立地的父亲，像个无助无奈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是否也会不适应，是否也会盼着有一天我来接他回家。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从身后抱住父亲，泪如泉涌……父亲忍住泪，拍拍我的头对同屋的大爷说：“丫头舍不得我来，是我自己非要来的。”后来我每次去养老院，父亲都会这么说，是说给他自己听，也是说给别的老人听。

尽管我内心很矛盾，很挣扎，但理智最终还是让我硬起心肠和父亲告别。父亲微笑着说：“你放心地走吧，我没事的。”我逃也似的离开那里，生怕自己多待一分钟就会改变主意。



历史上那些不正经的真事儿

●张发财

郑和回来就给朝廷发快报，说找到传说中的麒麟了。明成祖高兴坏了，看过之后还让人画了下来留作纪念。500年过去了，再看那头麒麟——原来是头长颈鹿。

你以为皇上都用文言文吗？故宫清点时发现一份奏折，内容是大臣进呈了10张米芾的字。乾隆很重视，朱笔御批写道：“是假的，不要。”

曾国藩写挽联有瘾，死的写完了就偷偷给活人写。汤鹏

去曾先生家里玩，就看到过曾先生给他写的活人挽联，差点气吐血。

清兵与白莲教作战的时候，第一排是乡勇，第二排绿营，最后是旗兵。白莲教那边则是驱赶难民在前面打，教徒在后面起哄。乡勇和难民厮杀完，两边就撤了。这不是打仗，是下象棋。

戊戌变法中梁启超名声大噪，于是受到皇上接见，怎奈他的粤语光绪一句都听不懂，改口的普通话比粤语还难懂。两人就愣着互相瞅，像初次相亲的男女一样尴尬无言。

同盟会元老张继被袁世凯通缉，狼狈逃窜到日本，有一个日本小子恭维他说：“您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写得真好啊！”

民国时出过“一折八扣”的特价书，也就是说在打一折的基础上再打八折，定价一块的实际卖八分。卖得正火，谣言就起来了：这种书用

的是日本纸，鬼子在纸里下了药，中国人边蘸唾沫边翻书，看完就给药死。

徐志摩这个名字是21岁他出国前他爹给起的。因为他小时候有个叫志恢的和尚摩过他的头，他爹想了想，就叫“志摩”啦，真真无厘头。更无厘头的是他有个笔名叫“删我”，嗯，可以给网站做编辑。

请看赛金花写给韩复榘的诗：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低头掠鬓鸦。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币赏残花。

张大千被绑架之后给家里写信，因为字写得太漂亮，绑匪头目不放了，活生生变成了绑匪的账房先生。

俞平伯的书房叫“古槐书屋”，还以书屋的名义写了两本书：《古槐梦遇》《古槐书屋词》。后来自己发现认错了，那不是槐树，而是榆树。情何以堪呀情何以堪！

（刘欣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个都不正经》一书，潘远熙图）



把父亲送进养老院的两个月后，我竞聘当上了一个部门的主管，我很想做出成绩来证明我自己，于是总得加班。先生在北京工作，根本顾不上家事，孩子的学习成绩不理想……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照看父亲。坦白地说，很多时候我去养老院看父亲都是敷衍了事，怕别人说我把老人扔进养老院就不管了。

三

如今，失去父亲的痛和内心的拷问，沉得就像一座永远搬不走的大山压在我的心头。有时在路上看到养老院的牌子，我也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同学聚会那天我穿的那身衣服，被我压在了柜底。聚会的头一天，原本是我和父亲约好去看他的日子。但是因为聚会，因为在聚会上会见到那个我

曾经心仪后来错过的男人，我在大街上流连，买了一天的衣服。第二天上午，我本来还可以去看父亲的，我却打电话给父亲说单位有急事要加班，事实上，我在美容店里做了一上午皮肤护理。我不知道，那就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说话。几个小时后，我失去了父亲。

现在我想孝敬父亲，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有调查资料显示：90%的老人不愿意住进养老院，他们需要的是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养老院中，60%的老人是从考虑子女的难处出发而入住的。父母的爱是天下最伟大、最无私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父母健在时，我们要尽心。

（邓卉卉摘自新星出版社《百年无废纸》一书，李小光图）

杰克在减速前盯着仪表盘看了好久，上面显示：在限速55迈的区域内时速为73迈。这已经是这个月中的第四次啦，和几个月以来超速的次数一样。一个人怎么会如此频繁地驾车超速呢？这正是让警察担心的潜在交通事故隐患！

车速降到每小时10英里后，杰克将车停靠在路边，但发动机没有停。警察从车里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便笺本。

鲍勃？教会的那个鲍勃吗？杰克缩头往大衣里藏。这比即将来临的罚单更糟糕。警察刚做完礼拜就逮着一个超速行驶的司机，而这位司机经过漫长的一天工作后正急着回家，而且明天还准备和友人一起去打高尔夫。

杰克跳下车，走向那个每个礼拜天都会遇见的人——之前从未见他穿过警服。“嗨，鲍勃，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你。”

“你好，杰克。”鲍勃面无表情地说。

“你知道，我本想赶回家见我的妻子和孩子，没想到被你当场逮到了。”

“是的，我想是的。”鲍勃看起来不是很坚决。太好了。

“我最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我想我违规了一点点——仅此一次。”杰克不安地用脚尖磨着人行道上的鹅卵石，“黛安说她今晚烤了牛肉和土豆，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还知道你在社区有个好名声。”唉，不该提这个话题，得改变策略。

“那你准备把我关多久？”

“70天。能请你回到你的车上吗？”

“请等一下，鲍勃，我一看到你查看了仪表盘，只是65迈。”这似乎是每个人遭遇罚单时最常说的谎言。

“杰克，请上车。”

杰克有点不安，只好弯腰坐回门一直开着的车里，并砰地把

车门关上，然后盯着仪表盘，却不急于打开车窗。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而鲍勃匆匆地在便笺纸上写着什么。他为什么不扣下杰克的驾照呢？

不管什么原因，这段时间比以前杰克与这位警察坐在一起时要难熬。听到拍车门声，杰克转头看左边。鲍勃手里捏着一张折叠的纸。杰克把车窗降落仅仅两英寸，仅够鲍勃把纸条递进去。

“谢谢。”杰克忍不住冷笑声。

鲍勃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回到警车内。杰克从后视镜里看到他走了，然后打开了纸条。这次

会罚多少钱？等一下，这是什么？一个恶作剧吗？这肯定不是一张罚单。杰克开始阅读：

亲爱的杰克：

我曾经有一个女儿，在她6岁时被车撞死了。你能猜到——这得怪一个驾车超速的司机。他只是收到一张罚单，然后监禁3个月就被释放了，就能自由地拥抱他的女儿们。他有3个女儿。我只有一个。我想，我得等到上天堂后才能再一次拥抱她了。我曾无数次试图原谅那个司机，我曾无数次认为我已经做到了。也许我已经做到了，但我还要再做一次，即便是现在。为我祈祷吧。杰克，开车小心点，我现在只有一个儿子了。

鲍勃

杰克回头看到鲍勃的警车开始移动，向路的另一边驶去，直到消失不见。整整15分钟后，杰克也启动了车子，慢慢地开回家。他心里祈祷着能得到宽恕，并希望当他到家时能给妻子和孩子一个惊喜的拥抱。

（燕泥摘自《英语广场·美文》2012年第8期，李晓林图）

一张罚单

●Manfred Koehler



[[读者·2012·11]]

居不易，死也难；活在北京，葬在河北。

——据报道，北京墓地价格10年涨了15倍，目前已经没有低于2万元的墓地。北京市民纷纷前往河北、天津等地买墓

我们需要将来能改变世界的人。

——宁夏的一名高考落榜生被哈佛大学录取，并给予全额奖学金。这位姓杨的学生花了很多精力建立一个非政府公益组织，支援西部教育。哈佛方面对此作出如是解释

县长如果月入1200元，县长也“荒”。

——有人妙解“民工荒”出现的原因

国企和民企竞争，好比皇帝和大臣下棋，大臣不敢赢，赢了麻烦大。

——经济学家张维迎

拆迁不是建住宅就是建工厂，都是好事。但我们习惯用土匪的方式干慈善家的义举。

——崔永元谈“强拆”

树不可长得太快。一年生当柴，三年五年生当桌椅，十年百年的才有可能成栋梁。故要养深积厚，等待时间。

——毕淑敏

中国可能还是会拯救欧洲的，只不过不是通过债券市场，而是通过中国游客带走的一件件行李。

——英国《金融时报》

死记硬背能让你通过大学四年，但是会榨干接下来的40年。

——语出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

每当打扫卫生时，学校会



说：“学校是你家。”可当你一迟到，学校就会说：“你当学校是你家呢？”

——小学生的抱怨

去欧洲或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要做我现在做的事情，不要学习我过去做过的事情。

——本·拉登的一名亲属称，拉登生前曾这样教育他的孩子们

船既遇险，船长督促船员救护。既知无可为，乃发令下小艇，小艇既备，又令男子退后，妇孺登艇。男子闻令即退，无有喧哗。

——泰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故事就被写进了民国小学课本。此书出版日期是1912年6月，即中华民国元年。100年前的小学课本与时事联系如此紧密、反应如此之快，让人惊讶

中国有两种消费者：一种是在乎钱的普通人，太贵他不要，最好能让他感觉占了便宜；另一种是在乎钱的暴发户，太便宜了他不要，最好能炫富。

——李开复

这个世界变了，事业线从掌心移到了胸前。

——网友烟薰

近5年，不少病人常常问我一个问题：我不抽烟、不喝酒、注意饮食，为什么也会得肝癌、胃癌或者肠癌？我家很干净，为什么孩子会得白血病？这使我越来越感觉到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污浊、饮水有害、食物有毒、家具有味的环境里，再好的生活习惯也会得病。

——钟南山

人的核心竞争力超过一半来自不紧急的事：读书、锻炼身体、与智者交朋友、业余爱好……

——王利芬

谁有办法治理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呢？

——戴高乐的名言。再次竞选总统的萨科齐不喝法国人引以为傲的红酒，近来又宣称不再吃奶酪，有分析指出这更让法国国民难以接受

景点风景迷人，文化底蕴醉人，历史故事诱人，导游忽悠骗人，游人陋习损人，旅游饭店宰人，门票贵得吓人。

——游客谈旅游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如此不同。

——钱颖一

其实忘记一个人挺简单：不要见，不要贱。

——饭否语录

（阿门、苏童、许朗、生如夏花、从容、彦凌、莫难等摘）

故乡最伤心

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结。

1900年11月，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石匠家庭，他从小就对色彩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总缠着母亲去村里新开的染坊看颜料。林风眠的母亲地位低下，丈夫和婆婆对她冷漠苛刻。这个单纯美丽的瑶家女子和年轻的染坊老板坠入爱河，相约私奔，却不幸被族人抓了回来，绑起来拷打得鲜血淋漓。年仅6岁的林风眠突然冲出来，大声哭喊，手里举着菜刀向人群乱挥。孩子被强行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他变得沉默寡言。成年后林风眠多次打听，有人说母亲被卖到山区不知所踪，有人说母亲被浸了“猪笼”。直到晚年，林风眠还常喃喃地说，如果没缠着母亲去那家染坊，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1919年12月25日，在新式学堂美术课上显露天分的林风眠踏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离开了故乡伤心之地，从此再没回来过。

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殿堂，林风眠不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他为塞尚、莫奈、马蒂斯等离经叛道的画家所倾倒，又在巴黎东方美术馆和陶瓷博物馆的彩陶、汉画砖、唐三彩、瓷器花纹上发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奇特魅力。1924年5月，法国东部举办中国美术展，正旅居法国的蔡元培作为重要嘉宾出席，他被林风眠的《摸索》深深吸引。蔡元培赞叹画家的艺术天才，几次和夫人去林风眠的住所看望他，见他生活清苦，还给他3000法郎作为资助。

那时的林风眠不仅艺术上初露锋芒，且新婚燕尔，感情甜蜜，可谓少年得意。可是他与德国妻子罗达结婚没多久，罗达就在分娩时染上产褥热，与婴儿一同离世。爱妻是为了孩子而死，联想到自己的母亲，林风眠被深重的悲伤和宿命感吞噬。

被“架”到北平当校长，请齐白石出山

1925年圣诞节过后，林风眠偕第二任妻子阿丽丝回国。在新加坡中转上船时，林风眠与徐悲鸿不期而遇。说来也奇，两人同在巴黎美术学院求学，之前竟从来没见过面。在学院派的徐悲鸿眼里，林风眠热衷的塞尚、毕加索都是“欺世盗名”的“祸害”，且两人一个是官费留学生，一个是勤工俭学的自费生，境遇有明显差距，不在一个交际圈。徐问林风眠回国有什么打算，林老老实实地说还在找工作，没有着落。林风眠哪里知道蔡元培已经保荐他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只是介绍信寄去时他已上了轮船。他们的船刚在上海抵港，就看见岸上有大红条幅上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一名学生挤上船喊着：“我们来接林风眠校长，谁是林校长？”林风眠连忙躲开，说：“我是林风眠，但我不是校长。”年仅26岁的林风眠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架”到北京，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

林风眠上任，他请了齐白石来任教。那时齐白石虽已63岁，可还未真正成名，是正统国画家讥笑的“野狐禅”。艺专国画系教

孤鸿林风眠

● 李响



师群起反对，说齐白石这个木匠从前门进来，我们就从后门出去。齐白石也自嘲是个乡巴佬，不肯到洋学堂教书，但经不住林风眠一次次登门劝驾。林风眠给老人专门备了把藤椅让他坐着上课，下课亲自送他出校门。齐白石握着他的手说：“林校长，我信得过你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一年之后，蒋介石发起清党政变，林风眠的同乡好友、一同留学欧洲的熊君锐在中山大学任教时被特务杀害。林风眠深受刺激，本来不问政治的他抑制不住愤懑，挥笔画下了他的名作《人道》，宽幅油画上充满锁链、绞架和无数殉难者的形象。他组织学生到民间写生，了解民间疾苦，举行北京艺术大会，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这些活动让北洋政府颇为紧张，教育部部长刘哲扬言林风眠是共产党，向张作霖建议把他抓起来枪毙，幸亏张学良说了句话：“林风眠一个画画的，没什么了不得的，放他一马吧。”一句话的救命之恩，林风眠记了一辈子。1989年，在离世前两年，林风眠到台北办画展，专程去看望了张学良。

压力之下，林风眠愤而辞职，南下杭州，其间又画了《人间》和《痛苦》。1931年，蒋介石偕宋美龄回奉化老家小住，途经杭州，专门到艺专参观，林风眠陪他看画。看到《痛苦》时，蒋介石脸色很难看，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这是促使林风眠画风转变的一个关键事件，此后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调转向明朗色调，由写实转向写意，由象征变为表现。

诗意居西湖，高徒遍天下

林风眠辞职后到杭州筹建艺术院并任校长，又是拜蔡元培鼎力支持。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改造国民性；而林风眠在北京艺专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让学生走出画室到民间创作，与蔡元培不谋而合。蔡把林风眠当做教育思想上难得的忘年知己。为给林风眠壮声势，蔡元培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题写校名，介绍自己的长女、画家蔡威廉来当老师。典礼结束，蔡元培当晚就下榻林风眠在西湖边的小木屋，而不去住已给他安排好的豪华旅馆新新饭店，一时成为新闻。蔡元培住了好几天，杭州各界名流要拜访他都得到林风眠家，这样就帮林风眠在杭州文艺界打开了局面。

杭州艺术院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独立艺术院校的开始。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董希文、席德进、苏天赐……林风眠直接培养出的学生撑起了现代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深深影响了一代艺术家，至今被美术教育界视为先进。他鼓励学生释放天性，口头禅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放松一点，随便些，乱画

嘛。”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洪毅然在艺专上学时绘画拘谨，林风眠劝他作画前先喝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

执掌校政的十年是林风眠一生最辉煌的时光，在西湖边诗意的栖居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段安居乐业、享受天伦的日子。他在玉泉道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二层小楼，室内的壁橱、墙壁、天花板清一色本色木板装饰，学生们形容这是西方小说里才有的建筑，周末学生们就欢聚于此与他聊天。二楼是画室，除了最亲近的朋友和学生没人可以上来，他常在此通宵创作，取一两幅满意之作，其余废弃一地，第二天早上由佣人扫走。园内遍植梅、桂、梧桐、凌霄，还有林风眠亲手培育的玉米、草莓等作物。今天这座小楼仍安详地坐落于杭州植物园大门旁，吴冠中为老师的故居题写了匾额。

隐退重庆，孕育“风眠体”

1937年8月，日军铁蹄南下，终结了林风眠在杭州建设“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重镇的梦想，也击碎了他安稳美好的生活。他带着妻子女儿准备到上海定居，在南昌路找了一幢二层小楼。没住多久，汪伪政权的高官找上门来邀林风眠出山，林风眠当然不肯当汉奸，决计马上离沪。因不忍妻女跟着他颠沛流离，他孤身辗转香港、河内、昆明，最后到了重庆。

他托陈布雷在政治部设计委员会谋了个虚职，领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隐居在嘉陵江边军政部的一座仓库里。这仓库是土墙黄泥地，与他西湖边的小洋楼有天壤之别，林风眠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近七年，自己买菜、生炉子、烧饭、洗衣、打扫，屋里只有一张木桌，菜刀、砧板、油瓶堂皇列于画纸、毛笔之侧。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建群爱好书画，专程来拜访林风眠，见如此陋室，不禁感慨道：“住在这种地方的，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您得道了。”林风眠事后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的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的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李可染当时也在重庆，经常会带点便饭去看望老师，每次去都看到林风眠在画画，每日画几十张，画完的画堆在身后，直擦到屋顶。苦行僧般的清苦生活使林风眠能集中全部精力创作，他融合中西的“风眠体”就在这个江边仓库横空出世。“风眠体”的第一大特色就是方纸布阵。中国传统纸绢画不是横卷就是立轴，便于富贵人家悬挂于厅堂，林风眠大胆突破传统，转向更利于制作画册供大众观赏的方形构图。不画传统的峰峦山谷等宏大景

色，而画近景特写。他使用生宣、毛笔、水墨、水彩等中国传统材料，但技法汲取西方画的精微光色。他自嘲是个好“色”之徒，打破“水墨为上”的古训，运用浓重艳丽的色彩描绘仕女、花鸟、秋林、泊船。线条的灵感则来源于汉画砖、唐壁画。鲜艳的色彩，简洁灵动的线条，美好的意象，这就是林风眠画中的赤子之心。

抗战胜利，避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纷纷北归。因有行李重量限制，林风眠上飞机前把自己所有的行李都扔了，只带上在重庆期间的所有画作。到了杭州，他直奔旧居，眼前景象令人断肠：他的小楼这些年被日军占为兵营，花园成了马厩，他曾震动国内外的巨幅油画《摸索》《人道》《人间》《痛苦》都已被扯碎，用作马匹的挡雨布……

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带回的这批新画，有一天也将被他亲手摧毁。

独居上海片刻安宁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林风眠十分兴奋。他虽然从不参与政治，但对共产党抱有天然的信任 and 好感。跟他乘同一条船去法国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后来都成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法国期间他还认识了周恩来，两人结成君子之交。林风眠与中共高级将领叶剑英的关系更不一般，他俩是梅州同乡，读中学时坐同桌，还一起办了诗友会。林风眠激动地对学生们说：“叶剑英肯定会支持我，说不定这个学校就能按我们的理想办！”

现实很快证实了林风眠的天真。杭州艺专二十几年来都沿袭林风眠因材施教、解放个性的教育方针，在被接管后，学校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有教学体系一概推翻，把“线描形式，宣传画题材”当做唯一信条，甚至摆出石膏像让林风眠当场写生作为“考试”。

“与其受批判，不如早辞职。”林风眠携眷回到上海南昌路的小楼居住，他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生活虽苦，倒也自由清静。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林风眠的法国夫人住不惯，加上经济压力大，1955年，夫人和女儿、女婿离开上海去巴西投奔亲戚，林风眠又成了孤家寡人。他把一楼退掉，只租二楼，160块的房租只需付80，压力减轻不少。早年的留学和重庆隐居生涯使他锻炼出娴熟的烧菜手艺，照顾自己不成问题。他最擅长的是客家传统菜梅干菜烧肉，常常一煮一大锅，配稀饭连吃好几天。电影明星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住在附近，柳和清常来林家做客，林风眠请他吃梅干菜烧肉，特别透露，秘诀在于他的独家酱汁：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却。后来，柳和清在香港和北京开了著名的素菜馆功德林，用的酱汁就是林风

眠传授的配方。有的时候，林风眠还会煮咖啡给来访的客人喝，他习惯在咖啡中加上少许白兰地，美酒加咖啡颇有异国风情。他吃西瓜的时候会在西瓜中挖一个洞，然后也往里面倒入少许白兰地，这样吃起来就会格外爽快。

孤雁离群逝香江

闲适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几年。1966年，傅雷自杀给了林风眠致命一击。傅雷与林风眠是20多年的至交。林风眠当校长时，杭州艺专学生人手一本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那是年轻人必读的“圣经”。傅聪在英国结婚时，傅雷特意买了林风眠的画给儿子寄去作礼物。傅雷为人单纯正直，爱发时事议论，他劝林风眠不要太超脱，而林风眠凭着他的敏锐和早年的教训，也总劝傅雷不要事事参与。尤其是“大鸣大放”期间，他劝傅雷“适可而止”，傅雷不听，结果被划为右派。

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家中双双自尽。得到消息后，林风眠不敢相信，派学生去傅家证实。林风眠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他决定毁掉自己几十年来所有的画，以绝后患。这是中国美术史上讽刺而残酷的一幕：画家关紧门窗，烧画的烟把他的脸熏得乌黑。他怕烟囱冒烟被人发现，又改了办法，把画撕碎，泡成纸浆，然后从马桶冲下去。据义女冯叶回忆，林风眠的表情坚毅决绝，一反平时的和蔼可亲，帮他毁画的学生舍不得撕碎其中几幅精品，林风眠毫不犹豫地：“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

画还没毁完，抄家的红卫兵就到了，橱柜都被贴上封条，林风眠和上海其他知名画家都被送到上海美术馆进行政治学习，接受审查。1968年，刚刚从美术馆放回家住了几天的林风眠被公安人员带走。直到预审，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特务”。由于拒不承认“罪行”，他的双手被反铐起来，手腕肿得厉害，手铐都嵌进了肉里。吃饭时也不给解铐，他就把嘴凑到饭盆边吃以求生存。他的许多朋友都自杀了，他说：“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1972年年底，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林风眠被释放，他不敢再画画，带着一身伤病艰难生活。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说有外宾要接见他。匆匆赶去，外宾竟是30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当年赵无极就读杭州艺专，生性叛逆，特别不喜欢必修的国画课，从教室窗子跳出去逃课。在国画期终考试的试卷上，他涂了一个大墨团，落款“赵无极画石”，惹得国画教授潘天寿大发雷霆判他零分，他险些被强制退学。林风眠爱惜赵无极的天赋，坚决把他保了下来，在他毕业后还让他留校当助教。后

小人物与孙中山

●裴毅然

孙中山在回忆录中说：“拳乱结束时，我回到美国。当时我急需一种比军队和武器更为重要的东西，没有它，这两者都不会有，那就是钱。不是指我曾从各处得到的那些款项，而是至少要有50万英镑。没有这么多的钱，就会失败。于是我开始扮演一个新角色，即政治基金的募集人。”在募集过程中，有一位费城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了孙中山下榻的旅馆，塞给孙中山一只麻袋，一声没吭就走了，麻袋里是他20年的全部积蓄。

一次，孙中山在国内“南京”轮上，一位姓金的跟随者走进他的舱房。他说：“孙，我是一个穷人，我有妻子儿女。”经验丰富的孙中山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有人出100大洋让你出卖我？”那人说：“还要多些。”“那么，1000？”

“5000，孙。你只是一个，而慈禧可以要许多人的命。她恨你，她决心要砍掉你的脑袋，那时候你的头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你现在把它给我，就可以使我们

全家富裕和幸福。”

孙中山说：“的确如此，我的头对于我一文不值，但是，它对于你难道就很值钱吗？因为如果你把我出卖了，官员们不仅会从你那里把那笔钱统统夺走，而且你的孩子，还有别人家的孩子会继续穷困下去，千百年如此，永远没有尽头。金，听着，我现在是你的了，我的头就是你的头。你愿意拿你自己的头去换5000大洋吗？天

命无常，尽管去报告你的主子，我就在这船上，绝不会离开。”

那人跪倒在孙中山脚下，乞求宽恕，然后离去。

第二天，孙中山听说那个人投水自尽了，心里非常难过。因为那个人说过，他为有过想要把孙中山出卖给敌人的可耻念头而感到无地自容。

一位献出20年积蓄的华人洗衣工、一位天良未泯的自尽者，以及无数这样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凝成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天幕，托举起孙中山这么一位辛亥巨人。

（笨花摘自《羊城晚报》2012年2月8日）



孙中山

来赵无极赴法国留学并定居，竟然成了“外宾”。众目睽睽之下，赵无极疾步奔到恩师面前，长跪不起，林风眠老泪纵横，俯下身来，师生抱头痛哭。事后，林风眠对人说，这是赵无极要救他呢，“外宾”如此重视他，造反派也不敢再把他怎么样。

“文革”结束后，林风眠在叶剑英的帮助下被批准出国探亲。他被允许带走34幅旧作，换得一张从香港到巴西的单程机票的外汇，转机四次，飞行40多个小时，到巴西看望分别22年的妻子和女儿。临行前，他把带不走的画全部赠予朋友。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鹭鸶图》，这幅画至今挂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如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林风眠晚年客居香港，深居简出，凭记忆重画在“文革”中毁掉的作品，几乎一直画到生命的终

点。他一生颠沛流离，没有时间整理画册，更谈不上出版全集，以至于今天市场上林风眠画作的赝品不计其数。林风眠虽与徐悲鸿、刘海粟齐名，他的作品却因真伪难辨价格远远落后。

1991年7月，因心脏病突发住在医院里的林风眠，应傅聪之约题写了“傅雷纪念音乐会”几个字，落款林风眠。这是他对老朋友最后的交代，也是他留给人世的绝笔。

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这样写到林风眠的去世：

九十二岁的八月十二上午十时，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

“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

“画家！”林风眠回答。

（眉黛烟青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3月下，李晨图）

[[读者·2012·11]]



另一种旅行

● 丘 山

妈妈常常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旅行去了。

说是旅行，其实去的并非是名胜古迹、著名景点之类的地方，妈妈的旅行只有一个目的地：乡村。有一次，她去了一个

“连屋里都是泥巴地，一到晚上就没电”的小村落，回来时拎着村民送给她的一大袋子鸡蛋。“全是在他们自家鸡场里现捡的，非要塞给我，说是没污染。我怕打碎了，一路上不敢睡觉，一直抱着回来的。”妈妈说。

对这种毫无预兆的出行，爸爸颇有微词。那之后，妈妈每次出发前都会包好几格饺子冻在冰箱里，像是说：抱歉啦，下乡去了。

说是旅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惬意。有的长途车像拖拉机，一路开得摇摇晃晃，突突突地直冒烟，扬起满天满眼的沙。妈妈跳下车，找着一家客栈稍事安顿，就独自循着麦田而去了。有一次，她跟花花草草玩得忘了形，等反应过来时，竟然迷了路。她又走了好一阵，才看见一座小村庄从路边冒了出来，忙前去问路。几个村民立刻围拢过来给她指方向，还问要不要摩托送。她犹豫了一会儿，拒绝了。没想到回客栈的路越走越远，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她紧赶慢赶，天色却暗得更快。这时远处来了个骑摩托的中年人，挺壮实。她连忙抬手拦住他，托他把自己送回客栈。那男人只说了声“你坐好”，就载着妈妈赶路。等把她送到了客栈，他二话没说，钱也没收一分，一踩油门就又呼啸着走了。“当时我坐在摩托后面，心里直打鼓，现在，我为我心里打的鼓点子很是觉得羞愧。”妈妈说。

后来妈妈去的一个湾子，临水靠山，还留存着唯一一座完整的农宅。宅子的女主人在当年应该算得上是“贵族”了，据说那时她常坐在房前给她男人绣鞋垫，净用些异常艳丽的彩线。后来全家搬进了城里，宅子也就荒败至今。其他的土房子大多也空落落的，只有屋檐下悬挂的一双布鞋表示此处还住着人。屋外的河面长满青苔，岸边遍布野草。

村民很有些自豪地对妈妈说：已经用上自来水了呢。

50年前，这里还来过一个讨饭的女人，河南来的，带着个小孩。母子二人在湾子里转了三日，才被一户人家收留。那家人有兄弟两个。大哥本来在学校教书，遭人诬陷后坐了几年牢，放出来的时候头发都白了，大半年说不了话。二哥考取了清华，却被大队里的“革命派”压着，不让去北京念书。给妈妈说这故事的正是大哥的女儿，妈妈称她小英嫂。她拿出5个大小各异的簸箕给妈妈看，说这全是叔叔手工编出来的。妈妈挨个接过去细看，果然都精巧异常。这么聪明的人，唉，大家叹了口气，都摇头笑着。小英嫂又指着自家屋顶说，这房子也是叔叔盖起来的。有一年村子里来了个瓦工，他就去给人当小工。只打了三天下手，就偷着把泥瓦活全学会了，房子住到现在还没倒。小英嫂止了话头，又笑道：叔叔现在快70岁了，也没有娶妻，一直打着光棍，窝在这穷山沟里。告别时，小英嫂又塞给妈妈自己种的青菜，嘱咐又嘱咐：一到家就得吃，要不就不新鲜了。

从那个湾子回来后，妈妈像被勾起了心事，有一天忽然跟我说起她第一次下乡的事。那时她才14岁，是那批下放的知青里最小的一个。她每天“发了疯似的割谷插秧，就为了能早点回去”。太阳毒辣辣的，每个人头上都戴着斗笠挡阳光，可斗笠实在太沉了，低头低久了就往下滑，得拿手扶着，脖子都要被压断了。有人受不了，干脆摘掉斗笠干活，当时倒是蛮轻松的，结果晚上回去一身水泡，肩膀上都晒脱了皮。有时妈妈一边在田里干活一边唱歌，村里的女伢就跟她学，还说：“你唱歌怎么像嗑蚕豆？”不干活的时候，妈妈就一个人背着画板爬到半山腰画素描。画画之前一定要先对着远山

[[读 者 · 2012 · 11]]

我来讲一个故事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李 静译

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遭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净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球，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这个儿子也笑了，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



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他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一个比索。”“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球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这人的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的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要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一位太太，也说要称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地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用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晒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该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的人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拨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左岸听涛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我不是来演讲的》一书，冯 煌图）

大喊几声，然后听着回音躺下来，静静看着天上的云。“不知道亲人怎样，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但死，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妈妈的旅行说走就走，那架势仿佛是“随便跳上一辆长途车，随它开到哪儿去”！但她的旅行显然有别于凯鲁亚克式的“在路上”，也和时下有关旅行的

一切潮流不合拍。她的旅行既土气又辛苦，没有血拼，只有故事。或许是被年华的衰老所触动，或许是始终无法逃出往事，妈妈一次又一次朝着乡村走去，一次又一次在旅行中摸索，穿过浓得化不开的迷雾，触摸年少时与亲人流落四处的日子。当过去已经尘埃落定，湖水、远山、芦

苇荡、油菜花，无不摆脱了绝望，一切都显得亲切可爱起来。但乡村的人烟日渐稀少，老牛在新辟出的柏油路上散步，建“高档度假村”的说法似乎也不只是传言了。只有这短短的宁静，妈妈追赶着正在消逝的它。

（冯依梦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12期，王庆军图）

[[读者·2012·11]]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婚姻

◎李宗陶

胡适一生非常有女人缘，这源于他关心女性的天性。

胡适在北大教书时，课堂内若有风，而临窗有女生，他会走过去关上窗户。1923年，有个朋友娶了一个妓女，一同投宿胡家，胡适特意写信给江冬秀，请她千万善待此女：“他（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她）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她）。”1955年11月，张爱玲到纽约，与胡适见面两次后恰逢感恩节，胡适打电话约张爱玲跟朋友们一起吃中国馆子，怕她“一个人寂寞”。

细心、体贴、绅士风度，但凡跟胡适打过交道的女性，多对他留下极好的印象。而那些爱过他的女子，也一生心怀温暖。

按照江勇振的说法，胡适的生命中主要有3个“月亮”围绕：江冬秀、韦莲司和曹诚英，其余若干星星在不同时期划过天际……平心而论，相比同时代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胡适的私生活算是检点的。

梳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八卦，或者索性直接打量他的婚姻，都可以窥见主人公的品格。

名分造就的爱

1955年，张爱玲在纽约初见胡适和江冬秀。“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这桩姻缘是在1902年胡适刚满12岁时定下的。经过

媒妁之言、算命、合八字等必经程序，由寡母冯顺弟做主，胡适与40里外江村的长其一岁、属虎、缠足的江冬秀订了婚。未来的岳母也在这一年初春来“相”了女婿，满意而归。

1908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语气悲愤，信中有言“男手颤欲哭，不能再书矣……”，末尾再署“儿子嗣糜（胡适乳名）泣泣书”。

台北胡适纪念馆存有一张1910年初江冬秀的小照：银盘脸、浓眉、宽鼻、阔唇，眼睛里有一种低回的哀怨。1913年跟婆婆家人的全家福上，双手攥着条帕子的江冬秀看起来稚嫩生涩，眼睛里同样欲说还休。两年后，韦莲司瞧见胡适口中的这位“表妹”，说她“面带戚容”。

胡适的婚姻观早早定型，大

体上保持了对中国传统婚制的认同。他认定父母之命是合理的，因为父母拥有人生经验和爱子女的心，免除了西方未婚女子同男性的周旋、讨好和猎取，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女子的尊严和贤淑。至于爱情，他认为西方婚姻里的爱是自造的，而中国旧式夫妻间的爱是名分造就的，它产生于婚后，产生在彼此各让五十步、相互妥协磨合的过程中。

他甚至描写其中东方式的美感：一对未婚男女经媒妁相连，彼此又见不着面，难免生出许多遐想，每每听见对方的名字，胸中有如鹿撞，直到新婚之夜揭了盖头……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有通信。顺从、抗拒、遐想、疑虑、矛盾、随缘，他在种种复杂的情绪里徘徊，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没有推翻这门婚事。他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在1934年诗人梁宗岱与发妻离婚事件中，他就始终站在女性一方——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开始登场。他要江冬秀放足，要她读书识字并给自己回信，期待“他年闺房之中，有执经问字之地，有伉俪而兼师友之乐”。

但很快，他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随着阅人历事，他认清了一件事：“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对于江冬秀拙朴的家书，他持鼓励态度。有一次，胡适在回信中道：“你这封信写得



胡适与江冬秀的结婚照

[[读者·2012·11]]

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缨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你信上说：‘请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主张。你大远的路，也管不来的。’他们听了都说：‘这是很漂亮的白话信。’”

胡适性格中的积极和他的温存，让这些家书诞生并有了意义。

江冬秀不一般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的出生地离胡适家只有15米，是同族本家。他说，江冬秀不一般，她虽是一个旧式女子，但既不死板也不保守。

在北大那些年，各路爱慕者写给胡适的信足有两大箱，搬家时胡适要扔，江冬秀都保留下来。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北大女诗人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江冬秀写信给胡适：“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Mr.Charming），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适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热恋着曹诚英时，胡适动过离婚的念头，但被江冬秀携子赴死的警告给吓醒了。江冬秀最戒备的情敌可能就是曹诚英，但她懂节制。胡适住院，有一天江冬秀推门进去，看见曹诚英躺在胡适身旁，她也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胡适要为徐志摩和陆小曼主婚，她因猜忌陆小曼闹过，但最终为要面子的丈夫留了面子。她知道韦莲司的存在，但她能够容忍丈夫保有这位遥远的“精神上的伴侣”。

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

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装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

在纽约，江冬秀面对贼人大喝一声“GO”的段子是唐德刚讲开的。何炳棣则讲了另一段——在一次美好的午餐外加抽完一支烟的轻松情绪里，胡适把领带翻过来给他看一个小秘密：领带下端有一小拉链，内藏一张5元美钞。胡适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

不断有人发掘出江冬秀抓大放小、粗中有细、仗义疏财、大气豪迈的种种事迹，特别是她对官场的厌恶和对丈夫“千万不要做官”的劝诫，都被归为“自有识见”。1938年11月24日，胡适致江冬秀的家信中说：“现在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到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族人）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

一些知识分子前辈因为敬爱胡适，可惜他一朵鲜花插在一堆小脚牛粪上，总爱捕捉江冬秀村妇的一面。江勇振却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没有念过多少书，却有办法让丈夫知道她的心，他们两个之间一定有着特殊的感情。

胡适曾作诗《病中得冬秀书》：

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
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
我不认得她，她不认得我。
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
名分何以生情？良心而已，
担责而已。

1921年8月30日，胡适与高梦旦交流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的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在公开场合，胡适很乐意扮演惧内的角色，也爱讲世界各国怕老婆的笑话，这其实是一种“善待妇人”的姿态，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期待。知子莫如父，长子胡祖望曾对何炳棣说：“炳棣兄，请问哪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

江冬秀一生爱好者，麻将也。在这方面，胡适也能适应并交流。“中研院”现存的十几封家信中，有一封就是已经做了爷爷的胡适跟老妻讲麻将的。

唐德刚曾说，这位福相的、爱打麻将的太太是中国传统旧式婚姻中最后一位“福人”。这份福，有胡适的一半功劳。晚年胡适曾对秘书胡颂平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孙光星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9期）



●王晶晶

为鸡蛋而暴走

41岁时，管敏正决定“用脚投票”。他和朋友们打赌：如果他在崇明岛上走完50公里，他们就要依照赌约，每人为西南贫困地区的孩子捐一定数量的鸡蛋。

就在几个月前，这名上海律师还和大多数人一样站在慈善的起点。他在大灾大难时“跟着捐款”，可他不知道自己的钱捐到了哪里，感觉那与自己“很遥远”。直到他在媒体上看到了“郭美美”这个名字。生气之余，管敏正把目光投向了民间公益组织。

一个鸡蛋的暴走

“一个鸡蛋的暴走”，是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为了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而设立的一个募款项目。每个鸡蛋成本8毛钱，176元就可以让一个孩子吃上一学年的鸡蛋。

有61个人被这个简单的愿望打动了。按照“游戏”规则，出发前，他们向各自的朋友发了一封邮件：“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决定参加‘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对于一把年纪而且有点儿路痴的我而言，说没有问题那简直就是骗人……所以，为了让我走得更有动力和意义——如果，我能够顺利完成50公里大暴走，你是否愿意捐点儿鸡蛋？”

张帆就意外地收到这样一封邮件，她选择参加这个活动。

管敏正和张帆站在同一个起点。30公里过后，队友们的距离拉大了，闲聊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每个人只顾着低头走路。张帆觉得自己身上就好像“背着鸡蛋一样”，管敏正的底底被磨出了水泡。

他们最终没能坚持到终点。张帆把标着“36公里”的催款邮件发了出去，管敏正索性自己捐了5000元。不久之后，他们在活动网站的一段视频里看到，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小男孩一只手指拉着妈妈，另一只手的食指指着嘴唇，腼腆地对回访志愿者说：“好吃！”

在千亿慈善捐款面前，一个8毛钱的鸡蛋几乎不值一提，但经过管敏正和张帆他们的努力，4434个小朋友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学年里，每天实实在在地吃上一个白水煮蛋。

自己的行动

6个月后，管敏正又参加了上海崇明岛暴走。这次，共有1000多名工薪阶层青年参加。尽管最终募集到的67万元算不上多大的数额，但其中77%来自公众募捐，这个数字让组织者高兴不已。就国内而言，目前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还是企业和机构——公民社会尚不成熟，面向公众募捐比面向企业要困难许多。

这种困难在2011年6月过后显得更加明显。曾有媒体记录了这样一个小细节：一家基金会恰好在街头进行“月捐”宣传，本想通过公众持续、小额的参与帮助弱势群体脱贫，然而，志愿者在街头劝募时，路人却以“冷眼”相对，甚至有人直接问，郭美美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而在天涯社区公益总监梁树新看来，“郭美美事件”反倒给了微公益一个机会。“这是微公益的升级年。”他说。

梁树新就曾发起过“铅笔换校舍”的活动，他用广西贫困小学学生的一支铅笔在微博上成功换到了价值12万元的物品，这些物品竞拍后的资金重建了学校的围墙、厕所和操场。

第一个参与交换的是一个名叫“路人甲”的网友，他用一块明治巧克力交换了铅笔。接下来，巧克力变成了电饭锅，电饭锅又变成了打印机……一周内，梁树新就超额实现了目标。

梁树新觉得，慈善就是填一张汇款单的时代应该过去了。“以前，慈善无非就是两

种形式：要么体制至上，要么精英至上，这些形式老百姓根本参与不了。但是现在的微公益改变了以前传统的慈善模式，借助互联网平台，它几乎做到了零门槛。”他说。

动动手指就可以做公益，这样的事如今已经有了一个特别的名字——“懒汉行动主义者”，他们信奉“少即多”的理念。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懒汉”故事是：一家国外网络游戏企业设计了一个页面（<http://freerice.com>），邀请玩家回答问题，每答对一题，网站将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捐赠10粒米。两年后，“懒汉”们捐出了2200万碗粮食给饥荒人群。

做慈善也可以是请客吃饭。就在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时，梁树新和同伴们继续在贵州山区推行免费午餐项目。在淘宝商店里，只需点击“立即购买”并支付5元钱，就可向贫困地区的学生提供一份午餐，包括一份米饭、一个水煮蛋、一份汤菜，每星期还有两顿肉。

梁树新乐观地认为，每个人其实都心存善意，关键是如何找到激发点。5元钱操作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不会让人感到太大的压力。

是不是该做点儿什么

慈善机构爆发信任危机后，社会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人。

由于全国登记注册的基金会在2011年又增加了300多家，很多对传统慈善机构不信任的人开始自己单干。

一个为盲人录制有声读物的图书室，一家线上低价售卖二手服装的公益组织，都可能成为人们释放善意的平台。

2006年，几个来京务工的青年在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皮村创办了这样一个空间——同心互惠公益商店。这家商店接受社会捐赠衣物，略有不同的是，他们将衣物出售，每件卖几元钱，扣除必要开支，再把收入用于其他公益项目。他们甚至为商店创作了一首歌，四四拍，不过上来就是句大白话，“这里有一件件传递的衣服……”

公益商店的创办者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孙恒等人。这个艺术团在北京小有名气后，他们开始接收到一些机构捐赠的大批衣物。起初，他们把二手衣服直接拉到工地上发给工友，没想到现场一片混乱。有人不管衣服是否合适就拼命抢；也有人冷冷地站在一旁，觉得这种施舍有辱尊严。

于是，他们想到了公益商店的模式。5年后，皮村附近已有10家分店，并在北京拥有6个代收点。

晚上6点过后，工友们大多下班了，这是商店一天生意最好的时候。卖得最好的一直是男裤，6

元至10元一条，总是供不应求。每周4天，商店工作人员都得开着面包车在北京上门收旧衣服。和几年前相比，如今的捐赠量已经翻了几番。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不信任别人，自己也不做，还要骂人。”

只是，抱怨别人的人自己也该想想：我是不是该做点儿什么？

大多数时候，善意并非无处安放。它可能就在一双小小的二手童鞋中。

201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北京一位普通捐赠者的手机上突然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您是紫萱小朋友的家长吗？我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在一个公益机构得到写有紫萱名字的一件衣服和一双鞋子，我女儿穿上就不愿意脱下，她没穿过这么好看的鞋。我们是外来打工的，每月除了日常开销没有多余的钱给女儿买漂亮的鞋子。看着一脸幸福的女儿我很感动。紫萱一定非常漂亮，我从她的鞋和衣服中看到了。”

捐赠者没有想到，受助人竟然沿着衣服里的蛛丝马迹找到了他们，那本是女儿幼儿园老师要求写在衣服上的标志。她更没有想到，自己这份小小的善意，竟为另一个陌生的女孩儿点燃了一盏幸福的灯。

（摇曳生香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14日，王青图）

易中天妙解 “教师”之职

●张斗和

一次，有记者采访易中天，请他谈谈教师在其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易中天是这样回答的——

抱歉，我不太喜欢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诱供”的嫌疑。许多记者这样问，无非希望受访者回答“教师是一种崇高的职业”。这话其实不通。教师很崇高，难道其他职业是“卑贱”的？职业就是职业，都一样，也都平等。存在某种职业，只说明社会有某种需要。需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圣人也得大小便！所以，厕所绝不比书房卑贱，教书匠也不比清洁工崇高。同样，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恪守职业道德。清洁工就该把地扫干净，老师就得把书教好。这是本分，没有崇高不崇高的区分。给“本分”贴道德标签，不是什么好事。你把某种职业抬得那么高，这个职业就给架在那儿下不来了。碰到有“恐高症”的，得吓死，没有的，也得累死。

（张雯摘自《演讲与口才》2012年第9期）



实际上，福岛核电站事故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日本法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诉讼被预演，只是日本政府和电力企业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

1973年，日本爱媛县伊方居民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对原子炉最坏的情况——炉芯熔化的可能性给出一个说法。官司从地方法院打起，一直打到日本最高法院。

爱媛县伊方建核电站之初，当地的居民就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必须放弃捕鱼生涯，给核电站让出地盘。在反对声中，当地政府与电力企业达成协议，核电站开建。

在法庭上，伊方居民始终在追问一个核心问题：“核电是不是安全的？”政府方面动员了一大批推进核电发展的核心人物出庭作证，全国的报纸都在讲核电的安全性，电力企业花大价钱为核电做广告，暗地里出钱收买原告放弃诉讼。

原告方是一群不懂核知识的百姓，在一次关于伊方是否在地震断层上、地震是否会引发核电安全事故的法庭辩论上，政府方面的证人赵启说，政府的原子炉安全审查测定书没有提到伊方在地震断层上。日本研究地震第一人松田时彦指出政府证人在撒谎，因为他们早已将伊方附近的地震断层报告上交给了政府。

“让我们来帮助你们。”一些科学研究者加入诉讼为原告作证，从而使伊方诉讼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大诉讼。诉讼历时19年，关于核电是否安全的辩论也进行了19年。

原告辩护团长：最坏的事态是炉内核芯熔化，难道不会发生核泄漏吗？

被告方代表：不会的。也有可能变热，但可以注水降温。

原告辩护团长：如果制动设备不起作用了怎么办？

被告方代表：不会的。水泵动不起来的发生概率是万分之一。

原告辩护团长：即使百万分之一也不是零。

东京大学教授藤本一阳作证：制动设备是有可能失灵的，注水设备不起作用也是有可能的，从科学上讲是不可能做到不发生这样的事故的。

今天看来，当年法庭辩论的几个关键环节都在福岛接连成为现实：停电—燃料棒发热—注水—熔毁—泄漏。然而诉讼最终的结果是原告败诉。

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核反应堆标准，日本依据这个标准设立了本国标准。在日本通产省前官员岛村武久的录音里，记录了日本如何削足适履，改美国标准为日本标准。

美国标准规定，核电站选址必须是“低人口地带”，一旦发生事故可以有空间扩散辐射，以减少对人群的危害。

——在面积狭小的日本想实现这一点是很难的，我们只能提高安全标准，尽可能不发生事故。

——为了有利于建设，可以向老百姓多说安全性，多说核电可能给当地生活带来的好处。

美国标准要求建立避难区。

——日本找不到建避难场这样的地方。

——如果标准里放入避难这个词，那就会有人问，这样的东西还要建它干什么？无法面对众人的质疑。

——为了有利于建设，就说这个东西是根本不会有事故的，以此为前提开始建设。

录音里的这些人，都是日本当年核电建设的核心人物，来自政府、商界和研究领域。

日本再建基金会主席、政府独立事故调查委员会负责人船桥洋一于2012年3月19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一些利益团体为了获得人们对核能的广泛支持而对其大肆鼓

谎言与自负

● 离 原 王 选

[[读者·2012·11]]

懂得

● 孟祥海



曹聚仁与鲁迅曾有过这样的对话：“为您写传我肯定不是最适当的人，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后哈哈大笑，说：“就凭你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人。”

一句“你是懂得我的人”，可以看出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就是这位自称“不是最适当的人”，于1956年在香港写成并出版了《鲁迅评传》。

在民国历史上，像曹聚仁与鲁迅之间这样互相“懂得”的人，还有很多。

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顺利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从此以后，汪曾祺就在老师的帮助下一步步走上文坛，而后成为“京派小说”的领军人物。

他是最懂沈从文的人，在行军过程中，他只带了沈从文的书，只想听这个人说话。而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沈从文死后，汪曾祺围着老师看一眼，再看一眼，然后，哭了。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

徒之情天高地厚。1918年李叔同出家做了和尚，而为了回报恩师对他的培育和引领，丰子恺用自己的画笔、46年的时间和一段坎坷艰危的道路，实现了一个宏大的志愿，这就是直到现在还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六集《护生画集》。

丰子恺懂得李叔同，所以有生死之约，一个写，一个画，后来李叔同仙逝，剩下的一个继续画。即使在“文革”中，丰子恺成为“上海市级十大批斗对象”的时候，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著作的整理出版事宜全权授予学生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蒋天枢是懂得陈寅恪的人，他也值得这样信赖。

1958年，蒋天枢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这在当时来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文人之间的“懂得”是一种千古知己的情怀，是一种“斯世同怀视之”的默契；如清风之于明月，虽无形，却自有一股清辉耀人寰。

（致远摘自《每日新报》2012年3月22日）

吹，我们的核工业因此陷入了‘绝对安全’的扭曲神话。”

这种安全神话讲久了，连编造神话的人都相信它是真的了。

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核电灾难。1987年到1992年，日本核能安全委员会开始讨论严重事故的对策。国家安全委员会、通产省科技厅和电力公司参与了讨论，但话语权基本为电力公司所控制。因为用来讨论的数字全部都是电力公司提供的，其他两方拿不出与之对抗的有力数据，经过5年的讨论之后，决定对严重事故处理对策国家不做规定，而企业要自觉感觉到自己的安全责任，并认为，目前的日本对严重事故的安全对策已经充足。

而对于企业来说，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要花多少钱制定事故对策也不是很清楚。东京电力第一核电站的笛木谦右说，会不会发生事故不知道，但若

要花几百亿，这样的事很难办。

“从本质上说，日本的核安全监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监管者假装在监管，核能企业假装受到了监管。”船桥洋一称之为安全的“空洞性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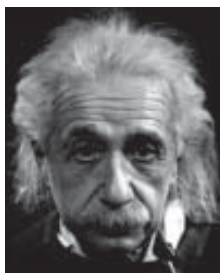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便是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建设。原始的福岛海岸有高达35米的崖壁，如果电站建在上面，福岛核电站会躲过此次13米的海啸。但当年为了节约建设成本，东电将崖壁硬生生削去了25米——当年引进的美国设备如放在35米的高处，不符合设备建设标准，而如果让美国修改设计，又要花一大笔钱。于是，东电选择了少花钱将就美国设计的做法。

东京电力原副社长丰田正敏说，当时想的就是成本，电力公司的压力很大，一定要降低成本，一定要比其他的方式便宜。

隐患的种子就这样埋下。

（石瑛摘自《看天下》2012年第8期，邱鹰图）

[[读者·2012·11]]



爱因斯坦

科学史上的非主流事件

●丁 一

科学是神圣的，但科学家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即使是那些青史留名的科学天才们也有着凡夫俗子的一面。他们有时表现甚至与世人眼中科学家客观公正、冷静理性、刚直不阿、富有责任感的正面形象相去甚远。

伽利略无视潮汐的观测事实

伽利略在向教皇乌尔班八世解释潮汐现象时曾经言之凿凿地表示，潮汐是地球绕太阳公转和地球自转双重作用下形成的现象。虽然开普勒早在此前30年就已明确指出潮汐现象与月亮有关，但伽利略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根据伽利略的计算结果，潮汐每天只发生一次，可事实上海水明明每天涨落两次。即便如此，执拗的伽利略仍坚持己见，并将这种错误观点写进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



伽利略

爱因斯坦没有严格证明质能方程式

1905年9月，爱因斯坦在其发表于《物理年鉴》上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 $E=mc^2$ 这一著名的质能方程式。论文发表后没多久，《物理年鉴》的编辑马克斯·普朗克注意到其中存在缺陷：爱因斯坦把低速物体的运动规则套用在高速运动的光子身上。普朗克把这一发现写进了一篇论文里，但爱因



沃纳·福斯曼

斯坦根本不理睬普朗克的意见。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思路。偶尔，他也会在论文脚注里说明：这并不是严格的证明。

1946年，有数学家对这个方程式进行了严格的证明。于是有人说，尽管这个方程式是爱因斯坦最先提出来的，但并不属于他。爱因斯坦对此说法很不满。话虽如此，可能终究有些心虚，爱因斯坦最终还是没能鼓起勇气把这一大名鼎鼎的方程式写进1949年出版的自述中。

福斯曼靠哄骗完成 心导管插入术

现在世界上每年接受心导管插入术的患者数以百万计，然而在80多年前，想要实施这种手术，即用导管以穿刺的方式从皮下插入血管中，并由主动脉或静脉回溯到心脏，无疑会令人胆寒。没有医生敢冒这个险，除了沃纳·福斯曼。

当时，福斯曼在德国柏林一家医院担任实习外科医生。为了利用医院手术室中的无菌设备进行心导管插入术实验，他想方设法与相关人员套近乎。他使出浑身解数，用花言巧语接近一名掌管手术室钥匙的护士，最终不仅成功说服她为自己打开手术室的门，还让她心甘情愿做自己的首个实验对象。不过，福斯曼最后并没有选择在这位护士身上下手。进入手术室后，福斯曼立马将她五花大绑在椅子上，随即在自己身上实施心导管插入手术，并用X光仪拍摄记录下了相关过程。凭借心导管插入术，福斯曼获得了195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克里克与沃森曾剽窃他人数据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由于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而荣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年，为了赶在另一位美国化学家之前破解DNA结构之谜，克里克与沃森曾经不择手段地从同事那里窃取所需数据。两人的这种行为让其他同事愤慨不已，但他们自己倒并不怎么在意。事后克里克

上世纪70年代，胡润出生于卢森堡。他的父亲是会计，母亲是家庭主妇。子承父业，胡润大学毕业后在英国伦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997年，胡润凭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从英国伦敦来到中国上海，在安达信工作。当时，胡润只是想在中国混几年，捞点资本，然后回国做一个中产者。可是，一次闲谈彻底改变了胡润的人生航向。

那是1997年的一天，胡润与几个朋友在上海一家咖啡店里闲聊。胡润问，在你们中国，谁的财富最多？这个问题一下子把大家难住了。有的说是牟其中，有的说是黄光裕，也有的说是杨斌、荣毅仁……可是，当胡润让大家说出他们具体有多少财产的时候，大家都面面相觑，说不出来。在胡润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胡润决定为中国的富豪排出一个座次来。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因为，一份权威的排行榜需要最大限度地做到公正、公平。好在胡润是一名会计师，他的朋友又多在审计、金融部门工作。胡润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查阅了上百份报刊及上市公司的公告、报表，凭着兴趣和职业特长，经过几个月的折腾，终于排出了中国第一份和国际接轨的财富排行榜。胡润完成大调查之后，立即把这份榜单

刊登在《福布斯》杂志上。此后胡润也因此被《福布斯》杂志聘为



胡润

胡润的坚持

◎田 野

“中国首席调研员”。

这件事发生在1999年。中国富豪榜公布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引起了税务部门的高度重视——原来中国的富豪有这么多钱呀，可是，他们并没有缴纳那么多的税！但是，胡润掌握的证据甚至要比国家统计局部门掌握的证据还要多、还要全。税务部门顺藤摸瓜，立即就查出排在第16位的富豪牟其中偷税漏税。牟其中开始大喊冤枉，说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财产。可是，在铁证面前，牟其

中只好认罪服法。

此后，胡润每年都要出一个中国财富榜。而中国的富豪们不仅对这个富豪榜不感兴趣，而且谈“榜”色变，称这个富豪榜为“囚徒榜”。因为，每年的中国富豪榜一出台，就会有一些富豪落马，沦为囚徒。这些富豪拒绝去领奖，拒绝胡润回访，甚至威胁胡润，阻止胡润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其中。可是，胡润不为所动，他只管说自己的“小话”，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健全，富人偷税漏税的事儿越来越少，中国富豪的腰杆也越来越硬，他们对中国富豪榜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胡润还开展了富豪预测业务，而且预测得越来越准。许多企业找上门来，送钱送车，寻求合作，希望能上榜。但是，胡润给富豪排名只看证据，从来不看“面子”。

经过几年的努力，胡润中国财富榜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这时候，《福布斯》杂志免去了胡润“中国首席调研员”的职务，派出了一个团队来到中国，要替代胡润。胡润一气之下在上海注册了一个公司，脱离了《福布斯》，自己单干。让《福布斯》想不到的是，胡润的名字已经被中国人牢记，中国人只认胡润，不认《福布斯》，这实在让《福布斯》难堪。

胡润在中国的财富排行榜越来越多，领域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大。从最早单一的富豪榜，到现在的慈善家榜、艺术家榜、奢侈品榜等等，这些榜成为中国品牌的同时，为胡润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效益。据胡润自己对媒体透露，目前，他个人的净资产已经在1000万美元以上。

胡润的成功除了抓住机遇外，还与他的坚持分不开。因为，如果离开了公平和公正，胡润的排行榜不过是一张废纸。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

还曾多次公开表示对这种愤怒指责的不屑一顾。1979年，面对舆论对于两人涉嫌窃取他人研究成果的指责，克里克坦然宣称，一流的科学家就应该有点冒险精神，如果畏首畏尾将难成大事。

（王传生摘自《科学画报》2012年第1期）

[[读者·2012·11]]

美元洪水淹没你的 退休梦

●宋鸿兵



我们现在去买菜，会发现一斤鸡蛋的价格翻了一倍，一斤白菜的价格涨了60%多，这样的涨价意味着我们口袋中的钞票在不断被稀释，购买力在不断缩水。当美国开始在上游大量印制货币的时候，各个国家都纷纷出现这种情况，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的时候，将会产生一场世界范围的通胀，我命名的“未来世界大洪水时代”即将来临。

我们常看到新闻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其实“人民币升值”这个词是非常有误导性的，准确的概念应该是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它将会使中国造成严重的财富流失。通常，大家认为人民币升值，中国的购买力会更强，买外国的东西会更便宜。但对于人民币的持有人来说，购买力其实是在下降。人民币越升值，物价就越上涨，老百姓手里的钱就贬值得越快。

这是为什么呢？从人民银行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货币发行中的2/3是依托于美元发行的，我们所有的美元是通过对外贸易赢得的贸易顺差，每一块流通中的美元所对应的都是欠债人（美国）欠银行系统的债。换句话说，中国的货币流通中，有2/3人民币流通量的链条末端的最终信用提供者是美国贷款买房的老太太。当她不能准时还款的时候，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会下降。

美国人如果不违约，人民币发行这么大的量不会出现大问题；如果美国出现大规模违约的话，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和它的损失将是无可避免的。比如你之前买了一套80万的房子，如果宣布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资产不是80万，而可能是60万了。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对国内人民币持有人的购买力造成了严重的货币损失。

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开始暴涨就是始于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使得整个货币购买力在下降，进而形成了通胀的压力，最后的表现形式是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现在的1元人民币跟10年前的1元人民币是一回事吗？跟10年后的1元人民币会是一回事吗？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万元户在中国是大款的概念，因为那时候很多人的工资收入才二三十块钱。当时保险公司推保险，有一种养老保险，一次性交付保费，当投保人退休以后，每个月保险公司返还给他50块钱。当时我的一个同学很高兴，盘算投了保退休之后就会有很多钱，并准备买这种保险，后

因家里有事没买上。我们现在想，如果当时真是信了保险公司，买了这个保险，现在能退休吗？现在50块钱人民币在北京也就是打一趟车的钱。这意味着货币贬值的速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我另外一个朋友，是上海人，1990年的时候做外贸挣了200万美元，当时是我们同学中最有钱的，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再干了，然后移民到新西兰，买了房子，又买了一块地，准备在那里逍遥自在度过后半生。结果，他2000年回到上海的时候，发现上海的物价越来越贵，感觉以前挣的钱已不够用来生活了。当我前不久再回上海的时候，他已经在一家外资企业重新开始打工了。为什么？因为那200万美元在现在的上海已经没有办法让他再过上想象中的生活了。

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子？是因为如果大家不明白货币贬值是什么概念，那么，长期的退休计划就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实现。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一家三口现在的开销是60万元人民币，如果以活到90岁为限，按照现在货币贬值的速度计算，按照现在6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计算，全家的开销在90岁那年是3亿人民币。换句话说，如

[[读者·2012·11]]

心

意

● 吴念真

他不记得父亲这一生在子女受到挫折或得到荣誉的时候，曾经以拥抱来鼓舞或嘉勉过他们；至于“我爱你”这三个字，这辈子是否曾经从父亲的嘴巴里冒出来过，他更始终存疑。

在母亲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他以玩笑的方式试探着问她：“妈，爸爸这辈子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

没想到母亲的回答竟然是：“他？如果他跟我这样讲，我一定觉得他发疯了，不然就是醉醺醺把我当成酒家女！”

不过，他倒是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父亲傍晚回家都会把他叫到身边，打开铝制的便当盒，用筷子戳起里头的两颗鱼丸递给他，然后静静地看着他吃完。

也许这是他人生中少数和父亲那么接近的时光，所以他记得特别清楚，尤其是父亲那时候的神情——嘴角隐约的笑意和温柔的眼神。

有一次他把这些记忆告诉母亲时，她吓了一跳，说：“你的脑袋到底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记忆了？”

她说那阵子父亲和一些年龄相近的人每天都得带便当去九份接受“国民兵”训练，因为父亲吃饭一定要配汤，所以午餐时他会买一碗鱼丸汤，只喝汤，鱼丸则带回来给儿子。

除此之外，往后似乎就没有任何类似“父

子情深”的记忆了。

记得国小毕业他考上第一志愿的初中时，里长兴奋到用喇叭在全村广播，说这是村子里二三十年来的第一次，说他个子虽然小，但是“辣椒要是会辣的话，再小的都辣”等等。

那几天，村子里所有人只要看到他莫不是笑脸和赞美，唯独他父亲不但像平常一般面无表情，甚至还当着他的面不以为然地跟人家说：“人家的孩子是毕业后开始出去赚钱，他却开始花钱！”以及“有什么好恭喜的，是不是个材料要长大以后才知道！”

不过，放俸那天当朋友以“儿子中状元”这个理由要他父亲去九份请客喝酒时，他父亲却又完全没有拒绝的意思。

他不知道父亲那天晚上到底喝到几点才回来，只记得隔天醒来的时候，父亲还在睡，鼾声如雷，一身酒味。

妈妈到溪边洗衣服去了，饭桌上除了早餐的饭菜和碗筷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纸盒，里头是一支崭新的“俾斯麦”牌钢笔。

他和念五年级的弟弟以及过暑假要升三年级的妹妹兴奋地看，但没有人敢去叫醒父亲，问这支钢笔到底是要给谁的，尽管他们心里其实都清楚。

是妹妹先开口，她小声地说：“会不会是要给我的？我三年级了，要开始用钢笔了……”

他父亲的鼾声忽然停了，不久之后他们听见父亲的声音从统铺那边传来，有点含糊地说：“你给我省省吧，别做梦了！”

弟弟的成绩老是不太好，所以他颇有自知之明地以哀兵的口气说：“这一定不会是给我的啦……”

父亲毫不犹豫地往里头回应说：“知道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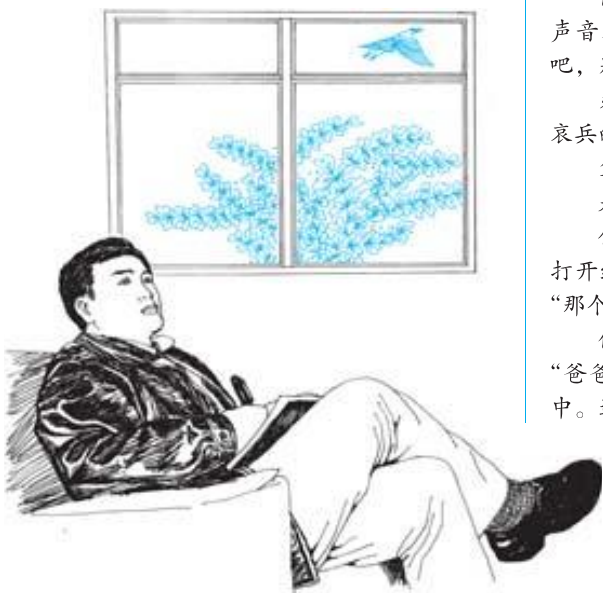
是给他的，果然没错。

但当他隐忍着兴奋，在弟、妹羡慕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盒的时候，没想到父亲在里头又冷冷地出声说：“那个不便宜哦……要是用坏了，你给我试试看！”

他那天的日记就是用那支新钢笔写的，他写着：“爸爸今天买了一支俾斯麦钢笔给我，奖励我考上初中。这支钢笔很贵，爸爸可能要做好几天的工。他的心意和这支笔我都要永远珍惜……”

他和父亲从没“沟通”过，但心意似乎彼此都懂。

（生如夏花摘自译林出版社《这些人，那些事》一书，杜凤宝图）



果你还年轻，现在手上有1000万人民币现金存款，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能退休了，因为这1000万可能过10年只相当于现在的

200万，30年之后只相当于现在几万块钱的购买力。所以这套货币制度和西方搞的金融体系是非常残酷的财富游戏，如果不把它

彻底弄明白了，再怎么努力挣钱，都算不过这帮人。

（蓼风轩摘自《大学生》2012年第4期，黎青图）



Google 刚成立时只有十来个员工，在一套拥挤的居民房里办公。那时正是互联网开始发展的时候，人员流动性很大。Google 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一直在考虑如何才能增加 Google 对互联网人才的吸引力，提高薪水肯定不现实，因为 Google 也是刚刚成立不久，没有多少资金。

谢尔盖为了了解最吸引这些互联网人才的是什么，特地走访了几十家网络公司。最后他发现，这些做互联网的工程师工作都特别忙，因此午餐都是随便吃一些三明治或者别的快餐，于是他决定从改变午餐开始。

当时提供午餐的公司很多，可是大多数公司都是随便应付一下而已，谢尔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决定招一个厨师来为 Google 的工程师提供免费的午餐。谢尔盖打出了一则广告：诚征厨师长——Google 的人饿了。在广告里，谢尔盖许诺



改变 Google 的 厨师长

●郭 龙

Google 的厨师长可以得到 Google 的股份。广告打出不久很快就有厨师来应聘，最后谢尔盖选择了艾尔斯。

艾尔斯并没有仅仅把“厨师长”当成工作来做，他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由于谢尔盖的充分授权，艾尔斯可以自己决定午餐做什么和怎么做。从此 Google 的午餐有了很大的改变，艾尔斯骄傲地对 Google 的同事说：“我们有美国西南部风味的食品、经典意大利菜、法国菜、非洲食品，以及带有我自己烹调风格的亚洲菜。”

由于艾尔斯的努力，很多工程师因为午餐而留在了 Google。在 2000 年 Google 列出的十大值得留恋的原因中，艾尔斯的午餐排在第一位。艾尔斯的到来打破了那种互联网公司惯有的沉闷环境，有了艾尔斯的 Google 变得充满生机。

（朝 阳摘自《青年博览》2012 年第 4 期）



世界正在 起变化

以下是《时代》周刊认为在这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将改变你人生的十个想法：

1. 独居

独居的灵魂并不寂寞，一个人住的好处是能有自由的空

间，也仍可以与很多人交流。

2. 云计算

我们已越来越多地将记忆交给网络科技，这种外包记忆的想法正改变着我们的认知模式。

3. 碳足迹

你可以花钱把碳排放买下来，比如你买了一包薯条中的脂肪时，也买下了它的碳排放。

4. 有信仰不宗教

有些人很早就放弃了传统宗教，但并不是不信上帝，他们只是抗拒严格而教条的宗教组织。

5. 不变质的食物

如果保鲜技术能让食物的保存时间足够长，至少我们不需要因为担心变质而浪费食物。

6. 黑色讽刺

黑色讽刺源自美国黑人的

苦难岁月，但它更希望从痛苦中召回自由独立的精神和力量。

7. 高位压力

你的社会地位越高，生活压力就越大，这种压力基本抵消了成功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

8. 公共场合的隐私

就算是在大街上，我们也有不被随意监视的权利。

9. “自然”消失

自然界布满了人类的脚印，它任我们随心所欲地摆布。地球进入了危险的“人类世”时期。

10. 老人市场

各国纷纷步入老龄化社会，选择一个志趣相投的老伴慢慢变老，已成为房产商的温情牌。

（兰 实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2 年第 11 期）

最近在读末代皇帝溥仪的大作《我的前半生》。我这里要说的，是溥仪所受的教育。那可是一个皇帝所受的教育啊。尽管溥仪已经退位，但教育不能退位。要知道，在清朝遗老遗少的心目中，溥仪一直肩负着“还我河山”的历史重任。

溥仪六岁那年开始读书。他很辛苦，每天早晨都在四点起床，上午三个小时课，下午两个小时课，等于是“全日制”。老师有好几位，教中文的、教满文的、教英文的都有。师资力量很强，标准的“精英”教育。

课程也是精心安排的，从《孝经》到《尔雅》，之间夹杂着辅助教材《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全唐诗》等多种。不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一网打尽吧，也差不多，大鱼都在里边了，小鱼小虾的，无关紧要。我很羡慕，心里说，我要是有这样的文化底子，现在不知会出息成什么样子。

但是且慢。吊诡的是，溥仪长大成人以后几乎成了生活中的白痴，尤其没有数字和地理概念。用老百姓的话说，连数数都不会。在战犯管理所，有人问他，当初宫里有多少太监呀，他旁顾左右，东一句西一句，就是不说数字。他连二十跟四十哪个大哪个小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说呀？管理所的领导知道这个情况后，赶紧找人教他算术。那一年，溥仪五十岁。

这件事看起来很好笑，但绝不是一个笑话。用溥仪自己的话说：“我从宣统三年（1911年）学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道声光化电。”我的心情很沉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传统中国的弊端，就是不能用数字来管理国家。你想想吧，一个皇帝，活到五十岁了，连数数都不会，他怎么可能用数字来管理国家？

更要命的是这样一句

话，溥仪说：“一切有技术的人在那时都是被贵族看作卑贱的等级的。”贵族这样看，皇帝自然也会这样看。我一下子明白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同时也明白，晚清的海关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管理。当然我也明白……可我明白了有什么用啊。

还有一些让人心凉的事，是溥仪的老师们不停地用各种方式向他灌输这样的观念：皇帝是不会犯错的，想怎么就怎么。一个小孩子哪经得起这种挑逗啊。也多亏是个小孩子，想不出酒池肉林、羊车巡幸这类成年人的把戏，顶多跟太监宫女搞搞恶作剧和体罚什么的。但在这种思维的怂恿之下，到了成年，他会怎样呢？历史真就会开玩笑，当真给了溥仪做皇帝的机会，伪满洲国的皇帝嘛，他在书中也谈到了，这皇帝让他当的，是昏君与暴君兼而有之。

很多年后沦为囚犯的溥仪终于知道，他小时候身边唯一有点“人性”的人，是他的乳母。那是一位出生在贫苦农家的妇女。她告诉溥仪，别人跟他一样，都是人，都有牙，都不能嚼铁砂，都会饿肚子，被打的时候都会疼……可惜，溥仪九岁那年乳母就被辞退了。溥仪说，从那时开始，他的“人性”就逐渐丧失了。

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他周边的环境确实是一口染缸。人的色彩是由染缸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这话拿到今天来说也是对的。由此推想，当年孟母择邻而居，你能说没有道理吗？由此再推想，如果一国之中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环境都几乎相同，即便孟母再世，又能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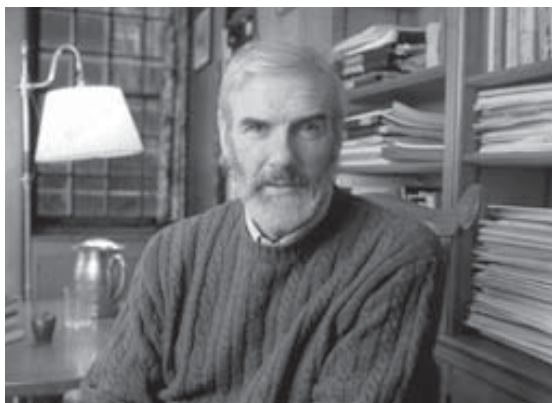
（黄 玉摘自新浪网侯德云的博客，黎 青图）

末代皇帝的染缸

● 侯德云



[[读 者 · 2012 · 11]]



耶鲁大学史景迁

教书比天大

●王淦生

近日读到一篇题为“教书比天大”的博文，讲的是在耶鲁大学，即使连续遭受几场规模惊人的特大风雪，学校出于安全考虑，请教授们相机行事，教授们却依然坚持给学生开课。耶鲁建校300多年，从未发生过教授因气候恶劣而随意停课甚至调课的现象，否则，会被同事们看做“unprofessional”（不专业、不敬业）——这在耶鲁是一句很重的批评用语。写这篇博文的耶鲁大学高级讲师苏炜先生说：“重视课堂教学，对教书有一种几近宗教式的崇敬，这是我在耶鲁任教十几年来所深深感受到的耶鲁精神之一。”

苏炜在文中还叙述了另一件事：某年北京某顶尖大学国学院成立，邀请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史景迁，被婉拒，遂将接待规格大幅度提高，并委托苏炜带一纸高规格的邀请函为之说项。史景迁看完信就笑了，说：“谢谢他们的诚意和超常待遇。”却向苏炜正色道：“你在耶鲁教了这么多年书，难道不知道学期中间任课教师绝对不可以丢下学生去参与任何课程以外的活动吗？”结果苏炜被闹了个大红脸，很不好意思。苏炜回忆道：“耶鲁校长”这一崇高位置，多年前校董事会曾一致推举史景迁出任，史却拒不接受。他说：“我适合教书、做学术研究，不适合做行政管理。”今天，成就卓著的史景迁已从教授岗位上退休。在职期间，除了“教授”，他只兼任过“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一与学术有关的职衔。

感想之一：在耶鲁，无论客观因素（如气候恶劣）还是主观因素（如教授事务），都无法撼动一张小小的课程表。这在

有着30年从教经历的我看来，几乎是一则不折不扣的教育神话。看看国内的大中小学，课程、课务的安排可以机动灵活得如同当年的游击战一般。中小學生可以被随意停下课来充任欢迎外宾到访或领导视察的鲜花队、鼓乐队成员；大学生可以停课充当领导的舞伴、明星的保镖；学校教师可以随意抽调，教师中有个一官半职或一技之长的常年在外“出差”“走穴”，课务由他人轮流代上。记得一位在基础教育界出尽风头的某“教改专家”的“教改事迹”中，有一条便是他每学期有两个多月时间在外“传经送宝”，他所带的班级亦无人代课，可最终考试却依然稳居前列。原因是这位教改专家在接班之初就为学生训练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自学方法，这使得他“在与不在一个样”——学生如同调试好了的机器，可以毫无偏差地在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下运行——这是我亲耳听到的经验介绍。今天再想想，更觉出一种荒唐：难道耶鲁的那些站在国际学术界最顶端的专家教授，就不会事先也对学生们来一个“程序设定”，免得要在漫天风雪中想方设法赶到学校上课？如果一个学期真的有两个月时间学生连老师的面都见不着，整天就在那儿看书，作业只是对对答案，那他们是在接受一种真正的教育吗？

感想之二：校董事会曾一致推举某人出任大学校长而遭拒，这在我所在的环境亦近乎天方夜谭。国内拒绝接受行政职务而以科研为乐的事我也听说过，可那已经是民国时候的事了——主人公叫李方桂。1940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并欲请史语所里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面力邀，岂知李方桂坚辞不就，最后实在不耐烦了，便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可见一顶乌纱在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外皆然）心目中的分量之轻。反观今天的大学校园和学术界，已很有些“人心不古”的意思了——早些时候在深圳上演的40余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位子的活剧就颇让人作如斯感。

这帮“争处”大军何以放着“一等”“二等”人才不当，而要争做“三等”人才？其动机、心理无须我再赘言。我觉得如果条件许可的话，还是尽量让这样的人各得其所，否则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能担当好科学研究、教书育人之任吗？也难怪耶鲁可以在世界高教界独领风骚，而我们只能在“争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苦苦前行了。✿

（王 杰摘自《杂文月刊》

2012年4月上）



李方桂

[[读 者 · 2012 · 11]]

在国外可能给你惹麻烦的七种手势

◎黄义务 编译



1.竖大拇指

在美国，竖起拇指表示“干得好”，搭便车的旅行者也会经常用到。但不要在希腊、俄罗斯、撒丁岛或非洲西部使用，因为在这些地区，该手势含有“滚开”的意思。



2.代表胜利的手势“V”

在美国，许多人用这个手势表示“胜利”或“和平”，也有的只是代表数字“2”。但如果是在澳大利亚、爱尔兰或新西兰，做这种手势无异于说脏话骂人。



3.OK

在美国，该手势意指一切都没问题，但在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和地中海地区，该手势的意思大不一样，有点像说“你是同性恋”。在法国和比利时，它相当于说别人是一文不值的废物。



4.竖手掌叫停

如果你在希腊，不要用掌心向外、五指直立的方式叫人停下。这等于叫人家“去死吧！”



5.得州长角牛手势/重金属音乐手势

詹纳·布什（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女儿）曾在电视转播现场作出该手势，表示她以得克萨斯州为傲。但对于地中海地区的人来说，此手势意指他们的配偶不忠——有“戴绿帽子”的意思，常用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阿尔巴尼亚和斯洛伐克。



6.过来

如果你去菲律宾，不管你做什么，不要通过反复勾食指的手势叫某人“到这儿来”，除非你想被逮捕。该手势被认为是用来招呼狗的，用在人身上，你就可能受罚蹲监狱。



7.大家安静

在美国，人们经常使用双手伸开、掌心向下、五指张开的手势叫某群人或某人稍等片刻，但在希腊，它的意思是“吃屎”。

（何小英摘自《青年参考》2012年3月29日）

胡适家订有《字林西报》，一般早上7点以前送到。

一天，已经8点半了，还没有见到《字林西报》。胡适于是设想了三种可能：一、送报的人遗漏了；二、报费满期了；三、今日本无报。胡适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因为《字林西报》是英国报，可能循例放“银行假期”。胡适细检日历和大字典，“银行假

胡适的自警

●张书克

期”果然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而昨日正是8月第一个星期一。于是，“昨日放假，今日无报”的假设被证实了。但中午时，仆人王妈把《字林西报》送上楼来。原来，送报人

把报纸隔着篱笆抛进来，落在了小树底下，家里人都没有看见。于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假设又被更强的新证据完全推翻了。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却很重视其在思想方法上的意义，把它记在日记里“以自警”。

（赵元波摘自《文苑·经典选读》2012年第2期）



◎郑也夫

该怎样生活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首富，可是欧洲人一直在嘲笑它，一些美国人也在自嘲。对于欧洲人来说，美国人不会生活。

美籍匈牙利裔经济学家塞托夫斯基说：德国人均消耗的资源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是德国人度假、运动、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是美国人的两倍。美国人均花在旅游上的时间比西欧所有国家都少。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的直接旅游收

入是1700亿美元，足有美国的两倍多。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快餐店在公共饮食业中占40%，而英国不超过12%，法国不超过4%。快餐追求的是标准化，其口味显然缺乏多样性。美国人消费了更多的罐头食品。美国人消费的新鲜蔬菜占蔬菜消费总量的67.4%，而欧洲人占77.6%。

据1966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人每天吃饭的时间共69.8分钟，欧洲人是96.1分钟。这些并不能说明欧洲人消费的物质更多，而是说明他们更重视生活的乐趣和质量。

还有一个例证是咖啡馆。美国咖啡馆中往往顾客稀少，欧洲的咖啡馆则是拥挤热闹。美国有一些地段非常好的咖啡馆，里面的墙上写着：“我们没有逐客的意思，但因为座位比较少，希望您能配合，让后来的顾客能够入座。”美国人可以理解和接受这种方式，因为他们是来消费饮料，而不是来消费时间和其他东西的。欧洲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顾客来咖啡馆不是为了饮料，而是找人（不认识也不要紧），找说话的地方，找加入到一个说话的团体中的感觉。这说明欧洲人更重视聊天、人际交往等非物质的生活，它们与生活质量关系甚大。

中国的文化传统比欧洲更悠久。我们有《论语》，有围棋，有美食，有武术等等，但是游戏的心态、健康休闲的习惯，在我们的行为层面上中断了。现在，我们也面临着富裕后怎样学习休闲和消遣的问题。

（黄 玉摘自《城市金融报》2012年3月17日，李 旻图）

有什么比得了青春

◎乔晓华

因为电影《挪威的森林》，不由得想起大学时代第一次看小说原著的情景。

开始是同宿舍的女孩因为某篇小说而对村上春树产生了兴趣，一个无课的下午，大家一起跑去书店买书，在那里又正巧碰上了当时教我们现当代文学课的老师。我们的这一行为似乎得到了他的赞许和鼓励，结果是我们每人买了一本《挪威的森林》。

那一个下午，好像就是各自躺在宿舍的床上，看书。同屋的女孩在阳光中轻轻啁啾一声，然后读了起来——

“就算在18年后的今天，那片草原风光也仍旧历历在目。连绵数日的霏霏细雨冲走了山间光秃秃的地表上堆积的尘土，漾出一股深邃的湛蓝。而10月的风则撩得芒草左



右摇曳，窄窄长长的云又冻僵了似的紧偎着蔚蓝的天空。天空高踞顶上，只消定睛凝视一会儿，你便会感到两眼发痛。风吹过草原，轻拂着她的发，然后往杂树林那头遁去。树叶沙沙作响，远处几声狗吠。那声音听来有些模糊，仿佛你正立在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一般。

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声响。不管是什么声响都无法进入我们的耳里。再没有人会和我们错身而过，只看到两只鲜红的鸟怯生生地从草原上振翅飞起，飞进杂树林里。”

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记得她念的这一段，可是此刻在键盘上敲出这些字来，却开始渐渐体会出当时不曾理解的情怀。

有什么比得了青春！

（雪 茹摘自《时代青年·哲思》2011年第12期）



●茅于軾 口述 ◎白菊梅 整理

中国眼下最热门的经济术语大概就是CPI（消费物价指数）了，粮价、油价、服装价格，什么都在涨。过去30多年中，物价总体上涨了5.4倍。不过，这中间不同商品的上涨幅度大不相同，个别品种甚至一点儿都没涨，比如手表，同样质量的手表不但没涨，还降了价。自行车大约涨了1.5倍，粮食涨了六七倍，猪肉涨了约10倍，衣服鞋帽涨了四五倍。涨得最多的大概是电影票，过去5毛钱一张票，现在是50块，涨了100倍。

百姓都怕通货膨胀，因为这会使自己腰包里的钱变“毛”，购买力减弱。CPI的重要意义就是体现货币购买力的变化。

我的理想中国里，CPI应该为零，货币的购买力既不要上升，也不要下降，稳定最好。如果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即通货膨胀，手中有货币（或银行存款）的人都会遭受损失；如果货币的购买力上升，手持货币的人得到好处，可受损失的是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同样不利于全社会。

从过去的经验看，货币购买力上升的事例很少，而下降的事例很多。因为当政府有权发行货币时，能通过印钞票获得购买力，一旦出现赤字，也可以通过印钞票来弥补。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因为政府乱印钞票造成的超级通货膨胀，一年中物价上涨几百倍甚至成千上万倍，都不算稀奇。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独立于政府，自己有权决定印发多少钞票。目前我国，还没有实现央行的独立。

中央银行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但是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完成，因为谁也不知道发行多少货币是合适的。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观察物价的起落决定货币的发行量，物价涨时减少货币发行

量，物价落时增加货币发行量。这个方法看似有理，但货币数量影响物价有一个很长的滞后期，一般要一年左右，等到物价涨时再来减少货币发行的数量已经太晚。至今还没有一个简单可靠的方法来决定货币发行量的多少，所以国家要有货币委员会，综合专家的意见来决定。

如果CPI超过2%，就应该引起注意。当这一数字高到10%左右，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通胀措施。最常用的办法是提高银行利率，通过高利率抵消货币损失的购买力，以稳定人心。我国1994年CPI高达24%，银行就采取了利率和CPI挂钩的办法。

其实，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不像表面所显示的那样，而是需要专业知识来洞察背后的机制，仅凭常识往往会把事情搞糟。比如，有人认为通胀时应该提高工资，但这种方法会造成货币发行的循环加速，工资越高货币发得越多，通胀也就越严重。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全社会咬咬牙，顶住个人所受的损失，坚持严控货币发行量，不到一年CPI肯定能恢复常态。另外，在通胀面前，百姓往往还希望政府能管住物价。其实，此时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取消价格管制，改善资源配置。

通胀固然可怕，但是真正对生活好坏起作用的还是GDP的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物价涨了5倍多，而我们的财富生产总量提高了近15倍（同时人口增加了40%）。温和的通货膨胀并不可怕，更需要我们关心的，是财富的增加和分配的合理。只有真正实现了这两方面，物价才有可能达到我们理想中的水平。

（郝蕾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6期，喻梁图）

叫爸爸

朋友喜得贵子。儿子刚学说话时，他天天对儿子说：“叫爸爸。”儿子跟着学，也说：“叫爸爸。”久而久之，儿子养成习惯，见了他便说：“叫爸爸。”他没办法，开始纠正，现在天天对儿子说：“爸爸。”

请问老板

我今年23岁，有一个交往一年的女朋友。以上海丈母娘的最低标准，至少需要1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加上一辆10万元左右的小车，还要加上房子装修、婚礼、聘礼等，如果按照我现在的工资标准，我大概可以在400年后跟我的女友结婚。虽然《惊情四百年》是部很不错的电影，但我暂时还不想上演真人版，所以请问老板，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加工资？

跑题

厨师把鸡鸭鱼牛羊猪召集起来，很热情地说：“今天我们充分发扬民主，你们说说喜欢怎样被人吃掉？”众皆不语。只有牛欲言又止的样子。厨师说：“说吧，不要拘束，发扬民主就是要畅所欲言！”于是牛说：“其实我们不想被人吃掉！”厨师笑着说：“你看你，一开口就跑题了。”

哪只是公的

牛给驴出了一个难题，问“蠢”字下面两只虫子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驴绞尽脑汁，还是答不上来。牛骂道：“真是头蠢驴，男左女右嘛！”

拖延症

A：我的拖延症越来越厉害了。

B：这毛病治不好吗？

A：据说有人研究过，发现拖延症很难根治。

B：为什么？

漫画与幽默



A：因为大多数患者拖着不肯治。

喜忧难辨

一个人找算命先生，问：“先生，我听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是我今天两只眼睛一起跳，到底预示着什么啊？”算命先生捋捋胡须道：“嗯……你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快派上用场了。”

四大皆空

“中国佛教史”考试，一哥们交了白卷，结果满分。问老师，答曰：四大皆空。第二年这哥们的室友选这课，考试也交了白卷。但交完后他心里非常忐忑，怕出什么岔子，于是特地打电话给老师说：“老师啊，我这是四大皆空。”他听到电话那头老师长叹了一口气说：“本来都给你满分了，看来你还是没看透啊。”然后……就没然后了。

斗篷

在购物网站上看到一个买主留言：我穿着新买的这件斗篷去面包店，因为冷，我把胳膊缩在里面。面包店老板以为我是失去双臂的残疾人，坚决不收钱，还很体贴地把面包袋挂在了我的脖子上。为了不让他失望，我用肩膀顶开门走了出来……

绝妙感觉

其实我挺喜欢机场的，尤其喜欢那儿的广播，一听就有种君临天下的感觉——请乘坐xxx次航班的旅客准备“登基”。

绝招

两个法语专业的MM在吃饭。两人闲扯了几句法语，一法国兄弟听到后过来拼桌。他先磕磕绊绊地用汉语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撑不住了改用法语，最后问MM要电话号码。MM甲表情纠结地沉默了好久，她想问问MM乙，可法国兄弟听得懂汉语，法语更不必说，连手势和表情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最后，MM甲憋出一句：“子欲之友乎？”

误会

大一的时候有个教财务的老师，我每次上他的课睡觉，他都走过来拍醒我。后来他过来拍我的时候，我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香烟给他，他就让我继续睡。一个学期下来我给了他好几包烟，可期末的时候他居然让我不及格！我去找他理论，他说：“是你啊，我一直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喜事

“小王，听说你上个月买房了，恭喜啊！”“唉，都花的父母养老的钱，不是啥喜事。”“那你老婆刚给你生了一对双胞胎总是大喜事了吧！”小王一言不发，猛灌一口二锅头。“难道……难道两个都是男娃？”小王依旧一言不发，两行热泪已悄然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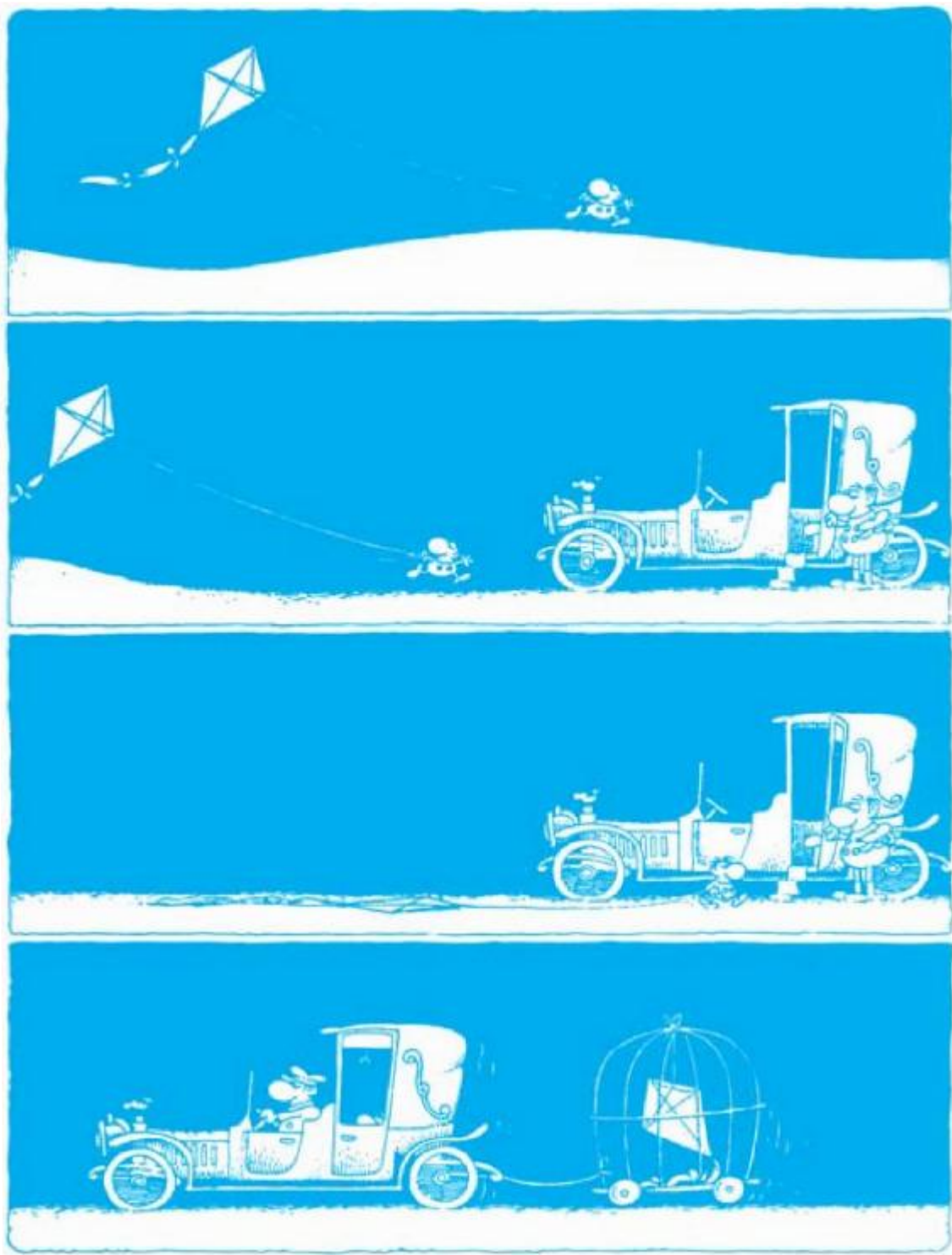
不靠谱

天气预报说会出太阳，可是雨却淅淅沥沥下了一周不见停。

丈夫说：“这天气就跟你们女人一样善变！”妻子不甘示弱：“这天气预报就跟你们男人一样不靠谱！”

自由与梦想

（（阿根廷）莫迪洛图，洪佩奇供图）



[[读 者 · 2012 · 11]]

这一代人的恐惧与焦虑

● 维 舟



这个时代有两个看似彼此矛盾的趋向：一方面，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获得消息渠道的多元化，人们能对各种传言作出更清醒的理性判断；但另一方面，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和技术进步也使谣言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人们往往来不及一一分辨各种信息的真假。在中文里“听信谣言”似乎总是暗示着一种无知和非理性的状态，但正如博尔热斯所言：“在自身专长之外，不轻信的人是不存在的。”人们相信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常常对自己缺乏直接经验和切身体会的事物都难免轻信。

谣言背后的风险社会

虽然人们总是假定，只要不断提升人类的理性水平，并使信息透明化，就能消弭谣言产生的土壤，但迄今为止这一直只是个理想，而且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没有哪个社会的人所传播的信息是完全正确的（那也将是个极其乏味的社会），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为了尽快获知自己所关心的真相，常常都在不知不觉中

传播着谣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谣言折射的正是群体心理：他们的希望、恐惧、焦虑。

这种情绪在大部分谣言中都表露无遗：磁铁能预报地震、普通人 的大脑只被开发利用了 10%、牙刷比马桶还脏、转基因食品吃死了德国奶牛、在加油站用手机会引起爆炸……这些已被粉碎的不实传言其实前面都可以加上一个主谓结构，如：（我希望）磁铁能预报地震、（我害怕）在加油站用手机会引起爆炸，等等。这也是为什么越是恐怖恶心的谣言，通常生命力越强，因为它们似乎印证了我们一直在担忧的某些危险。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惧与焦虑，只不过其指向有些不同——在古代也许谣传的是妖怪会吃人，而现代则是担心那些不可见的细菌、病毒、辐射等等。

和其他口语文化一样，谣言从来没有长篇的、渐入高潮的线性情节，也没有精心设计的叙事方法，但它能以非常简单的（虽然常常是错误的）方式满足人们迫切想要了解事态的心理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天灾之类的突发

事件面前特别容易爆发出大量谣言：人们想要知道日本地震后有没有核辐射尘埃飘到中国、有没有危害、后果会如何，他们不但急于知道，而且希望答案最好尽可能地简单。糟糕的是，答案往往是他们早已持有的那些观念，所以他们往往听到谣言后的第一反应是“我早就知道（会这样）”“那应该有危险”等等，仿佛事情的发生只是证实了一直深埋在他们内心的那种恐惧感。

很多谣言已经演变成一种都市传说——谁都听说过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现代传说，正因为现代人对“食品被污染”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因此才偏偏会生出关于种种这类讨厌之物的故事。这种恐惧并非全无根据，因为现代社会确实存在着种种食品安全问题，这也是诸如“方便面都经过油炸，含有致癌物质”之类的传闻会经久不衰的原因。

尽管谣言所披露的“事实”往往包含某个可怕的因素（手机辐射、致癌物质、快餐店培养出了多翅多腿鸡），但它自有办法使人相信。有句格言说：“古代科学常常以迷信的面目出现，而

[[读 者 · 2012 · 11]]

现代迷信则常常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在以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科技带来的灾难为主题的谣言中，包含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术语是寻常之事——例如说维生素C和虾同吃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有毒的三氧化二砷并致人死亡，这里“三氧化二砷”这个术语本身就会大大提高谣言在表面上的可信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谣言是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相信什么、恐惧什么。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似是而非的与科学相关的不实传闻，恐怕也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在上帝“死”后，人类社会从一个“命运社会”转化为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没有更高超的自然力量可以祈求，人们只能独自面对不可控的风险。谣言中所反映的那种恐惧和烦恼，本质上是一种对未来小心翼翼的担忧，因为人们面对着三个词：不确定性、不可靠性、不安全性。总之，人们秉持和相信的那些谣言与错误观念，不过是他们试图追求确定、可靠、安全，并躲避风险的一种本能，虽然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但这背后的心理却是可以理解的。

利他型谣言传播

在现在这个时代，由于信息发布门槛的急剧降低以及传播速度的加快（简言之，更多人可以将更多信息发布得更快），令人无从判断其真假的言论往往充斥于网上——网络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个人成了媒体，而普通人在发布小道消息时常常不会或认为不必核实其真实性。

许多谣言之所以能传得那么快、那么远，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内的许多谣言都属于“利他型谣言传播”。就像2011年春抢盐风潮时许多人在亲友之间奔走相告“补碘盐、海带可以防辐

射”，除了极少数炒盐价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并非“别有用心”，相反他们可能都觉得这是为了亲友好——为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他们能躲过一劫，但这种“良好用心”的结果却是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

在关于人体健康、食品安全、手机辐射等问题上，这一谣言传播的心理更加明显。首先，它常常以一种“我才是真相”的面目出现，然后“为了你好”告诉你一个值得警惕的信息——比如，什么能吃/用，什么不能吃/用，万一不得其法就可能给你个人带来灾祸。诸如“宿便是健康杀手”“转基因食品不能吃”“牛奶有利于睡眠”等等都属这一类型，这类谣言实际上构筑起了一个禁忌体系，让人们遵守着这些警示来生活，而禁忌的特点就是“尽管你不知其所以然，但你最好遵守，因为谁也不知道不这么做会发生什么”。

吊诡的是，正是“出于好心”，这些谣言才得以在人群中经久不息地流传。许多人正因为觉得自己的言行是利他的，所以在传播谣言时不仅没有负罪感或心理负担，相反他们还觉得是在做好事，最终反倒导致了谣言的猖獗。

中国的许多谣言传播者其实都是利他型的。人们在传播谣言时的潜台词常是：“相信我，我是为你好。”而且大多数人内心确实是这么想的。尤其在发生某些灾害的时候，这几乎变成了一种防范风险机制。2010年著名调研公司A.C.Nielsen在一个调研报告中指出，在受调查的20多个亚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最倾向于和人分享负面体验（其比例约为最低的韩国的两倍），就像中国的俗语所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可能也是因为当下的中国人有更强的不

安全感吧，因此更容易去“提醒”亲友们注意各种或真或假的危险。

在所有情况下，谣言通常都是通过人际网络来传播的——无论是在熟人之间，还是网上意见领袖与粉丝之间的那种虚拟人际关系，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效应，即所谓“社会流瀑”。一个从理性的角度看不可信的谣言，如果是你的亲友打电话告诉你，并坚持说“相信我，我绝不会骗你”，出于对他们为人的信赖（你当然相信亲友不会骗你、害你），你很可能可能会产生思想上的动摇甚至开始相信。

确实只有很少的人能分辨一则消息是否属实，但每个人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在这个消息被正式证明属实之前，不要急于把它传播出去，因为那很可能并未减轻别人的恐慌，反倒加剧了那种恐慌。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消息是否属实其实从来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需要通过这样一种信息分享进一步确认和维护自己的社会群体归属感。当一些口头信息通过网络和手机传播时，它只不过是从现在的人际圈子转移到了虚拟的社会网络，人们得以和从未谋面的人进行“对话”。和口头传播一样，网络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可以互动：信息并不只是单向地从甲传给乙，乙也可以迅速给出自己的反馈。因此在这个时代，如果说这种新的口头文化提供了谣言爆发的一个良好时机，那么它也同时提供了一个鉴别谣言的良好机会：人们得以在公开讨论中学会如何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毕竟，要消除谣言，最好的办法不是塞给每个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让人们知道怎样去寻获正确答案。

（遥 夜摘自新星出版社《谣言粉碎机》一书，邝 颺图）



中研院， 大师传奇

●李 诚 陈子赞

院长之争

1940年，蔡元培溘然长逝。

有关第二任院长人选的事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时的中央研究院还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只有一个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审机构，除学术功能外，它还握有推举院长候选人的权力。

评议会以院长为议长，设秘书长一人负责日常事务。评议会的评议员则由各所所长与学术界知名学者组成。

按既定章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产生实行“提名制”，即由评议员投票选出三位候选人，呈报国

民政府后由最高决策者从中圈定一人继任院长。

1940年3月，众评议员从全国各地抵达重庆。

在即将进入正式选举程序前，评议会秘书长翁文灏接到一封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给他的信函，内称蒋委员长“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

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与各个所长一一知会，当时他们的反应是“颇表愤慨”。傅斯年在震怒中几乎当场发作，只因感到此乃“介公下的条子”，但考虑到顾孟余是前辈学人，才按下怒火。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是什么脾气？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曾回忆说：“我与孟真（傅斯年字）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盪桓……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不久，傅斯年等几人在蔡元培家中吃饭，乘着酒兴，傅斯年当着蔡元培的面狂呼：“（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到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

据李敖说，后来在台湾，蒋介石迎接李宗仁，在松山机场会客室里，满座除了蒋介石，其他人都站着，只有傅斯年叼着烟斗，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跟蒋介石指手画脚地讲话。

傅斯年如此，其他学者也个个不是省油的灯。

身为评议员的学界重量级大腕陈寅恪公开放言：“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先生一票。”

1940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正式进行第二任院长提名选举。结果是：翁文灏、朱家骅均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得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得4票。

蒋介石举荐的顾孟余仅得一票。

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不知是何心情的蒋介石，最后圈定了朱家骅。

但是，蒋介石仅同意他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

落叶飘零

抗战胜利后，1946年年底，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

两年后，辽沈战役已经打响，炮火纷飞中，中央研究院进行了第一届院士选举。

《胡适日记》和傅斯年的档案资料对这次选举有详细记录。院士的选举工作分数理、生物、人文三个组进行，而商讨活动也是在评议会范围内进行的。

[[读 者 · 2012 · 11]]

焦虑的经济

美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这个行业曾经帮助数千万美国人成为中产阶级。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高效的机器逐渐取代了人力，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人失去了工作，中产阶级的人数在下降，更多的人开始对未来产生焦虑。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关于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他就是苹果创始人的父亲保罗·乔布斯。艾萨克森认为老乔布斯给予他那位冷酷无情的儿子无止境的爱与支持，是他唤醒了乔布斯对细节精雕细刻的热情。老乔布斯坚持认为篱笆或者橱柜等看不到的地方也应该做得很精致，多年后这一性格也映射到了他儿子的身上。乔布斯甚至对购买者看不到的零件的样式也严格要求，比如电路板。

将乔布斯视为这个时代的象征是不公平的，如果没有保罗·乔布斯，很难想象会出现史蒂夫·乔布斯，更难想象的是，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美国会变成什么样。

（文 心摘自《国际金融报》2012年1月31日）



资讯看点

德国发布网络社交“隐私行为准则”

你有必要按照这份“隐私行为准则”检查一下自己的网络行为，以免因为泄露太多个人信息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1.激活所有安全设置。你

应该勤于检查，看看哪些个人数据已经泄露到搜索引擎。

2.建立朋友圈，提前考虑好将谁划入你的社交网络。

3.注册社交网络时设定隐私保护。没必要对所有人公开你的政治立场和家庭状况。

4.检查你的私人照片。上传照片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想清楚是否希望三年后仍然有人能看到你的照片。上传别人的照片时应该征得对方的同意。

5.注意自己的发言。在公开网络上出言不慎，有时会极大地损害他人的声誉。对于某些评论，你应该仔细考虑是否会通过私密途径传播。

6.勤于删除无用条目。互联网会记住你上传过的一切信息，所以，你应该及时检查并删除那些可能在若干年后给你或别人带来伤害的内容。

（杰 克摘自“德国印象”

<http://www.deyinxiang.org>）

评选过程是，先由物理学家萨本栋与历史学家傅斯年各提出一个选举草案，供评议员讨论，隔天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傅斯年所拟的第二草案，并由评议员来提出本学科院士候选人名单。

最终，胡适和傅斯年各拟定了一份名单。

有趣的是，胡适的名单上没有自己，而傅斯年则大大咧咧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到了冬天，院士名单最终拟定完毕。

第一届院士共有81名，最长者为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后来回忆：“当时在研究院办了很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了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了。”

这次选举刚结束，朱家骅就奉命动员中研院各

所人员全部迁台，但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

1949年初，已被蒋介石派专机由北平接到南京的胡适与傅斯年一起度年节，两人相对凄然，一边饮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诗。

最后一句为：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吟罢，两人潸然泪下。

据统计，当时迁至台湾的仅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7人，在国外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2人，其余50余人（萨本栋等人去世）均留在了大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第二天，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坚持留下的陶孟和。

陶孟和并不认识陈毅，穿一身长袍，以普通访客之礼相待，两人互道姓名后，相谈甚欢。

自此，大师云集的中央研究院宣告落幕。

（桐阶月暗摘自《周末》2012年3月22日，李晓林图）

水泥的辩证史

●钟永丰

那是1968年，我能想能讲的话还不多，世界的范围由祖父带着我牵牛踏过的地域模糊地构成。呈现在我7岁心灵中的这个世界，许多成分一再地被时间轴与空间轴呆呆地复制着。面对事物，用得着理解与分析的地方不多。我习惯了发愣，很自然地。

是从那一天早上开始，我的记忆突然变得多彩，并且出现了清晰的形状。我在空荡的大板眼床上醒来，发现客厅里的器物全被移到了禾埕。我走进客厅一看，一幅景象硬把闪电比了下去：屋后的大土芒果树穿过后门与后窗，竟然就倒在镜平未干的水泥地面上！

恭敬而充满期待地，我们全家在屋檐下吃了两天饭。祖父一双粗裂的手掌在水泥地上煞有介事地摸了又摸、压了又压，并请来识字较多的阿定叔公、长有伯公斟酌意见，确定水泥干实了，才决定把家具搬回原位。

“啊，恁凉！恁平！”突然间，我全身的窍门开了，颤抖着，小心翼翼地呵护、抑制着那种感觉。

祖父滑稽但幸福的身影，像农地重划纪念碑立于被整肃的田野，标志着我们这一家现代化的重要历程——晴时凹凸、雨时黏搭滑溜的泥土地被水泥，啊，被水泥盖住了！

因为这种幸福的冲击，以及想保有并扩大这种滋味的渴望，我学会了测量。两期稻子收割后，水泥由客厅向外铺展，依照合院家族内的空间伦理，先是延伸至祖父母的卧

室，继而入侵父母与我及小妹合睡的房间，立刻就把床下叽叽仔虫的繁殖领域给封锁住了。我牢牢记住了水泥的进程，并在时间轴上画下记号。

又是另一种微笑的幸福，房间也从此换了表情。少了叽叽仔虫的作祟，夜晚与鬼怪的关系就淡了；即使大人们仍留在烟楼赶工，我也敢一个人进房就寝了。

上国小后以同学关系作为桥梁，我开始有机会到别的合院玩耍。从测量水泥地的面积开始，我学会了比较。

“哈，阿灯古家连堂下都没有打上水泥！”

“哦，阿富摆家实在好，从伙房

禾埕走到烟楼，脚底都是白的！”

“要是门楼前能打上水泥，这样我从家里走到学校就不必踏到泥了！”

每当从游戏中抽离出来，我就会总结刚刚的观察。我仍是会发愣，但多了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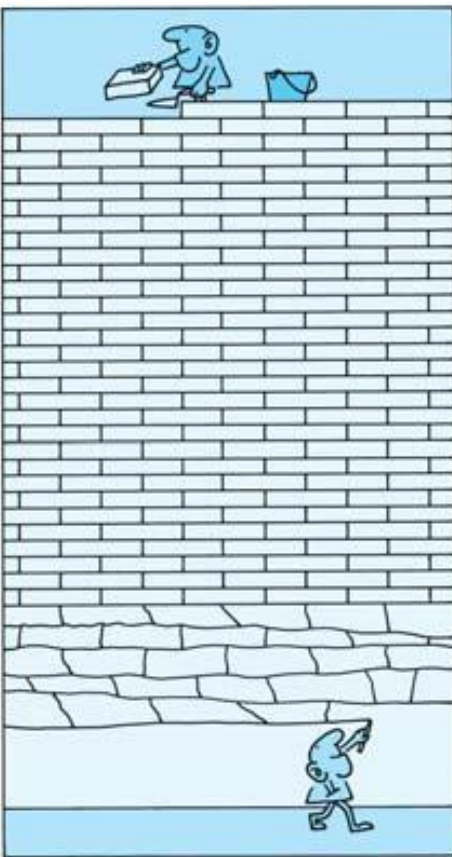
从这种比较开始，我建立了关于我们家这一带地方最早的认识，这种初级的社会认识始终是被拴在蔑视或艳羡的情绪柱上。这种方法论很快就撞上了盲点：一般的农家经济很快就追过了水泥的成本，水泥面积相仿的三合院越来越多，

刚建立的地方认识很快就过时了。但不用急，我速速打造了另外一样测量与比较的标准：水泥地面的细滑程度。

检验细滑程度的最佳时节在雨天：雨水洒满禾埕后，地面越细密，越能反映周遭的景物。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我发现了柏油，因而找到了雨后溜达的乐趣。

“啊，恁凉！恁平！”

比较水泥与柏油的劲头很快便消失了。国小毕业前两年，新奇的事物纷纷出现。首先是电视，接着是洋房、冰箱与瓷砖。显然地面材料的质与量不能再作为比较与认识我们家及邻居家的唯一判断标准了。可是，每每看到三合院内的禾埕重新翻铺水泥，或雨后赤足踩踏



[[读者·2012·11]]

在倒映着天空的柏油路面上，那股原始的乐趣仍会从我心底升起。

我19岁那年，村里的农人全都闲了，换成十几部挖掘机、推土机下田。轰隆轰隆地，不出一年，村里的风景全被改变了。不再有蜿蜒的田界，田里多了好多垂直交会的重划路。最令我惊骇的是，消水沟——我与童年死党玩水中捉迷藏兼牵牛游泳的小河，被剃光了头，两岸连绵的灌木丛、芦苇、竹林及湿地，全都被铲除。

水泥紧接着泛滥，田埂、土坎、河岸及圳床……凡是没种上庄稼的空地几乎无一幸免。“青蛙跳得过吗？农人放水翻土时，蚯蚓有地方钻洞吗？蛇有地方躲吗？而我们还有哪里可以游泳，顺便逃离大人的眼界呢？”我开始觉得遗憾、惆怅。

农地重划后第一年，田地产量降得厉害，谣言传说是田地被动了胎气。庄稼人拼命撒农药、化肥，隔年产量不仅恢复，甚至超越重划前的水准。

农地重划像是一帖强效的镇静剂，整个村子突然都安静了，长我十岁左右的种田人纷纷不见了。此外，小我七八岁的堂侄不断问我，田里的蛙、水里的鱼都到哪儿去了？他们的蛙哨、钓术都学到家了，怎么到处下钩都没有反应？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此时再向他们吹夸儿时的豪爽情境，不仅残酷，且徒增伤感。两代人的联谊淡了，渐渐地。

我与水泥的缘分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延续着。

重划这一年，我考中了某国立大学土木系，新生座谈会上，学长们一再宣明，这是台湾师资、设备最好的土木系。开学后不久，在工程材料这堂课上我很快就明白，土木系也者，其实就是水泥系，这因西方人的使力而发扬光大的东西，简直改变了全

世界的地景。

系里的教授每每让我联想起自夸武功的殖民者。常常，我从有关水泥制品成分与力道的教科书页上抬起头来，脑门立即就成了银幕，一景又一景地放映着被镇压的土地与生息。它们的灵魂不死，成了乡愁。

我心中一阵又一阵阴霾，厌恶感一层又一层加深。水泥否定了我的童年，现在我则否定了水泥，而且决定要为此否定的否定付出代价。二年级上学期，我便

拒绝了所有有关水泥科目的考试，于是就被退学了。

多年后，每当我在环保抗争的现场望见整排防暴警察堵住高举手臂的边缘不幸者，就会想起那被长而直的混凝土块向后推挤的长草的河岸，就会想起祖父张着嘴露出豁牙的笑脸，想起胀着圆裸的肚皮，在沁凉爽平的新铺水泥地上翻滚着入睡的那个遥远的夏日午后。

（潜庵摘自《旅行家》2012年第3期，刘宏图）

一句话照亮世界

●麦家



了几公里外的一所高中，也就是我后来读高中的地方。我永远记住了这句话，既是因为这句话的道理一下被我领会了，也是因为这句话对父亲来说太华丽、太哲理、太知识分子，简直不像父亲说的话。

我后来想，为了这句话，父亲也许想了一夜，也许讨教了某位老师，也许是灵感突发、灵机一动。总之，这句话永远烙在了我心里。改变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夜之间，一念之间。当我带着这句话去上学后，我变了，我像换了一个人，至少是换了一颗心、换了一台发动机。那年，我们全校两个毕业班，总共98名同学，只有5人考上高中，我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起步的。父亲送我的这句话，其实是给了我一个支点、一个世界。

（邓功洲摘自《学习博览》2012年第3期，图选自北岳文艺出版社《书间精灵——中国当代藏书票精品》一书，鹏程图）



神圣的沉静

●刘心武

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我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颠连步跃进。七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形状，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传说结了婚的男女从悬崖上往下掷石头，如果掷中了那条石蛇的身子，就能生个儿子。混沌沌的我自以为也懂得成年人的事情，听大人们有那样的议论，想起自己也同邻家女孩子玩过扮新郎新娘的游戏，竟然也拾起石块朝悬崖下奋力掷去；因为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边看上去就更惊心动魄了。

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

的峭壁，慢慢地走动。

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恼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那时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那段险路终于走完了，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芭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厚实的手掌满是凉湿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且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下我是有着一一定的自我防护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的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尝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次的深刻想法。

母亲去世快二十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案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良好，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地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毫不啰唆，具有点穴的效应。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只是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

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

去趟民国

●刘仰东

1921年，王铁珊任江苏省省长。到任那天，省内高官云集浦口津浦车站迎接。车到站后，却不见王的身影。事后才知王坐的是四等车厢，已挤在嘈杂的人群中出了站。王进城后直奔警察厅找厅长报案，称自己的一条腰带被窃走。南京城里一时盛传省长失带事。后这条腰带被找到，其实还算不上腰带——就是一破布条子。

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住在南京石板桥2号，这其实是总理陵园管理处的办公地，一楼办公，二楼权充元首官邸。官邸外有一个班的宪兵警卫，林颇感不自在，对人说：“主席变成犯人了。”这里没有卫生设备，房间狭小，负责警卫的宪兵只能借住在邻家空屋里。如此寒酸的“元首官邸”，在全世界恐怕也难得一见。

抗战时，陈立夫欲把孔二小姐介绍给胡宗南为妻。胡询诸戴笠，得知孔品行不端。后孔到西安相亲，胡化了装到孔住处侦察一番，见孔举止粗蠢，模样吓人，又闻孔常女扮男装，雌雄莫辨，且恶少气十足，便借故避而不见。后胡写信答复陈立夫：“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

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没维持几年，就遭遇了第三者插足。所谓第三者，是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郁达夫自然对此耿耿于怀，说：“现在他比我有名，再过五十年，我们两个齐名，再过一百年，我比他有名。”

蒋宋成婚时，奉化县县长是徐之圭。某日，徐的同学张明镐去看他，徐对张说：“你来得很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是蒋介石与原配毛福梅的离婚协议书。徐之圭笑道：“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张打趣说：“贵老爷若在这份离婚书上批个‘不准’

两字，必名扬千古！”

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林在写诗时常点上一炷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

曹聚仁说：“说到朋友之间的相处，我该提一提柏斯格的话：‘没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说我们的话，和在我们背后说的会相同；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只建筑在相互欺骗上面；假使每个人都知道了朋友在他背后所说的话，便不会有多少友谊能够保持不破裂的了。’”

抗战期间，梁实秋与女作家方令孺曾是邻居。一次方邀梁去家里吃饭，梁一进门就闻到香气扑鼻。一个密封的瓦罐在炭火上煨了数小时，里面传来噗噜噗噜声，内有大块的五花肉，不加一滴水，只加料酒、酱油，火候一到，酥烂可口。方令孺说：“最乐的事莫如朋友相聚，最苦的事是夜阑人去独自收拾杯盘打扫地下。”

（昨夜风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去趟民国——1912至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一书，丰子恺图）



产生了一种非常私密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穆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去十二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

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意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香雪摘自漓江出版社《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一书，戴晓明图）

[[读者·2012·11]]

地球诞生已有46亿年，先后经历了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以及我们现在正处于的新生代。地质时间通常以百万年计，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为了向大家简明易懂地介绍地球自诞生以来的演变情况，我们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浓缩为一天，即24小时，以大家比较熟悉的时间尺度来看地球的演化长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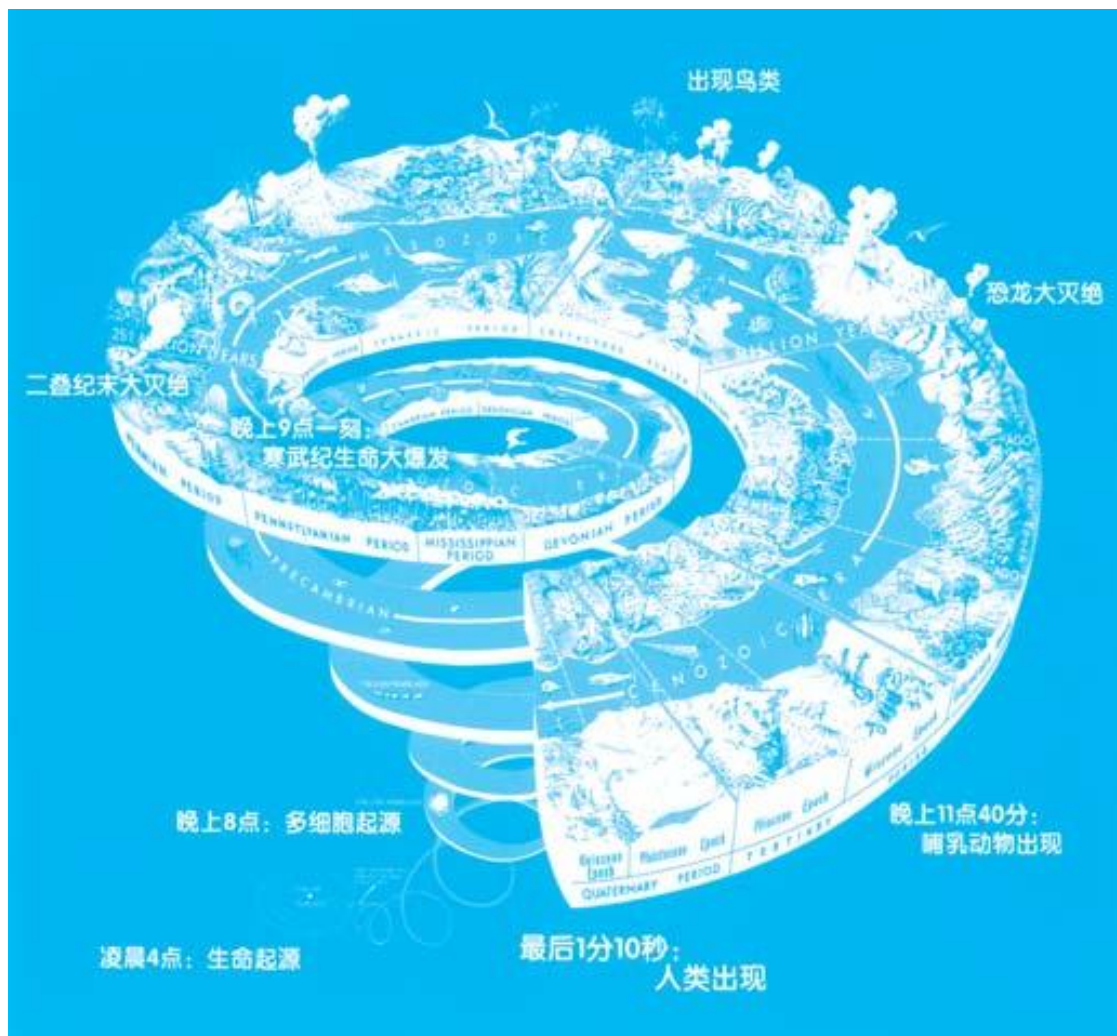
地球于46亿年前诞生，这是起点，放在一天24小时中即是零点零分。46亿年前至39亿年前这段时间是地球的诞生期，换算过来便是零点零分到3点39分。地球诞生，最初的海洋开始形成，海洋中简单的有机物生成，这是原始生命诞生的前提条件。24小时的历史中，地球诞生占用了3小时39分钟。

地球39亿年前形成之后，

一直到35亿年前，进入第二个地质年代——太古代。35亿年前至15亿年前，即5点43分到16点09分，地球处于太古代。按照现在的一天算，从早上5点43分，天刚蒙蒙亮，一直到下午4点09分，太阳开始西落，几乎整个白天地球都处于太古代。这一时期，地球属高温气候，火山活动强烈，太阳辐射强，原核生物出现，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生

如果从地球诞生至今 只有24小时

●刘奎峰



[[读者·2012·11]]

命。

15 亿年前，即 16 点 09 分，地球进入元古代，元古代结束于 5 亿 7000 万年前，即 21 点。地球从下午、傍晚，到天黑点灯，都处于元古代。元古代时期，真核生物、多细胞藻类和低等无脊椎动物出现，地球气温开始下降，火山活动减少，海洋面积增加。

5 亿 7000 万年前，即 21 点，地球进入古生代，结束于 2 亿 4800 万年前，即 22 点 40 分。古生代下面又细分为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

寒武纪（5 亿 7000 万年前至 5 亿 500 万年前），即 21 点到 21 点 20 分，大型藻类开始出现，气候比较温和。

奥陶纪（5 亿 500 万年前至 4 亿 3800 万年前），即 21 点 20 分到 21 点 41 分，这 21 分钟是无脊椎动物的全盛期，气候温暖，海洋面积继续扩大。21 点 41 分，地球上发生了第一次生物大灭绝，即奥陶纪大灭绝。这次灭绝是因为奥陶纪末期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冰期，范围包括今天的非洲、南美洲及欧洲，由于气候变冷和海平面下降，生活在水体中的 85% 的无脊椎动物灭绝。

志留纪（4 亿 3800 万年前至 4 亿 800 万年前），即 21 点 41 分到 21 点 50 分，裸蕨和陆生节肢动物出现。

泥盆纪（4 亿 800 万年前至 3 亿 6000 万年前），即 21 点 50 分到 22 点 05 分，这 15 分钟是鱼类全盛期，并出现了很多新物种，石松、木贼、真蕨出现，两栖类、无翅昆虫开始出现。志留纪和泥盆纪均气候干热，海洋开始退却。22 点 05 分，第二次生物大灭绝发生，海洋生物遭受灭顶之灾，同样也是因为气候变冷和海洋面积减小。

石炭纪（3 亿 6000 万年前至 2 亿 8600 万年前），即 22 点 05 分

到 22 点 28 分，这 23 分钟是两栖类动物的全盛期，巨型有翅昆虫开始出现，气候温和潮湿，造山运动频繁。

二叠纪（2 亿 8600 万年前至 2 亿 4800 万年前），即 22 点 28 分到 22 点 40 分，气候干热，地壳褶皱，造山运动频繁。22 点 40 分，第三次生物大灭绝发生，超过 95% 的生物灭绝。这次大灭绝使得占领海洋近 3 亿年的主要生物从此衰败并消失，让位于新生物种类，生态系统也获得了一次最彻底的更新，为恐龙等爬行类动物的进化铺平了道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大灭绝是地球历史从古生代向中生代转折的里程碑。

从 21 点到 22 点 40 分持续了 1 个小时 40 分钟的古生代，是无脊椎动物繁盛期，鱼类、两栖类、爬虫类开始出现，绿色植物开始出现。

2 亿 4800 万年前至 6500 万年前，即 22 点 40 分到 23 点 37 分，地球处于中生代。夜已经很深，但此时的地球却异常热闹，因为恐龙的全盛时期来了。中生代下面细分为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

三叠纪（2 亿 4800 万年前至 2 亿 1300 万年前），即 22 点 40 分到 22 点 51 分，这 11 分钟对地球来说很重要，在这 11 分钟里恐龙和哺乳动物出现了。22 点 51 分，第四次生物大灭绝发生，大约有 76% 的生物——其中主要是海洋生物在这次灭绝中消失。

侏罗纪（2 亿 1300 万年前至 1 亿 4400 万年前），22 点 51 分到 23 点 12 分，气候温和潮湿，这 21 分钟是恐龙的全盛期，始祖鸟开始出现。

白垩纪（1 亿 4400 万年前至 6500 万年前），23 点 12 分到 23 点 37 分，地球温度下降，地壳运动增加，内陆海及沼泽增多，开花植物和真鸟出现。

6500 万年前，即 23 点 37

分，地球经历第五次物种大灭绝，75%~80% 的物种灭绝。这次大灭绝事件最为著名，因为统治地球达 1400 万年之久的恐龙时代就此终结，为哺乳动物和人类的登场提供了契机。

第五次生物大灭绝后，地球进入新生代，气候由热变冷，海洋缩小，单子叶植物、灵长类动物出现。165 万年前，即 23 点 57 分，这是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人类登上了历史舞台。在 24 小时的地球历史中，人类在最后 3 分钟才登场，最后的 1 分 10 秒，现代人类出现。

第二天会重新开始，但重新开始的第二天会是什么样子呢？

（子 蒙摘自《地球》2012 年第 3 期）

镜子与情人

◎班 超编译

一个怪老头在密西西比荒原生活了一辈子，他觉得再不进城去看一看就没有机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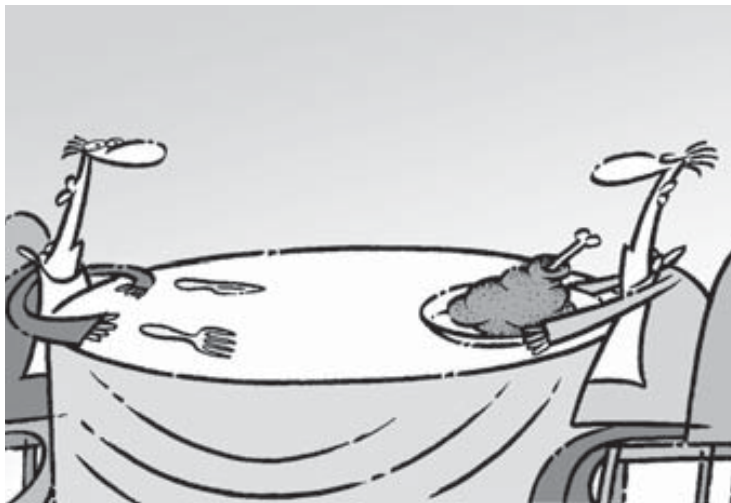
到达城市后，他走进一家商店，随手拿起一面镜子照起来。因为是平生第一次照镜子，他不由得惊呼：“乖乖，原来这是我爸爸的一张相片啊！”

他买下了“父亲的相片”，但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妻子很不喜欢父亲。

于是，他把镜子挂在了粮仓的墙上。每天早晨去干活前，他都先到粮仓去看一眼“父亲”。

妻子对丈夫频繁出入粮仓起了疑心。一天，丈夫一离开，她即潜入粮仓搜查。她第一眼便看到了墙上的镜子，而当她走到镜子前时，不禁怒火中烧，咬着牙愤恨地说道：“这就是他看上的那个丑老太婆？”

（周广清摘自新浪网班超的博客）



不能吃得比我好

●老 猫

在宋朝的时候，谁要送你两条鲙鱼，那可是莫大的恩情了。这种长在近海的鱼类有一尺多长，是美食中的极品。但宋高宗南渡之后，鲙鱼一度供应不上了。某日，秦桧的老婆王氏进宫和太后聊天，太后说：“哎呀，最近想吃口新鲜鲙鱼都没处吃去。”王氏脱口而出：“我们家啊，养了上百条呢，回头我给您送来。”

王氏回家就要把鱼打包送进宫。秦桧一听，大惊失色道：“你这不是找死吗？鲙鱼好吃，御膳房里一条没有，咱家有一百条，你让皇上怎么想？”最后，秦桧让王氏带了百十条青鱼进宫。太后一见就乐了：“哎呀，我说哪来那么多鲙鱼啊？你这土老婆子，原来是分不清楚鲙鱼和青鱼。”王氏也跟着傻乐。装傻，是因为不能吃得比太后好。

与人相处，权贵们都得装，装得寒酸或者装得清高，总之得有一种风格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东晋的吏部尚书陆纳就特能装，他的风格是——雅致、低碳、环保。有一天，将军谢安等一众人到他家做客，他倒好，就请人喝茶，连零食都没有。老陆的侄子陆倕实在看不下去，弄了桌酒席送上来。客人吃完撤了，老陆把小陆好一顿暴揍，打了四十大板，一边打一边骂：“你真能耐，会办酒席了！你知道吗，你把我的清誉都毁了。”

你不能吃得比我好，这事不光发生在下级对上级。要是因为吃把下级得罪了，后果也极其严重。当年孟尝君养三千门客，就因为吃闹出过人命。有位新来的侠士，刚到孟尝君这儿就赶上吃大餐。可偏偏不巧，那天不知道

怎么了，灯光昏暗，看不清楚别人盘子里是什么。这位侠士不满意了，琢磨你们是不是欺负新人啊？故意不让我看清楚别人吃什么，瞧给我碗里都搁了什么玩意儿，难以下咽，于是闹将起来。孟尝君赶紧把自己的饭碗给他看，结果他一瞧，晕了，一样啊。立刻面子上挂不住了，拔剑自刎，拦都拦不住。

再早些年，郑国和宋国打起来了，宋将华元战前犒劳士兵，大锅炖羊肉，一人一块。偏偏到了车夫羊斟这里，没了。羊斟没吃上肉，嘴上不说，心里却想不通。次日交兵，华元将军刚上车，羊斟一抖缰绳，战车直奔郑国大营。华元还问呢：咱这是去哪儿啊？羊斟说：分羊肉你说了算，去哪儿我说了算。结果，华元被俘，宋军大败——诸位领导、老板，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自己的司机啊。

这也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发生在中山国，就是东郭先生遇到狼的那地方。中山国国君也是炖了一大锅羊肉，和诸位手下一起吃喝，偏偏没叫上大将军司

马子期。大将军也想不通啊，一跺脚投奔了楚国，把中山国的底儿都给交代了。楚国大军转眼就到，中山国国君被迫逃亡。他哀叹道：我冤枉啊，不就一碗羊肉汤吗？是就一碗肉汤，可也得一碗汤端平啊。

面对饭局上的各种“装”，有人想出办法来，就是以恶治恶。这个人就是三国时东吴的孙皓。孙皓吃饭有个规矩，就是必须喝高，不喝醉不许走。为此，他还专门设立了十名监察官，在旁边看着，看谁敢不喝，不喝就一顿暴揍。别以为这十个人仅仅是监酒，他们还有小本本呢，专门记录官员们的醉话。人喝多了，酒后吐真言，难免会发牢骚、说脏话啥的，这些全都被记下来交给孙皓。孙皓就以此为依据，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孙皓的措施没有保住国土，东吴就亡在他手里了。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因为说真话而修理别人，比不让人吃好的更恶劣，结局也会更糟。

（江上风清摘自《深圳特区报》，夏大川图）

[[读者·2012·11]]

意·林

靠不住

◎刘 原

南斯拉夫出过一个奇女子，是行为艺术的“老母”，叫阿布拉莫维奇。1974年，她在那不勒斯给观众提供了包括手枪、菜刀、皮鞭等在内的72种刑具，随便他们施暴，自己绝不反击。结果自然是她的衣服被撕碎，一把上膛的手枪顶住了她的脑门。她事后得出结论：一旦你把决定权交给公众，就离丧命不远了。这当然是个偏颇的、曲解民主的结论。但滥用暴力的权利一旦决堤，左岸的汹涌公众可以让你丧命，右岸的落单草寇同样可以让你丧命，谁都靠不住。事关缺乏约束的丑陋人性，不关公众意志。

最搞笑的细节是，5小时的行为艺术结束后，参与凌虐阿布拉莫维奇的混蛋们都瞬间鼠窜——他们同样信不过这个女人，怕她抄起手枪报复。

（练习曲摘自《东方文化周刊》2012年第13期）

方法问题

◎〔美〕安布鲁斯·比尔斯

◎陈 音编译

哲学家看到傻瓜在鞭打自己的驴，就说：“别这样，我的孩子，别这样，我恳求你。诉诸暴力的人将会遭受暴力的回击。”

傻瓜依然在使劲地鞭打那头驴，边打边说：“它踢了我，我鞭打它，就是想要教训一下这牲畜生。”

听了这话，哲学家走开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毫无疑问，愚人的智慧既不比我们的更深奥，也不比我们的更有道理，但他们传授智慧的方法真的是更令人印象深刻。”

（书 虫摘自《讽刺与幽默》2012年3月23日）

知己、朋友和熟人

◎荆 辉

有了高兴事，我找人分享。第一个人比我还高兴，第二个人流露出羡慕的神情，第三个人努力伪装出平静，内心却波澜起伏，恨不能让我的高兴瞬间化成轻风。

有了烦心事，我找人倾诉。第一个人为我不该受到的委屈义愤填膺，第二个人不为所动，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自己的事情，第三个人尽量抑制，也没抑制住那幸灾乐祸的表情。

从此，我便把这三个人分成了三种：知己、朋友、熟人。

（百合花摘自《广州日报》2012年3月26日）

人性讨厌风险

◎佚 名

有两个实验。

实验一：选项一，有75%的几率得到1000美元，但有25%的几率什么都得不到；选项二，确定得到700美元。

虽然一再向参加实验者解释，从概率上来说，选择第一项能得到750美元，可结果还是有

80%的人选择了第二项。大多数人宁愿少得到些，也要确定的利润。

实验二：选项一，75%的几率付出1000美元，但有25%的几率什么都不付出；选项二，确定付出700美元。

结果是75%的人选择了第一选项。他们为了博25%什么都不付出的机会，从数学意义上讲多失去了50美元。这种心理使得一般股民在赢时赢小钱，亏时亏大钱。

（动力火车摘自《理财》2012年第3期）

妈妈的咒语最灵验

◎寇士奇

幽暗的树林里，男孩遇到了一个女巫。女巫用长着尖利指甲的手指指着他大声喊：“不要动！我要把你变成笨蛋！”男孩不相信女巫的魔力，用劲“呸”了一声，扭身飞快地跑掉了。

男孩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一进门就跌了个趔趄。妈妈正埋头做饭，她看了一眼儿子，脱口斥责道：“看你那样子，跟你爸爸一样，天生是个笨蛋！”

此语一出，立即征服了男孩的心。聪敏灵巧等品性快速遁去，他在瞬间呆傻了下来。从此，一个笨蛋开始在漫长的生活里莽撞成长。

因为，这是慈爱的妈妈发出的咒语，比女巫的咒语灵验十倍；男孩不能抵挡，无法逃脱。

（无 风摘自《做人处世》2012年第3期，〔美〕瑟吉奥·阿拉贡斯图）





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6年7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而且最近几次的上调幅度都在10%左右。国务院为何如此重视养老金问题？养老金的实际状况到底怎样？

按照现在的养老金情况来看，一旦退休很可能面临悲惨的生活。2010年3月29日有媒体刊载文章说，如果退休以后每天只吃盒饭，大概需要100万元的退休金。现在一般盒饭的市场价格是10元，随着通胀率的不断上升，假如以4%来算，30年后盒饭的价格大概会涨到32元，如果一日三餐都吃盒饭，一天就需要100元，30年的盒饭钱就需要100多万元。当然，4%这个数字肯定是被严重低估了。

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一个普通家庭1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以更为严重被低估的3%的通胀率来计算，20年后要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1年就需要9万元。假设离退休还有20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照现行的养老制度，如果月薪4000元，再假设薪水的涨幅和通胀一样每年涨3%，退休时养老保险金总共也只有37万元，但需要的费用却是242万元，连零头都不够。

我们看看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提供的数据，2012—2017年，中国14—64岁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到2035年，65岁以上的人口约为2.94亿。也就是说，现在是每10人中有1个老年人，但二三十年后，每10人中老年人的数量可能会达到4个，将出现2个纳税人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

养老金困局

●郎咸平

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都是怎么做的。比如智利在养老金这方面做得就比我们好。其中有一条就是它们的社保基金经理人必须交纳他所管理资金的1%的个人资金做担保。比如你负责10亿美元的养老金投资管理，就必须拿出1000万美元的个人财产作为担保。智利政府养老基金监管部门单独雇用审计人员、律师进行审查，而且养老金的投资交易当天上报，财务和资金情况要每月报。正是因为有这样规范的流程，尽管智利已经有几个养老金公司倒闭，但是养老金都没有受到损失。

我们的养老金全部统筹运用的结果就是，任何一个省跟任何一个市只有总量，其他所有的资料，例如如何

投资、如何回报、如何使用，全都不透明。社保局征收的效率极低，还要单独找一批人进行企业财务核算，监控企业工资，通过类似税务总局的征管软件去进行调查、稽核、征缴，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都要从社保基金的收入中扣除。很多地方的社保返还率都不到40%，也就是说60%都被当成费用扣除了。需要花60%的社保金去做这种调研、征税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社保金管理。

这笔钱是可以省下来的。支出为什么这么大？因为既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问责。最不合理的是政府根本就不鼓励大家存钱。我们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参保人交费年限满15年以上者，达到规定年龄后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交费不足15年的，可以交费到满15年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没有投资回报，也没有任何的政府鼓励。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也没有办法鼓励大家为自己多交养老保险，因为交了，这个钱就直接进入政府的统筹账户里面去了，但少交还不行。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只愿意交规定的数字，多交就亏了。

我们现在是在用年轻人交

女儿经

●陈丹燕

我告诉你我对女儿说过的话，在她独立生活的开始，17岁——希望她成为一个独立的女孩子。

第一，不用男朋友的钱，花除外，礼物要礼尚往来，平等才是爱情的开始。许多人家不肯穷养女孩子，就是怕这样穷养会引发女孩子心中对物质的饥渴。

第二，有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良好的教养，这是吸引别人喜爱与依恋的重要财富，也是自

尊的本钱。

第三，找到一个值得一起成长的男孩子，温柔地对待他。能一起成长，并成为漫长生活中的伴侣，由此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是最为珍贵的一种。挫折是一定有的，但经历了挫折才能获得轻易得不到的东西。付出与获得永远是对等的，如果看上去不对等，便是时候还没有到，要耐心等待。女孩子能安静等待，是美德。

第四，一段爱情结束肯定不是世界末日，还可以在生活的中找到丰富的感情体验，与自然，与动物，与历史，与艺术，与一缕阳光，与一条小鱼，

让你的心变得宽广、大方、敏感、仁慈。这样，一个女孩能得到许多的精神慰藉，不用紧紧抓住与某个人的爱情不放。

（新 成摘自《新民晚报》2012年3月15日，刘 晨图）



“你爸不在家，不想做饭。猫在陪我吃饼干。”妈的这条短信我一直存着。

小时候，爸喜欢叫我和他一起去买菜，遇到卖水果什么的我就直接要。他也喜欢买给我吃，他总是把小拇指留给我牵着。高中住在姨家了，一次回家，他让我跟他去买菜，我走在他后面，看到他小拇指还翘着，一如我小时候牵着他的样子。

今天坐火车，两个老婆婆坐在我身边，其中一个来送另一个的。两个人双手拉在一起不停地念叨着。要发车了，一个老婆婆下车，回头说了句话，差点把我的眼泪逼出来——“姐啊，今

年我89岁，你90岁，这可能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刚毕业的时候，离家到北京找工作。在火车站，女友给了我一个信封，让我到了再拆开看。上了火车我就好奇地拆开信封，发现里面有200块钱和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好好努力。如果真的混不下去了就拿这钱买张火车票回来。我永远在家等你。

在医院做义工的时候，一个患癌症即将要死的孤寡老人艰难地说：“终于苦到头了……”我转头泪下。

（余 娟摘自《青年博览》2012年第5期）

那些微瞬间

的养老金去补老年人的支出，玩的就是一个“庞氏游戏”，就是拿后面的钱补前面的，等到前面的退休金都被拿光了，并且现在的年轻人也退休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讲，没钱了。目前就是这么危险。

当然，养老金也会破产。比如中国香港，2000年香港大学退休金破产时，学校竟然召回所有合同重签。过去答应给你的退休金现在一笔勾销，不认账了。如果你不愿意重签合同，你就别干了。如果你想通过跟学校打官司来讨个说法的话，那你就得先

想想自己是不是掏得起律师费。打不起官司只有重签合同。所以，像笔者这种级别的教授，本来可以拿到2000万港币退休金的，但是现在就只能拿到20万港币了。

内地的养老金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会比香港地区还要糟糕。如果现在不解决养老金问题，这么多退休的父母亲怎么办？将来一对年轻夫妻要养12个老人。如果国家不趁现在把问题解决掉，将来怎么办？将所有的担子都压在年轻人的身上？笔者建议最好对整

个社保基金做一个改革，最起码每个人要有一个独立账户，而且这个钱是不可挪用的，然后让每个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存有多少钱。这是一切问题的开始，之后我们再慢慢规范，慢慢管理。当然，个人也要养成投资理财的好习惯，通过多种理财工具和产品丰富自己的投资手段，在社保之外，自己动手为养老做好准备。也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够像温总理讲的那样，让每个人活得更尊严。

（变色龙摘自《甘肃日报》2012年3月16日，王 青图）

[[读者·2012·11]]



资源远未枯竭

●Charles Kenny ◎余树宏 编译

地球资源即将消耗殆尽？不，事实恰恰相反。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西方社会和伊朗关于核问题的解决会有一个转折点。但即使双方都尽力克制并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这场危机仍会给脆弱的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禁运措施以及伊朗领导人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举动，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石油价格飙升，并且危及从巴黎至华盛顿领导人的换届选举。但是，每当石油危机出现的时候，权威的专家们都会站出来大肆宣扬一番，他们认为，与“黑色黄金”总有一天会消耗殆尽带来的痛苦相比，高企的石油价格根本不值一提。

早在40年前，“罗马俱乐

部”的5位科学家就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预测，编辑成册后取名为《增长的极限》。《增长的极限》指出，世界经济将会在经济生产的必需品——诸如铜和石油这些自然资源耗尽之时走向崩溃。该书预言，黄金和石油将分别于2001年和2022年被开采殆尽。

在接下来的40年里，有关“石油峰值”的说法一直威胁着我们。“石油峰值”理论认为，地球石油资源的开采会在某一天达到一个最大值，随后石油储量不断缩小，直至完全枯竭；石油资源的枯竭只是地球资源枯竭的开始，其他一系列自然资源，从磷到铀，已

经达到峰值或正接近峰值。

40年后当我们重读《增长的极限》，会深深感觉到其中的讽刺意味。目前的情况是，地球上探明的矿物储藏量正在持续攀升。新技术的应用更使得美国的能源独立指日可待。现在让人忧虑的不是地球的资源即将耗尽，而是其未免过于丰富。

先来看石油。根据著名石油分析员丹尼尔·尤金的分析，由于技术的进步和新油田不断被发现，世界已探明原油的储量正在持续增长。2007年至2009年，全球每生产1桶原油就会同时勘探出1.6桶原油的储量。世界能源理事会的报告称，2010年全球已探明的液态天然气和原油的可开采储量达到1.2万亿桶。以现在的年使用量来计算，可供人类使用38年。如果加上页岩油4.8万亿桶的储量，按照当前的消耗速度，可供使用150年。加拿大的一些巨型油田，储量丰富的沥青砂可能蕴藏着6万亿桶或更多的石油。

其他资源的情况与石油类似。20世纪30年代，一个英国学者曾预测，世界范围内将发生严重的铜资源短缺现象。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地质勘测后推算，地球地表的铜资源储量至少可达30亿吨，可供人类使用18.5万年。这个数字在11年前的预测基础上翻了一番，同时意味着在未来还有可能继续攀升。

磷酸盐是重要的化肥原料，在2008年时曾出现过价格飞涨，但其长期供应同样是有保障的。磷酸盐的全球储量从1995年的1100万吨攀升至2010年的6500万吨，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还可以使用369年。还可以这样一直列举下去：以目前的储量，氮足够我们再用347年，铍可再用890年，锂和铯可再用1000多年……

如果我们继续消耗更多的矿产资源，而不去更好地回收利用，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将耗尽所有的自然资源。可是目前对于所有重要的矿物资源而言，那一天看起来似乎还很遥远。这对当下的全球经济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

[[读者·2012·11]]

梅贻琦的忘与记

张书宁

抗战时期，清华大学迁移到昆明办学，时任校长的梅贻琦也被迫带着家人搬到了那里。

一天，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前来探望，看见侄儿梅祖彦正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费劲地阅读，脸颊几乎贴到了书页上，便关切地问：“侄儿患有近视，为何读书不戴眼镜呢？”梅祖彦答：“眼镜早在半年前就被摔坏了。”他抱怨父亲曾多次答应要给自己买副新眼镜，可总以太忙为由给忘记了。一旁的梅贻琦听到这些，赶紧插话：“我确实杂事太多，明天就去给你买。”

听到这里，梅祖彦从抽屉里取出一副旧眼镜，说：“其实父亲没忘记，他只是舍不得花钱。可是眼镜都破成这样了，叫人怎么戴？”原来，为了安慰儿子，梅贻琦已在他的旧眼镜上费尽了工夫——折断的镜腿和镜架缠满了纱布、棉线，开裂的镜片涂了胶。

“我们再穷再省，也不能吝惜

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呀！”梅贻宝从心底觉得大哥吝啬马虎，于是掏出血，让侄儿尽快去配副新眼镜。

梅贻琦憨憨地笑了，反复检讨自己粗枝大叶。

入夜，停电了，梅贻宝陪大哥守着油灯促膝交谈。有同事接梅贻琦去开会，梅贻宝便起身告辞。梅贻琦挪着小碎步走在后面，他将油灯小心翼翼地移到外屋桌上，又将灯芯捻到极小，再进到里屋找来火柴，搁在油灯旁。梅贻宝望着这一幕，忍不住问：“你在做什么？”

梅贻琦解释：“祖彦上完课会先回来，这样进了屋就是亮着的。万一油灯不小心被风吹熄了，祖彦也能随手找到火柴。”

梅贻宝这才知道大哥并非真的对儿子粗心马虎，他只是习惯于“忘记”那些能省就省的物品，而谨记自己应给予孩子的体贴，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

（滴水映阳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7期）



梅贻琦

的经济开始从采矿和钻探中获益，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发现了丰富的矿藏，资源储量不断得以刷新。目前的后起之秀有加纳（石油开采的先锋）和蒙古（努力提升铜出口水平）。一些经济学家经常提到“资源的诅咒”，意思是说经济发展单纯依赖石油和采矿业，容易导致国家陷入独裁统治和极度贫困。不过最近世界银行指出，所谓的“资源的诅咒”被过度夸大了，“不能否认，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与较高的人均GDP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管理地球上如此丰富的资源将会面临诸多挑战。如果我们继续以现有的速度和方式消耗自然资源，污染将最终使这个星球变得一片光秃秃，毫无生机。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加拿大的艾伯塔省有一个储量为1.7万亿桶的沥青砂油田，以目前的石油消耗速度，这个油田的储量可供全球使用500

年。但是开采它可能引起的环境问题令人望而却步，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引起一场生态灾难。用两吨沥青砂才可以提炼出一桶石油，提炼的过程需要数百万立方米的沙子和大量的热能，产生的温室气体也会更多。这种技术除了会对气温产生影响，更为可怕的是，那些肮脏的黏稠废弃物会毒害森林、原野，永不可恢复，水源也会遭到污染。这也是环保人士努力游说白宫关闭从艾伯塔省到墨西哥湾Keystone XL石油管线的原因。

不过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生产同样的工业产品所消耗的矿产资源变得越来越少。全球经济活动中，有2/3不再产生污染，甚至不会产生任何环境问题，例如娱乐、教育、金融等行业。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服务业产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970年的53%增长到了

2010年的71%。也就是说，创造同等数量的社会财富，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正在不断下降。

技术的进步依然不足以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但是它给出了一个方向，即我们可以通过改进技术，在减少能源消耗对环境影响的同时仍然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我们大力推行碳排放税，以提供经济奖励的方式来保护森林，同时对采矿和钻探行业采取更好、更有效的监管，必然能够减少排放和污染。这样，我们就不会再以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代价发展经济了。

总之，我们有理由关心全世界矿产资源的保护，我们也有理由担心中东战争再次爆发，只是实在没必要担心资源在短期内枯竭。

（孙歌摘自《期货日报》2012年2月7日，图选自山东友谊出版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艺术设计系黑白画作品集》一书）

[[读者·2012·11]]

第一次到台湾采访时，记者曾经在饭桌上遇见一件趣事：同行的台湾《联合报》记者点了一道盐卤土豆作为凉菜。当时我的心里还在打鼓，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菜，土豆也能盐卤？结果菜端上桌一看，不过是大陆最常见的盐卤花生。问过同桌的台湾人才知道，闽南话中的“土豆”指的就是大陆的“花生”。接着追问：“那你们管大陆许多地方说的‘土豆’叫什么？”答曰：“马铃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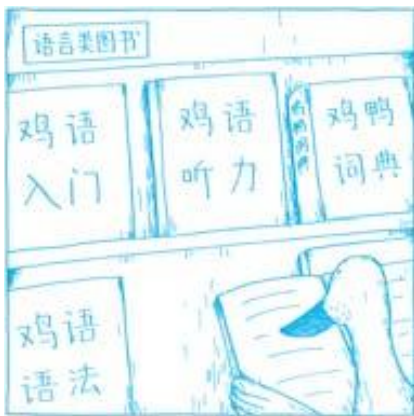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说：“名字有什么关系？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字，它还是照样芳香。”可事实证明，在两岸有些词语的表述上，这句话就不那么适用了。

“误会”并非全都美丽

“窝心”这个词在大陆是指“因受到委屈或侮辱后不能表白或发泄而心中苦闷”，带有贬义；而到了台湾，“窝心”摇身一变，成了褒义词，指的是“舒心”“称心”。

2005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谈及夫人对自己的支持，用了“很窝心”一词，在场的不少人面面相觑。直到有记者义务当起“翻译”，大家才搞懂此“窝心”非彼“窝心”。

我们到台湾坐出租车时，



海峡两岸的“世说新语”

●李寒芳

常有热情的司机听我们是大陆口音，就和我们搭话，问住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就简单回答“住酒店”。后来有一次，一个司机忍不住说：“看起来你们也是正经人士，怎么会去住酒店啊？”弄得我们云里雾里。一来二去才搞懂，原来台湾的“酒店”指的是“夜店、夜总会”，不像大陆是作为“饭店、宾馆”的代称。

猜来猜去的乐趣

相比于“窝心”“酒店”等词在两岸表达的意思不同，同一事物用不同称谓就更常见了。有些还可以猜出来，比如，大陆叫“幼儿园”，台湾叫“幼稚园”；大陆叫“软件”，台湾叫“软体”；大陆叫“鼠标”，台湾叫“滑鼠”……

有些词在看台湾影视作品时常会碰到，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讲到这里，不妨编一个小剧本概括一下（括号内标注的为大陆说法）：某男生骑着机车（摩托车）去台北木栅捷运（地铁）站口接女朋友，打算去看大陆来的猫熊（大熊猫）“团团”“圆圆”。骑着骑着，不小心摔倒了，车子也坏

了。于是，他拿出行动电话（手机）传简讯（发短信）告诉女朋友要晚点到，然后走进修车铺旁的7-11便利店（小超市）买了一个OK绷（创可贴），又选购了速食面（方便面）和凤梨（菠萝）味的优酪乳（酸奶）打算当夜宵，还顺便买了一张《骇客任务（黑客帝国）》的光碟（光盘）。这时，他又被店里电视上直播的撞球（台球）比赛吸引住了，不知不觉看入迷了。直到听到广播报时“中原标准时间（北京时间）x点x分”，才发现已经拖延太久。于是他赶紧打了一辆计程车（出租车）到捷运站口。女朋友已经等了很久，一见面就吐槽（抱怨，语言攻击）。男生听得不耐烦，还击说：“你很机车（难伺候）哦。”正在差点不欢而散时，突降豪雨（暴雨），两个人赶紧跑进站内躲雨，一起分享女孩做的爱心便当（盒饭），气氛才渐渐融洽起来。

而真正有很大不同并且可能影响交流的，是科技名词。大陆常用的科技名词，如激光、磁盘、空间科学、航天飞机、等离子体、半导体、毫米、硅谷、知识产权等，在台湾相应地称为镭射、磁碟、太空科学、太空梭、电浆、电晶体、公厘、矽谷和智慧财产权。仅在计算机学科名词中，两岸不一致的就有约80%。

不过，现在随着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人数的日益增多，不少服务行业从业者都作好了相应准备，相信“鸡同鸭讲”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都说网络无远近，但两岸网民的用语也各有异趣。在论坛发表文章，在大陆称为“发帖”，在台湾叫做“Po (post) 文”；若要推荐文章或是帮文章冲高人气，在大陆称为“顶帖”，在台湾则是“推

[[读者·2012·11]]

“喝墨水”原来是真喝

人们常常用“喝墨水”这个俗语来比喻文化水平的高低。鲜为人知的是，古时候竟然真的会让人喝墨水！

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北齐规定：“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秀才和孝廉考试时，皇帝亲自监考，“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一升可不是小数目啊！仅仅字写得不好就要被罚当众喝下一升墨水，怪不得古人都会勤练书法呢。

李世民登基后，一纸诏书废除了这项荒唐的规定。可是“喝墨水”这句俗语却保留了下来，成为衡量读书人学问深浅的标准。

纪晓岚的这个习惯，有一次想故意戏弄纪晓岚，便趁纪晓岚和别的大臣们在便殿里裸体聊天的时候突然出现。一看皇帝驾到，大臣们赶紧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偏



原来是这个意思

●许 晖

“老头子”原来指乾隆

纪晓岚怕热，所以最害怕的就是夏天，一到酷暑季节，人们常常看见纪晓岚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他掉进池塘里了呢。

在南书房陪同乾隆皇帝吟诗作画虽然是荣耀之事，但纪晓岚却视如畏途，因为里面太热，自己汗流浹背的样子实在太过狼狈。因此一出南书房，纪晓岚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旁边的便殿，把湿漉漉的衣服脱个精光，纳完凉后才出门回家。

乾隆皇帝听贴身的太监说过

偏纪晓岚是个近视眼，乾隆走到跟前才看见，这时已经来不及穿上衣服了。纪晓岚就这样赤裸着身体跪在地上，不停地喘息着，一动不敢动。乾隆一直待了两个多小时，坐在那里不言不语。纪晓岚终于忍不住了，跪在地上偷偷张望，可是看不清乾隆到底还在不在殿里。过了一会儿，纪晓岚实在忍不住了，便小声问身边的大臣：“老头子走了没有？”众人大笑，乾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乾隆命太监为纪晓岚穿上衣服，吩咐他跪在地上，问道：“你为什么如此轻薄地称呼我？太过无礼！今天你必须说出个子

丑寅卯，否则就砍了你的头！”

纪晓岚回答道：“‘老头子’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京城里的人都这么称呼您。大家都称陛下您‘万岁’，‘万岁’还不老吗？皇帝又叫‘元首’，‘元首’不就是头吗？皇上是天之子，而又以万民为子，因此叫‘子’。合称‘老头子’。”

听了纪晓岚的这番诡辩，便殿里的人哄堂大笑，乾隆也笑得合不拢嘴。纪晓岚既为自己解了围，顺便也大大地拍了乾隆皇帝的马屁，弄得乾隆没办法怪罪他。从此之后，这个词就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流行开来了。

“蛛丝马迹”的“马”是什么马

过去的农村，在一些土厨房中经常可以看到蜘蛛，它们通常在厨房顶上结蜘蛛网。这土厨房中还有一种虫子，叫“灶马”。灶马爬过的地方会留下很多不明显的痕迹，这就是“马迹”。蜘蛛丝和灶马爬过的痕迹经常在一起出现，而且都不很明显，所以并列称之。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灶马，状如促织（蟋蟀），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

（张天宁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个词，原来是这个意思》一书，庞彦图）

文”；第一个顶帖的在大陆叫做“坐沙发”，台湾则以庙宇文化的“抢头香”称之。不过随着两岸民众交往渐趋日常化，这些词语已经相互渗透。

近几年，两岸的语言也开始奉行“拿来主义”。台湾报纸上

能看到大陆自创的“雷人”“山寨”“二”等幽默词语，大陆也渐渐用起“A钱”（贪污）“作秀”“便当”“很Q”（有弹性、可爱）等台式用语。记者的微博上有不少台湾同行好友，他们时常会在网上用大陆流行的“梨花

体”“凡客体”“咆哮体”填词调侃，有时还会呼朋引伴，“去喝杯小二（小瓶二锅头）”。

由是，谁还能说两岸语言距离远呢？

（刘志辉摘自《环球》2012年第7期，王原图）

[[读者·2012·11]]

在陕北延川县秀延河边离县城30多华里处，坐落着我的家乡王家河村。

我19岁参军，参军前没见过火车，连离县城只有80公里远的延安都没去过。改革开放前，家乡从村到乡连条架子车路都没有，运输方式就是人挑、肩背、驴驮。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地贫，出门就爬坡；干旱少雨，靠天吃饭，温饱不仅是村民的头等大事，也是政府的难解课题。

在家乡的日子，我放过羊，扶过犁，拾过粪，锄过草，喂过牲口，背过石头；吃过糠，咽过菜，受过冻，挨过打，人间的苦难样样经历过。人穷不如鬼，酒淡不如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自然也就失去了人格和尊严，常常听到的是冷嘲热讽，看到的是轻蔑冷漠。

在年复一年的苦难折磨中，为温饱辛苦劳作的父亲许下心愿：6个儿子都要成为大学生，6个儿子都要成为国家干部，6个儿子每人一孔窑洞。这在当时实属宏愿。理想与现实承载力的巨大差距，让父亲和我们兄弟为求学历经苦难，这些艰苦的经历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时候我觉得家乡充斥着饥饿、贫瘠、灾害、愚昧和落后，也曾幼稚地抱怨老天“造势不公”。到县城上学后，我常想，父母为什么不是城里人？我的祖先为什么不定居在关中平原？那里风调雨顺，沃野千里，走的是平坦大道，吃的是白面馒头。

参军后，随着工作环境的不断变化、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最初的那些幼稚想法渐渐荡然无存，而我对家乡和家乡的一草一木则更加眷恋。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生命和成长的摇篮，生活着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更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沉淀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二

家乡到处有文物古迹。

本世纪初，在我们村发现了竹子的化石，证明家乡在远古时雨量充沛，气候温和。

乡政府对面神圪塔山上的“神圪塔山遗址”属于龙山文化类型，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出土有房址、陶窑窑址各两处，石器打刻坊址一处，还有大量的陶片和石器。陶片为夹沙陶和彩陶，主要纹饰为网纹、绳纹、玄纹和方格纹。陶器可复原的有甲、鬲、瓮、鼎等，石器有斧、锛、镞刀等。这些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村南一华里的地方，还发现了西周村落遗址，



回眸故土

●张瑞胜

挖掘出大量的粗沙陶、泥陶、彩陶、黑陶以及瓮、罐、碗、盆、鬲和带孔、不带孔的石斧等实物及碎陶片。这说明在西周这里就已经有刀耕火种，渐现人类文明雏形了。

有如许多的历史遗迹，难怪我们一个小村庄的名字能挤进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中。

过去，在陕北有一句俗话：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两川指的是延川和宜川，三边指的是定边、靖边和安边。延川就是家乡所在的县。

我们县东土岗乡黄河边上的伏羲村，据传伏羲曾经在那里驯兽为畜，并且根据黄河的S形大转弯发明了太极八卦图和阴阳学理论。

伏羲河黄河大转弯气势雄伟，摄人魂魄。中央美术学院靳之林教授多次深入此地考察写生，并将延川的布堆画、民间剪纸推向全国，介绍给世界。靳老先生及延川贤达人士将此地命名为乾坤湾，吸引了大量媒体和知名学者、画家等前来观光考察。现在这里游人如织，已成为来延安游客的必去之地。在乾坤湾旁边的小程村发现了匈奴人修建的千年古窑，这类建筑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夏国王赫连勃勃墓就在我县东南部。县城西南部的雁门关，在唐朝时就成为全国26个重要关隘之一。

丰富的文物古迹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

远的不说，曾在家乡工作过的杜鹏程，北京插队知青史铁生、陶正，以及土生土长的曹谷溪、路遥等人，都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三四百人的家乡王家河村，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缩影，也是很好的革命教育基地。

早在1925年，李嘉谟（1928年在省委工作时被活埋于西安红庙坡）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地方党组织。1932年，高朗亭（后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在县委领导下，夺取永坪镇民团枪支，成立了延川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这是当时陕北最早的革命武装。后来，陕北特委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经过数年的流血牺牲，到1935年，家乡得以完全解放，县、区、乡三级红色政权相继建立。同年9月，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在我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师。

为迎接中央红军，延川县人民一次性为中央红军缝制了4000多套服装。党中央到达延安后，在延川县居住或路过的村庄多达二三百个。在1936年红军东征时，中央领导人的书信电报往来中，多次要求延川县备足支前人力及战争所需的粮食、牲口、船只、担架等物资，并在多处设立兵站、医院、兵工厂及服装厂。

红军东征回到陕北后，在延川县杨家圪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该通电标志着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动全民族抗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后中央又在延川县太相寺庙内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央要求部队克服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决定红军西征。这两次会议为日后党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为了解放事业，家乡先贤奔赴四面八方，为国捐躯的达1000多人，而在后方的农民也毫不逊色。1937年到1941年的5年中，全县为支援战争交的粮食增加了近20倍，全县6万人中就有1万多军属。普通农民每年支前达30天左右，担架队更是从本县走到了山西，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农民

的每头驴每年支差18天左右，至于支援部队所用饲料、养护伤员、送信等杂项差事更是不计其数。

四

身处盛世太平年代，家乡人从未忘记过先烈们的丰功伟绩。1988年，县政府为纪念他们的不朽功勋，重新修建了延川县革命烈士陵园，习仲勋同志为陵园题写了园名。在众多烈士中，有习仲勋的战友杨琪（最早为陕北红军八十四师师长，毛主席到延安后他参加东征时牺牲）、杨灏（西北军委副秘书长）等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家乡村村通了柏油路，城里的家用电器一样不落地在乡村安家落户。如今，红枣种植已成为家乡的支柱产业。枣树和其他树种覆盖了山坡陡洼，站在山顶，向四周远眺，你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之中。枣花飘香时节，沁人心脾的甜香味阵阵飘荡，有人说，要是在城里感冒了，不用吃药打针，回到家乡的山上转一圈就好了。

有首歌叫《常回家看看》。自从父母辞世后，我回家的次数有所减少，但每年至少回去一趟，除祭拜祖先外，还要看望一下乡里乡亲。每当我与父老兄弟们粗糙的手握在一起，望着他们并不鲜亮的

服饰，我心中常常会生发诸多联想。要不是父母当年忍饥挨饿供我上学，我或许仍在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生计疲于奔命。因此，我每到父母坟前上香祭拜时，总不禁热泪盈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乡亲们大多有着古铜色的脸庞，穿着褪色的衣衫，佝偻着腰，手像树皮一样，张裂着一道道口子，可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对党和政府充满

了感激之情。每当问起他们的生活时，他们脸上就露出满足的笑容：“咱可不能亏说公家，受苦人（陕北对农民的称谓）什么害灾（指各类税赋）也没有了，还给老年人发钱，看病也能报销一些，吃得饱，穿得暖，村上还通客车，进城都是坐车，谁还行走哩？说话做事要凭良心，人要知足哩！”乡亲们的生活其实并不算富裕，可他们却如此豁达、知足、感恩，他们的真诚朴实，每每激发出我内心深处强烈的感慨，让我感到自己其实很渺小。家乡给了我精神的滋养，家乡的父老兄弟永远是我生活、处世的老师，他们鞭策着我，激励着我，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唯有更加眷恋，更加努力，作出我自己的贡献。

（一 夫摘自《解放军报》2012年2月7日）



西周遗址



明朝的两只蝴蝶

●姜钦峰

明末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小事。公元1583年，即明万历十一年，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攻打建州女真部的古埒城。明军遭到激烈抵抗，久攻不下，于是女真人塔克世和父亲两人冒险进城劝降。没想到劝降未成，此时突然城破，明军冲进去不分青红皂白，竟把塔克世父子也杀了。父子俩本来是为明朝做事，不料遭此惨祸，明朝廷解释这是“误杀”，给塔克世的儿子赔了30匹马了事。误杀两个边塞草民对于大明王朝来说简直就不算个事儿，谁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再说另一件小事。在塔克世父子被杀45年后，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了。此时明朝已经风雨飘摇，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内民变四起，外有强敌虎视。内忧外患，连年征战，耗资巨大，朝廷陷入了财政危机。崇祯刚刚登基，便下令在全国整顿驿站，裁撤驿卒，以节省财政支出。驿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公文，并为过境的官员提供服务，驿卒是这个机构中最底层的人，干活辛苦，收入极低。裁员进展顺利，也收到了预期效果，据说仅此一项，每年就能为朝廷节省白银68万两。

精简机构，开源节流，本来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朝廷只管裁员，却不负责安置。与皇帝的江山相比，百

姓的死活显然是小事一桩，但这对固川驿站的驿卒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事。当时西北连年大旱，饿殍遍野，树皮都被吃光了，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失去了生活来源，要么等死，要么揭竿而起。饿死是死，造反也是死，要作出选择其实一点都不难：与其做饿死鬼不如做饱死鬼，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封妻荫子，留名千古。

在这批下岗的驿卒当中有一个名叫李自成的年轻人。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世代贫农，小时候给地主家放过羊，长大后在固川驿站谋了个驿卒的差事，好歹能混口饭吃。没想到崇祯上任三把火，一纸令下，就断了他的生路。李自成走投无路，被迫走上了造反道路。

1644年春天，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城，顺便抢了崇祯的皇帝宝座。当年的固川驿卒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崇祯终于尝到了下岗的滋味，于绝望中上吊自杀。崇祯恐怕做梦都想不到，当年裁掉一个小小的驿卒，竟为自己培养出一位掘墓人。后悔也没用了，如果不是打仗缺钱，崇祯也不会想到裁撤驿卒。跟谁打仗呢？明朝当时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山海关外的清军。那么清军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这就要提到61年前发生的那件小事，因为明军当年“误杀”了两个女真人，即前面提到的塔克世和他的父亲。

塔克世有个儿子名叫努尔哈赤。史书记载，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含恨起兵，从“含恨”二字不难看出他为什么要造反。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他不敢与明朝公然为敌，只能暗中积蓄力量，苦心经营。几十年后，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雄踞关外。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改国号为清。

清军野心勃勃，意图逐鹿中原，不料被明朝精锐挡在山海关外，无法前进半步。恰在此时，李自成完成了对明朝的最后一击，天赐良机，清军趁机挥师入关。1644年的北京城，就像一个热闹非凡的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李自成抢了崇祯的位子，可惜只当了42天的皇帝就被清军赶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皇宫再次易主，大清顺治皇帝登基，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孙子福临。61年前，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误杀，只赔了30匹马。

两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微风吹到1644年，终于引发了一场龙卷风，大明帝国随风飘散。

（极品咖啡摘自《第二课堂（高中版）》2012年第2期，何保全、于泉滢图）

一只肉鸡的“科学”一生

●孙道荣

一枚鸡蛋，与众多的鸡蛋一起被放进一台孵化机里。经过21天的电孵化，雏鸡出壳了。它的出生和它的身世一样，都是科学的产物，没有鸡窝，没有母鸡温暖的怀抱。除了电孵化之外，煤油、沼气等等都是今天用来孵化的科学手段。

第1天。电灯光会在几个小时内将它的绒毛烘干，不需要阳光。身为一只肉鸡，它这一生见到太阳的机会几乎为零。好在它会很快适应这道科学的光芒。摆在它面前的是一盘用玉米粉和复合维生素B液混合的饲料。一只雏鸡不会明白什么叫复合维生素B液，这没关系，一只肉鸡并不需要学习。

第2天。饲养员会给它注射一针马立克氏疫苗，这基本上可以确保它短暂的一生远离瘟疫的威胁。这一点很重要，那些农家散养的土鸡就从来享受不到正规的现代医疗保障，鸡瘟是常事。这就是科学的大型养鸡场的优势。

第3天。雏鸡们的翅膀已经能够扑腾了，它们快乐地扇着绒毛未脱的羽翅。它们不知道这将招来断翅之痛。饲养员将它们一只只捉住，“喀嚓”一声，将它们的翅肘关节给剪断了。这辈子，它们再也扇动不起翅膀了。一只肉鸡嘛，你就不要做天鹅梦了。

第4天。饲养员拿来了另一个针管。亲爱的雏鸡们，害怕是没有用的。这支名叫一针肥的针剂将令你们这一生不但健康而且能够茁壮地长肉。在养鸡场，一切以鸡为本，一切也以肉为本。

第6天。雏鸡的食物开始发生变化，除了玉米粉之外，还有菜叶等绿色食物，这令雏鸡们胃口大开。如果雏鸡们认识字，一定更加开心，因为在它们的食谱中，还添加了一种用0.5%穿心莲溶液、0.2%~0.3%大蒜溶液或100倍活力99生酵剂混合成的“高效保健促长液”，嘿嘿，这可是保健品哦。

第8天。正在长大的雏鸡们开始玩耍嬉闹，你啄我一口，我

挠你一爪，十分开心。是给它们断喙的时候了。每只肉鸡都难逃此厄运，它们长长的鸡喙将被切掉三分之一。断喙是为了杜绝渐渐长大的肉鸡们互相啄趾、啄羽的恶癖。安心地将精力都用来长肉吧，这才是你们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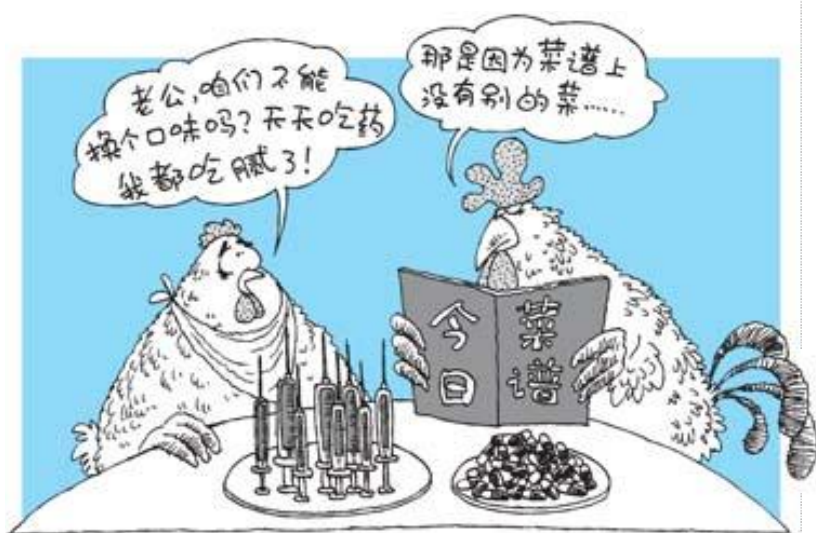
第25天。肉鸡们茁壮成长，很快进入了青春期。它们的羽毛开始变色，鲜红的鸡冠也冒了出来。肉鸡们开始骚动，它们开始谋划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白纸写情书，那就刨刨地，画张约会图吧。如果你是一只小公鸡，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会在几秒钟之内将你就地阉割，以确保你的处子之身，也彻底杜绝你这一生谈婚论嫁的非分之想。

第45天。现在，肉鸡们基本上已经长成，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一心一意地长着肉。可是，对一个真正懂得科学养鸡的人来说这还不够，它们的膘还不够肥，还不能卖出足够好的价钱。于是，他会进行最后一搏，拔掉肉鸡鸡翅上的长管羽毛，以将能量集中在长肉出膘上，就像给树苗打杈一样。据说这种科学的“拔毛助长法”很管用，被拔掉长管羽毛的肉鸡每天能长肉50多克。至于肉鸡们，“咯咯”的惨叫声会很快淹没在钞票的哗哗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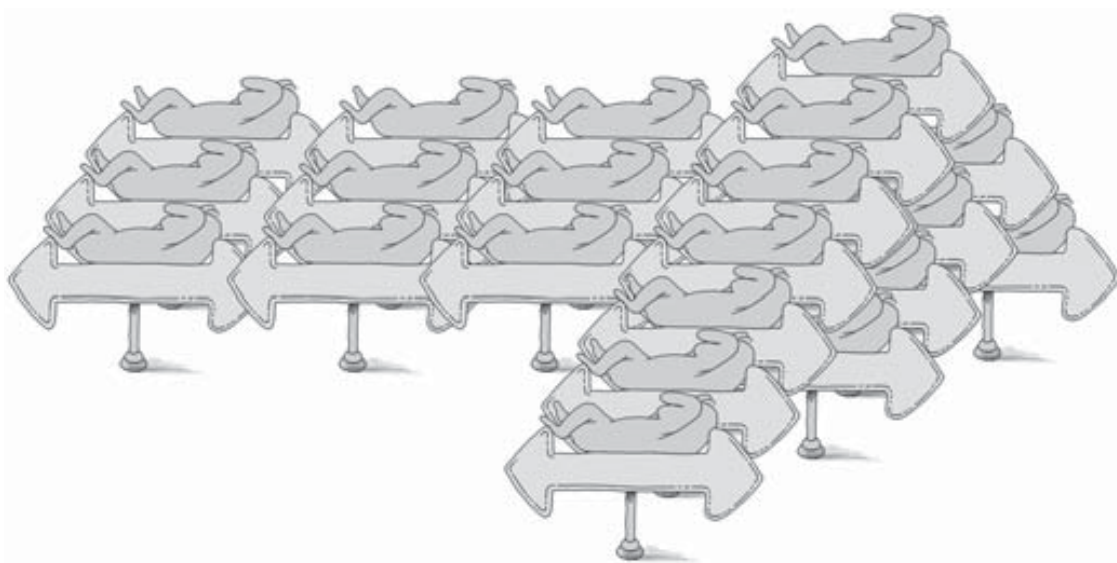
第60天。肥肥的肉鸡们出栏了。它们被送到了各个菜市场，它们不会走得太远，菜市场离人类的厨房很近。

第61天。在清扫鸡舍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枚鸡蛋。饲养员笑了笑，将鸡蛋放进了一筐鸡蛋中。这枚鸡蛋很快会被送进孵化机里，开始它的一生。

（希冀摘自《少年文艺》2012年第2期，小黑孩图）



[[读者·2012·11]]



有个箭头印在我的车票上，从法兰克福指向多特蒙德。我将在那里的一家公共图书馆朗诵我的诗歌，这是我在德国五场诗歌朗诵会的第一站。为筹划此事，德国人从春天就开始忙碌，一个箭头指向另一个箭头。一个站牌指向另一个站牌，一个路标指向另一个路标，一台电脑连着另一台电脑，一个电话接着另一个电话，一项资金链接着另一项资金……这个单位负责我的住宿费，那个单位负责我的飞机票，另一个单位负责我的火车票……箭头后面各个点上负责接待我的人们并非都彼此认识，他们仅仅因为一个即将发生的事件而被联系在一起。

一个箭头就是一个指示、一个命令、一项任务。

我在初冬抵达德国，此地没有人见过我或听说过我，邀请我的人们仅有少数几个读过我新近被翻译成德语的诗集《O档案》。为此事牵头的皮特有些紧张。我是这一群箭头中最关键的一个，他根本不认识我，仅仅因为对几首诗有好感是不足以推进任何事情的。如果我在这一堆最终指向一本诗

德国箭头



集的箭头中失踪了，那么彼此素昧平生的30多个人共同完成的工作将前功尽弃。门票已经预订，那些喜欢计划时间的德国人在夏天之前就已经把生活箭头中的一支指向将于10月31日晚上8点钟在Mittlerer Hasenpfad5, 60598Frankfurtam Main举行的诗歌朗诵会，并为此预付了门票钱。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像一辆已经行驶多年的列车，行程被铁路当局精确到分，准时地出现在每一个城市的站台、旅馆和每一场朗诵会上。最后一场在法兰克福一家由旧工厂改装的地下酒吧里，为我朗诵德语版诗歌的是白发苍苍的电影和戏剧演员莫里茨·施特佩尔，为我配乐的是白发苍苍的爵士钢琴演奏家马蒂亚斯·弗赖。朗诵会开始之前，由于翻译误会，德国人以为我要求更换预定朗诵的诗篇，他们惊呆了。那两位时间就是黄金的著名演员已经为此准备了数

周。莫里茨在我的德语版诗篇上画满了代表重音或者激越、低沉的符号，看起来就像乐谱。皮特有些愤怒：怎么可以有如此荒唐的想法？

德国某地有一只著名的钟，走了一个世纪，误差只有几秒。它的直线和箭头永远指向准时。

我与一个德国人谈到德国的火车晚点。他说德国的火车绝不会晚点，晚点的是时间。

在德国是不能出错或者出现临时更改的，这将导致世界失事。

晚上8点钟，朗诵会开始，我以为这是我一生到目前为止最辉煌的一场朗诵，一切都准备得那么一丝不苟，就像发生在表壳后面的一场梦。这个夜晚我感到虚无，几百行我在非理性状态下即兴而就的诗句被精确的德国箭头送达了目标。我很少有这种经验，诗被像钟表那样精确地组织后最终传布出来，其间它经历了形而下的机械、呆板、严苛的做工，最后回到了形而上。皮特松了一口气，这场朗诵会非常成功。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这是他参加过的最精彩的

朗诵会。他组织这样的活动不是一次两次，他的时间表上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很多箭头。他是个杰出的组织者，也是音乐家、乐队成员、诗歌爱好者和德国一家德中友协的负责人。

一眼望去，德国真是一个幸福的国家。高速公路遍布大地，上面行驶着五颜六色的奔驰或者劳斯莱斯，小宫殿般的红色或灰色的别墅珠宝般散落在绿色丘陵之间。莱茵河已经不像河流了，而是一条被精心地绣过的飘带，蜿蜒地围在德国满缀着各种奢侈工业品的脖子上。有个火车站在杜伊斯堡的蓝天下闪闪发光。大地已经被工业化捆绑得结结实实。大地不再指向自己，而是根据各种箭头指向各种用途。童话中的风景被摆设在大地上，显得很很真实，很不自然。哦，这不是大地，是德国。

火车在各种道路之间行驶，穿过风景单调的区域，人们根据“更美的”或者“更幸福的”标准改造了风景，蜂巢般的红色村庄，黑教堂、打理得整齐有序的田野、湖泊……根据季节精选种植的树木，绿色的春、金红的秋等等，风景完全合乎理性，理性认为，这样的风景才意味着幸福。对于我这种漫游过大地的乘客来说，德国风景真的是太德国了，以至于大地已经在这种德国风景中隐匿了。

这土地上的一切都是千年来德国历史不断追求幸福的结果。幸福之意义各时代或有不同，追求被上帝接纳的幸福，追求世俗人生的幸福，追求通过阶级斗争获得平等的幸福……但毫无疑问，幸福作为历史的目的已经成为一种德国理性。

幸福是一个德国箭头。

只要照着那些直线和箭头的指示去行事，世界就简单、方便，而且指向幸福。

德国理性不是纸上空谈、幻想、未来，它就是德国本身。

这是一个工人、战士和农妇的国家。在德国，我每天接触的朋友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无一不给我动手能力极强的印象。教授先生用餐完毕立刻洗干净自己的餐具。参议员女士钻进车头下面看汽车是否漏油。马蒂亚斯·弗赖是誉满一方的大师，与中国仙风道骨的大师不同，朗诵会开始前，我看见他打开一只随身带来的皮箱，从里面取出一堆金属工具，弯腰干起活来。

德国不是有一打以上的思想家和哲人吗？是的。我的意思是他们首先是工人、士兵或者农妇，然后才是康德、尼采、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本雅明、阿伦特……他们首先是具有动手、做工之能力的人，然后才是文人。就像唐以前的中国文人，首先是农夫、士兵，之后才是文人。这一点与我很相像，我早年在工厂当了十年工人，我的技术曾经娴熟到可以磨出倪式钻头。

杜甫“一日上树能千回”，李白是登山家，陶渊明回到故乡还能用锄头。他们没有失去身体。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时代。宋以后，身体就被文化逐步遮蔽了。

中国文化之衰落，与文人大都失去了身体、手无缚鸡之力有关。

如果说康德首先是个工人，中国文人恐怕不同意。他们总是将中国文人的斯文形象套在西方知识分子身上。其实说康德是哲学工匠更为准确。康德的生活乃是一种精确的工人生活，而不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文人生活。康德的传记可以证明。

工人、士兵或者农妇并非泛泛之人或中国所谓的那种无目的的散人，他们都是有目标之人。

每个箭头都指向一格。

吃饭也是在练习分类，分类

就是准确地抵达每个箭头所指的格。比如桌子上有一堆杯子，每只杯子形状不同。因为用途不同，它们都暗藏着箭头和直线，指向果汁、水、啤酒、葡萄酒、牛奶、咖啡。你不能取消这些箭头，用一只杯子喝不同的饮品。在中国可以，在德国则意味着你将不会被雇用。

身体一直是理性控制和改造的对象。身体从未退场，我经常感觉到德国身体。他们喜欢训练和规范身体，我的印象是德国身体被训练过度，太规范了。

理性化的幸福之路使理性成为一个个箭头。它指向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根直线以及箭头无所不在。这是德国给我的深刻印象。

在终极意义上，德国与中国相似，都有一种虚无感，但德国的虚无在终结处，中国的虚无在当下。我揣测。

要么跟着那箭头指向幸福，要么相反。

卡夫卡是恐惧的、迷惘的、迟疑的。对于工伤事故调查员卡夫卡来说，奔驰恐怕不是未来，而是恐怖的父亲。

他的写作指向德国箭头的反面。他怀疑这种幸福，但他依然是一个箭头。卡夫卡只是德国箭头的另一端而已。

我曾经在《从诗的蓝调开始》一文里说到某种乌托邦式的诗歌朗诵会，没想到在德国实现了。之后我回到深圳，参加另一场朗诵会。海报和诗歌小册子一个月前就印出来了，媒体也公布了即将出席的诗人的名单，最后一刻，有位诗人来电话说是不来了，主办方一笑了之。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因此而存在、孤独、傲慢、鹤立。我们倒因为出席而获得一大堆庸俗的意义，那些意义是太喜欢凑热闹、出风头等等。

（李盾山摘自《佛山文艺》2012年第4期，刘宏图）

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特立独行，遭受非议；也少有人像他那样治学，备受称赞，连论敌也不乏褒奖之词。

非议的是他的坏脾气，他桀骜不驯，盛气凌人，遇有不合意的立即拉下脸来开骂，不管不顾，有的学术会议甚至不敢请他参加，就是怕他弄得人下不了台；称赞的是他的非凡功力，他师从经学大师周予同，专治经学史，这是一门头绪纷繁而又古奥艰深的学问，他凭借严密的思维、流畅的表达，条分缕析，把一团乱麻整理得井井有条，且多有独特的见解。经他编注的古人文选，准确精当，明白晓畅，广受好评。

学业成就了他的声名，也毁了他的幸福。他治学之勤奋实属少见，白天教学，夜间工作，经年累月彻夜不寐，直至早晨才合上眼休息半日。他自述做学问是自讨苦吃，每有兴会，又兴奋不已，深夜空腹也要自斟自饮，甚至酗酒无度，贬之者视他为酒鬼，褒之者誉他为酒仙，如此日积月累伤害了身体。

他的前妻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也是学业有成的数学家，可是强强联合难免针尖对麦芒。在居家生活中，两人都忙于学业，不暇他顾，总要吃饭吧？但谁也不愿起身动手，结果呢，谁耐得住饥饿谁就是胜利者！这样的婚姻又怎能不走到尽头？在大学时他们本是一对身材高挑、面目姣好的金童玉女，是人见人羡的绝配。然而婚姻终于被岁月消磨。20世纪80年代初他前妻出国深造时，他们的感情已有裂痕，他托我买火腿请人捎给她，为了这火腿，一再嘱咐，什么品牌、规格、包装等等，叮咛复叮咛。大大咧咧的他，竟然也会这样婆婆妈妈！这使我意外，也由此感受到他对妻子的款款情意。

他骂起人来有时怪怪的，使人不可捉摸。一次他对王元

特立独行 朱维铮

◎ 刘志琴

化说：“你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三年，一事无成。”这是指责吗？是，也不是。他接着又说：“你一上任便遭遇反对精神污染，连自己都差点成了反面教员，怎能再有建树？不过有一件事你没做，没有主动整过一个知识分子。”还有一次他和我一见面，劈头来一句：“你怎么去抢文学家的饭碗，一个历史还不够你搞的！”我一怔，才明白这是指我写了些散文，这句话是对我的批评还是表扬？不明白。他就



是这样，好话当做坏话说，坏话更要使劲向坏处说。

他的骂人有时也带来一些麻烦，不仅到处树敌，还有人扬言要控告他。这是因为他说了孔子是私生子，孔子家系自东汉孔融之后就已混乱，孔子后世70多代，到底有多少是孔子的真血脉？早就断档了！这引起孔子后裔的不满，50多人联名写信要告他侮辱先圣。对孔子血脉一说，虽不中听，可也没有什么不妥——据新华社2010年2月7日报道，最新科学研究发现，当今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人已与其他民族融合，经现代生物学的检测，汉族已不再具备专有的DNA。连当今中国人都已不再有纯汉族的血统，现代孔子后裔怎能保有2000多年前孔子的纯血脉？要是后人，也只能指文化传承。当初他说这话时并不知道后来这一结论，与孔子后裔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甘犯众怒，出此言说？为的是坚持真知，这就是他治学的风骨。

当然，有时他的骂人也有失之偏颇处，尤其对国学和国学院，用语之尖刻，出言之不逊，使人难以承受。国学不是“学”吗？既为之学，不妨多元多议，岂能以骂压人？有时他骂得太出格了，被骂的也就一笑置之，这才是高人之态，相比之下，他反而显得褊狭。

他这样的不近人情有时也对着自己。他是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佳作迭出，却很少能申请到国内社会科学基金的补助。因为凡是申请者都需要填写一叠申请表，说明课题的主题、内容、价值、作用和意义等等，申请人往往为此费尽心机，有的还组成团队反复论证，以期获得通过。而他在课题有何作用这一栏，大笔一挥，写出的竟是“无用”两字！在实用主义横行的今朝，这又怎么能通过？

[[读者·2012·11]]

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后果，为什么还要顶风而上？是他的信念！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民族的记忆，社会科学的基础，学术上有价值的并非都能有益于今天，这是专家学者们心知肚明的事，然而掌控基金大权的学官们，有几人能坚持这一学理？他又就是这样不配合、不识相，基金哪有他的份！

他的骂人和不识时务，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文化渊源。当他口出狂言时，令人难以置信这些话会出于一个白面书生、江南才子之口，细察之下，方知这是魏晋狂徒之遗风。在治学中他自称最喜欢的是庄子，可他不书一言；他着力写的是他疑惑的东西，力求以研究澄清自己的疑虑，并晓之于众。质疑、解惑、求知，这是他治学的境界，学问做到这一步，才可谓真正的科学精神，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创造性的研究。有个学生送给他一副对联：“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为人和治学风格。岂不知，他的为人和做学问如出一辙，把学问当做人生，若痴若迷，以致学问与人生混沌不分。做学问不妨处处质疑，但为人处世哪能与人为难，难以与人共事？然而这就是他！性格使然。

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舆论一律、思想一律的时代，都已习惯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被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观天看人，将人看成一种模式，这已成为思维定势。殊不知，这世界上山川日月，物换星移，最为丰富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在人的汪洋大海中，你能找出两个面目一模一样的人吗？古往今来，凡是高才俊逸之士往往伴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或怪癖，庄子的狂放、嵇康的怪异、李贽的反叛、袁枚的荒诞，直至民国的章太炎、辜鸿铭等等，种种毛病可

以找出一箩筐，可都不妨碍他们在学术上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样的人也许就在你的身前身后，请理解这样的个性，像谅解前人一样，宽容身边的人吧。

虽然他常有出口伤人之举，但为人还是有底线的。“文革”前夕他是上海写作组“罗思鼎”的成员，我也被借调到中宣部参加拟定“二月提纲”的工作。上海和北京这两个阵地被视为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次他来我家，一进门就趾高气扬地宣告：“现在我们可是对手了！”我淡淡地回他一句：“这有关系吗？”他哈哈一笑：“当然，没关系。”我们避开彼此的工作，相谈一如既往。不久“文革”开始了，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号角，全国掀起批倒一切的风暴，北京的“二月提纲”被认为是包庇吴晗，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任凭狂风暴雨铺天盖地，我和他之间风平浪静，他更没有落井下石。在儿子打倒老子、妻子揭发丈夫、人人发狂的年代，有这点操守也是不容易的。

如今他已驾鹤西去，对他缅怀最深的除了亲人就是他的学生。他有独立的思想、出色的口才，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拥有众多的“粉丝”。经他教诲的学生，几乎众口一词称赞他这样的老师。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出了名的严厉，他能将学生的作业改掉三分之二，从不手软。对学生他注重的是基础训练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培养。他曾拟出100个文史试题，让学生任意挑选一个，写出1000字的文章，再依据文章逐个对学生面试，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对学生精心培育。在癌症晚期，他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亲自为学生授课，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已承诺的书稿尚未完成。他就是这样为一个为学业而生、为学业而狂、为学业而死的人。学术界有了他多了一分热闹，少了他却有了一分寂寞。

他的离去给朋友们留下不尽的思念。与他唇枪舌剑对阵多年的王春瑜也称赞他的学问功底，在他病危时多次想与他通话，以表达对他的关切，又对我说：“他目空一切，骂了许多人，可对你一直是很好的。”是的，他对我不错，也只是没有被他骂而已。其实，他对女学人一向是很尊重的，你若与他同行，同进一个门，他必定停顿一下让你先行，彬彬有礼。

如今他已走出人世，走进天国，再也回不来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有中国士大夫的倨傲，又有西方绅士的风貌，这两者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另类，这就是他——我的老同学，朱维铮！

（戴伟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21日）

朱维铮说

●朱维铮

希望我们写历史的、各位读历史的和诠释历史的人都做到一点——坚持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

目前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很大，其干巴巴的内容不但不能引人入胜，相反，引人入睡。

把历史 and 市场化结合起来讲，我以为一定会是另一种形式的扭曲。

我瞧不起你的学问，但我马上申明，只要你学问之中有百分之一的真实，那我就景仰这百分之一，但你不能阻止我对你百分之九十九的批判。

我只骂该骂的，就是对该骂的人也比较当心。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我朱维铮成不了大师，凡是大师都有胡说的勇气，我没有，只承认自己是个小师。

[[读者·2012·11]]

● 马家越



夜的尽头是家的灯光

我的父亲在河南开封长大。父亲一直在奋斗，考上了武大，来到武汉——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他在这里读书，工作，结婚，生了我。他的奋斗换来了一所理想的大学、一个合适的职业和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也许就是别人眼中我平凡的父亲——离家游子。他的心也许一半是黄河，一半是长江。

我仍记得，父亲那晚接我放学后没有带我回家，而是赶上一班火车，直奔开封。

父亲那时的表情，我从未读懂。

列车上，我们坐在窗边，父亲只是看着窗外，似乎想逃避什么。他只是告诉我，奶奶病危。话说得很慢，眼睛里似乎闪烁着什么，那不是眼泪，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他一定认为我当时无法理解他的心情。他是对的，那时的我的确太小，奶奶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竟没有落下一滴眼泪。

长大了一点儿，我才明白，和自己深爱的人离别，心有多么痛。自己再也不能和她说话，再也不能久久地看着她的眸子，再也不能向她诉说自己的心事，想到这些，便潸然泪下。

对于父亲也是如此，造就自己、牵着自己长大的人走了，并且是永远地走了。

我一直单纯地认为这就是父亲全部的痛苦。

现在我知道，其中还夹杂着一丝恐慌，他也许明白，这个轮回，有一个人不能再陪他走了。他也许在奶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都是我不愿说，也不愿了解的。

奶奶是中秋节去世的。几年之后的一个中秋节，我们刚搬进新房不久，父亲在奶奶的照片前点了一炷香，叫正躲在屋里做自己事情的我出来坐在他旁边。可之后他便不語了，只是静静地看着照片。我有点糊涂了，猜不出其中的意味，良久，父亲看着前

方说：“今后别再让你妈生气了。”

也许他在遗憾以前没有好好报答自己的母亲，现在没机会了。

不知道天下有没有人不想出去闯一番事业，然后衣锦还乡的。不知道衣锦还乡能不能弥补老人心中的寂寞。不知道最后的回家在终日的等待面前是否显得渺小。不知道天下有多少父母再也等不到儿女回家的那一天。谁会料到，自己一离家，也许再也不会回来。

可是，谁又能改变这一切？

也许母子之情在孩子小时候是最深的，因为那时孩子一无所有。

幸福的是，这些悲凉的事不曾光临我温暖的小窝，也没有在父母的家庭里徘徊，不知道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离家后，天下会生出多少老无所依的人。

我也明白，这个轮回终会由我来接下去。父亲那眼神中，也许还有责任。父亲的母亲已经将全部交给父亲，我明白有一天父亲也会将全部交给我，虽然我极不愿那一天到来。我也明白有一天我也会将全部交出去，虽然我不愿那一天到来。

那晚，我和父亲静静地坐在一起，我能感受到，他害怕失去的不只是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孩子。他知道有一天他的孩子也会离家。

所以我努力和命运抗争，不要离家太远。可身体和身体间的距离总等于心和心的距离吗？我不懂。但我相信，没有身体的亲近，就不会有心的亲近。

父亲一直在弥补，他总是一有时间就回开封看看，谁不想念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父母呢？父亲每年也都带我回开封，也许我的优秀正是老人心中的慰藉和幸福感的来源之一。

我在父母还未衰老的怀抱中，渐渐意识到，该轮到我了。

我的文章里总是有意识无意

小时候上作文课时，老师要我们读故事写心得。故事的内容是抗日战争期间女童军送国旗给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国军。

照说，这个关于荣誉、爱国、奋不顾身的故事，心得一点也不难写。不过那时我故意唱反调，写了一篇“吐槽”的心得。文章详细的文字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意是：

一、如果不能打胜仗，送国旗也没用；如果能打胜仗，国旗过几天再挂也没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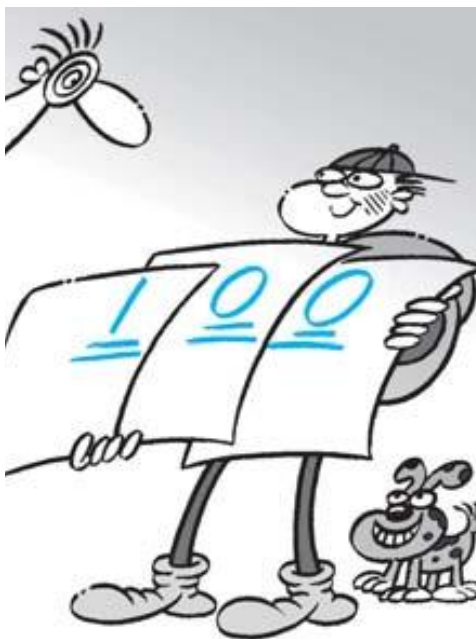
二、如果打了败仗还挂国旗，老百姓会误以为打了胜仗，会错过逃亡的黄金时机。

三、国土失掉了还可收复，但女童军命没了就无可挽回，因此还是命比较重要……

我还写了不少理由，总之，主题就是大唱反调。可以想象，在那个国家、民族情操重于一切的年代，我被老师约谈了。

老师问我：“老师平时对你好不好？”我说：“好。”“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听老师的话，别人怎么写，你就怎么写。”老师停了一下，又说，“大家会怎么写你知道吧？”我点点头。“为什么？”“你相信老师，这是为你好，你听话才有前途。”“哦。”我相信了老师，从此我的文章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种是公开的、“听话”的文章，像是作文课的作文、比赛的作文、考试的作文、贴在墙报上的作文。另一种是偷偷摸摸



如果我一直很乖

●侯文咏

的、“不听话”的文章，像是传小纸条的文章、写情书的文章、投稿的文章……

一直到我长大之后，我母亲还喜欢数落我小时候多么顽皮、多么不乖的事。对我来说，那些其实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话，或者诚实地说出、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的事情而已。当时我一点也没想过，那就是所谓的“不乖”。

依照那样的定义，我这一辈子其实还做了不少“不乖”的事。像是第一次投稿时没有邮资，偷爸爸的邮票；像是为了让稿子内容更精彩，编出许多学校

里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像是为了看电影，偷偷翻墙爬进电影院，被老板揪着耳朵拉出来……

或者，像是约会时没有征得雅丽小姐的允许，就偷偷地吻她；或在实验室做研究时，明明大家都觉得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行的方法，我硬是要试；或明明大家觉得是没有机会被接受的期刊，我硬是要投稿；或辞去医师的工作，成为一个专职作家，成为一个编剧、广播主持人、电视剧制作人……

回想起来，正是这些“不乖”“不听话”的行为或决定，一点一滴造就了今天我的人生中非常具有决定性的部分。

有时候我不免要想，如果我那时候少了这些“不乖”，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相信，就像我的老师讲的一样，所有要我乖的人几乎都是很善意地为我好。我也相信，听话的人的确会有前途。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不听话的人，长大一样是会有前途的——差别只是，听话的有听话的前途，不听话的有不听话的前途。

回想起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让那个年轻、不乖又有点彷徨的自己，或者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知道，别担心，只要相信自己，继续努力，用力让自己长大成心中希望的样子，一切都会很好的。

（林君摘自新星出版社《不乖：比标准答案更重要的事》一书，夏大川图）

识地掺进很强的归属感，从磐石到蒹葭，从风到面朝烟雨的花。也许这正是我害怕失去的表现吧。

曾经空旷的校园让我懂得，不能依靠他人活命。的确，路要自己走，家要自己回。当你依靠着父母长大，走

向独立后，再想回到那温暖的依靠是多么艰难。

（阳子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27日，张骏图）

[[读者·2012·11]]